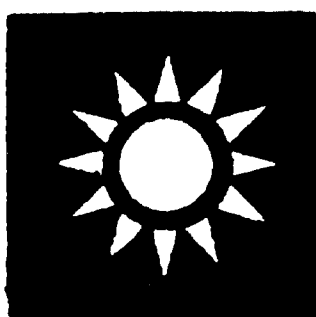


訓練叢書之二十一



外國民族英雄史話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

民國三十年八月再版

外國民族英雄史話目次

前言

編輯例言

安重根 (朝鮮)

尹奉吉 (朝鮮)

甘地 (印度)

尼赫魯 (印度)

凱末爾 (土耳其)

奎松 (菲律賓)

外國民族英雄史話 目錄

外國民族英雄史話 目錄

喀富爾 (意大利)

馬志尼 (意大利)

加里波的 (意大利)

馬砂力克 (捷克)

畢蘇斯基 (波蘭)

范勒拉 (愛爾蘭)

柴魯爾 (埃及)

華盛頓 (美國)

魏之曼 (猶太)

前言

當一個民族遇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如果這個民族還不該滅亡，或不願滅亡，一定會產生出來偉大的民族英雄，來領導他的全民族，共同走向復興之路。這偉大民族英雄的事業，是流傳不朽的，其言行足以垂範後世，其人格亘萬古而常新，其深遠影響，永遠保留在其民族生活之中，而為其民族生存不可或缺之因素。

我們中華民族生命的存在，現在已到了最嚴重的一個局面；今日我們民族所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其嚴重遠過於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滿洲之內憂。激勵青年同仇敵愾奮身為國之精神，以增強抗戰力量，爭取最後勝利，固為當務之急，但又必須有賴於實質的薰陶，始可達到上述的任務，因之，有關民族興衰之偉人事蹟的稱述與灌輸，可說是最有效的一種救濟良方。這本『外國民族英雄史話』，就是為了激發青年的民族意識，養成青年之堅強的信心與實力，作為非常時期砥柱中流的人物。

本來，發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意識，似應以表揚本國民族偉人的言行勳業，最爲通宜；但是，我們知道，歷代民族偉人的意志、魄力與堅強奮鬥的精神，足以製造時勢，樹立起新的民族基礎，此在中外，初無二致。外國的民族英雄，也和中國的一樣，他們的革命人格之修養，以及在民族運動中的豐功偉烈，相信亦足以激發我青年的愛國心，向上心，與抗敵救亡的精神。這本書的編著，其意義就在乎此。

再者，本團已編印『民族英雄史話』一書，內中——包含一百個人——關於中國民族偉人事蹟的表揚，可謂已盡其大觀。本書之作，其目的在使外國民族英雄的偉大人格與勳業，與中國民族偉人互相聯絡，互相對照，以激刺青年的思想與奮發心，其效用與稱述本國民族偉人，正復相同。

這本書裏的十五位民族英雄，並不是像世界普通一般偉人一樣，他們都是當時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領導者。在他們之中，縱然有一生未得成功的，但他們的理想、志願、毅力以及其爲國家民族奮鬥犧牲的精神，固足以彪炳千秋萬世，而爲青年所

取法。在他們身邊，有的是思想家——如甘地、尼赫魯、馬志尼、他們喚醒了民衆，激
勵起民衆，使全民衆認識他們的時代，他們的敵人，與當前的危機，而知所從向。有的
是軍事家——亦可說是實行家，如凱末爾、加里波的、華盛頓，他們具有軍事的才略與
冒險奮鬥的精神，去實際領導革命的民衆，以與他們的敵人血拚。有的是政治家——如
馬砂方克、喀富爾，他們運用政治的手腕，外交的手腕，內以應付複雜萬變的局勢，培
植民族的實力，外以聯絡與國，俾得國際的援助。有的是烈士——如安重根、尹奉吉，
他們不甘異族的虐待，憑着個人的一腔熱血去殺敵除奸，以申義憤。

其實，名垂於世界民族運動史上的民族英雄，是『車載斗量』，何止於本書所包含
的十五人？是的，還有其他許多弱小民族革命的偉人，他們的可歌可泣的事蹟，或許比
這十五位英雄的，更有稱述的價值。茲爲使這本書繼『民族英雄史話』之後，早與讀者
見面起見，特先請出這十五位大英雄，來打個頭場。了，請民族英雄的崇拜者不要着
急，續編的『外國民族英雄史話』，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與諸位見面的。

外國民族英雄史話 前言

編輯例言

一、凡專名詞——如人名地名之類——及特殊名詞，在第一次相見時，於譯音或譯義之下，皆標以原文（以英文為主），俾得明瞭其真義，而便於閱讀及記憶。

一、在敘述每個人的本事以前，往往簡述他的民族之興衰及其民族運動的概況，以便明瞭他的時代背景。

一、對於每個人事蹟的敘述，多着重在他的青年時代的修養、志願、思想和他一生在民族革命運動中堅苦奮鬥的史實，使青年知所效法，并以激發其為國家民族而犧牲的精神。至對於他的軼事，除非有關於他的人格，思想及革命事業者，概多從略。

一、對於每個人的私生活、嗜好與習慣，多敘述他的優點，以示楷模，而便仿效。

一、在敘述每個人的生活及革命的史實當中，雖然依照時間——即年、月、日——的順序，但力避寶塔式的堆疊，而採取夾敘夾議及描寫的方式，以免乾燥，而引起讀者

外國民族英雄史話 編輯例言

二

的興趣

外國民族英雄史話

安 重 根

在談到安重根的民族革命事蹟裏，連帶把他的祖國——朝鮮——被日寇吞併的經過和朝鮮民族革命運動的一般情形，簡述一下，藉以明瞭這位青年民族英雄的時代環境。

誰都知道，韓國——朝鮮——原是中國的一個藩屬，它和中國關係的密切，有唇齒相依之勢。自從一八九四年——即甲午年，中國被日寇戰敗，打立了承認朝鮮獨立的一馬關條約以後，這個與中國唇齒相依的朝鮮，便淪入日寇侵略的魔掌。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後，它又被日寇勒約受其保護。一九一〇年，日寇再提出日、韓合併案，強迫朝鮮君臣承認；從此，朝鮮在名義上事實上，已變為日寇的征服國，同時大韓全國人民，就開始過其慘無天日的奴隸牛馬式的生活，一直到現在。

日寇自從吞併朝鮮後，到現在已有三十年了。在這若干年中，因為日寇施行慘絕人

寰的壓迫與榨取的結果，朝鮮人民當然不會甘於屈服，而不思起來報復的，於是血淚交流的民族獨立運動，便一幕一幕的演了出來。這時，國內外的青年志士，有的不忍見着亡國民奴的慘痛，憤而自殺，以喚起國人；有的不甘身受痛苦，憑着個人的一腔熱血，去殺敵除奸，以申義憤；有的舉兵起義，以謀國家民族的復興；有的潛伏各地，糾合同志，作有組織有計劃的運動，以求達到獨立自由的目的。這，無非都是表示對於強寇一種不屈的精神；有了這樣不屈的精神，再把它永久的保持起來，發揮光大起來，可以說朝鮮民族，終有獲得獨立、自由、平等的一日。正如申圭植所說：『設我人之心而猶未死也，雖與圖異其色，歷史易其稱，我大韓雖亡，我人之心，自有一大韓在；我人之心，大韓之魂也，人心不死，魂兮尚有歸來之日。』這說明了不但韓國如此，就是任何其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祇要其人民的心——即精神——不死，則都有獲得復興與獨立的一天。

在韓國民族復興運動中，它的愛國志士。組織秘密團體，藉以掩護其活動的，實是

不少。像李相商，『聲鳴社』，宗旨是『聲彼之罪，鳴我之冤』；宋覺先的『望哭台』，時常聚集志士，望闕痛哭一頓，藉以激發人民的愛國情緒。又像姜奎宇的『老人同盟團』，安昌浩的『興士團』和『韓國獨立黨』都是民族運動的政治組織。又像金相玉的『秘密社』，金佐鎮的『光復團』，崔養玉的『共鳴社』，奇山濤的『暗殺團』，都是暗殺敵奸的機關。又像姜奎宇的『東光學校』，許薦的『藏書齋』，安重根的『三男學校』，都是藉着掩護以實行其革命工作的。又像『勞動共濟會』（後改爲『朝鮮勞動聯盟』），是朝鮮工人的革命組織；『朝鮮少年總同盟』，是朝鮮青年的革命團體。又像呂運亨，金澈等所組織的『朝鮮青年黨』，金九所領導的『韓人愛國團』，以及上海的『新韓青年黨』，『居留民團』，『愛國婦人會』，『紅十字會』，『武官學校』，『仁成小學』，都是韓人在國外從事於革命活動的團體。此外，散在各地而爲人所不知的祕密組織，自是很多。

總而言之，久處於泥犁地獄下的韓人的革命運動，是屢仆屢起，愈挫愈奮。中間要

以一九一九年的『三一』運動（亦稱『萬歲事件』），一九二六年的『六十』運動，和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爆發的『光州事變』，爲朝鮮革命史上最慘烈最偉大的運動；以李榮麟被推爲十三道義兵總司令，金秀敏被推爲十三道總督，爲朝鮮革命史上最顯赫最光榮的事蹟；以安重根之在哈爾濱刺殺朝鮮總監伊藤博文，尹奉吉之在上海炸死侵華倭酋白川大將及河端貞，爲朝鮮革命史上最壯烈最快人意的兩頁！

朝鮮革命運動的史實，和參加革命運動的民族英雄，真是『車載斗量』，指不勝數。前面所述，不過是『管中窺豹』，略見其一斑罷了。現在就拿朝鮮革命史上最壯烈最快人意的兩位青年民族英雄——安重根和尹奉吉——來作代表，分別一述其革命事蹟。這兩位朝鮮的青年志士，一個是在韓亡的初年，而放出來哈爾濱刺敵的槍聲，實足以震起韓人同仇敵愾的情緒和奮鬥革命的勇氣，自此以後，便發生了許多有組織有計劃的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一個是當着和『正走在革命之途上的朝鮮』有唇齒相依的關係的中國遭受日寇武力侵略的時候，而來給敵人一個驚心碎胆的打擊，既足以喚起韓國的人民。

又足以鼓勵中華的兒女。因此，我們知道，這兩位青年的朝鮮民族英雄，不僅是壯烈與快人意而已，而且可以說，他們對於朝鮮民族革命歷史的發展，更有莫大的關係。現在請先述安重根。

在朝鮮對日寇開始反抗運動的志士裏，除了一九〇七年，李相嵩、李嵩、李瑋鐘三人，奉韓王的旨意，去和海牙萬國和平會，向各國聲訴日寇勒約保護朝鮮的罪狀，并請願恢復朝鮮獨立外，要以安重根爲最早。因此，我們可以說，安重根在朝鮮民族革命史上，是一個革命的發動者，是一個劃時代的朝鮮民族革命戰士。

好像天已注定了他的命運似的，安重根在十五歲的時候，就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可是他僅僅才活到三十二歲，所以他的革命生活，祇延續了十多年的時間。他的一生革命事蹟之最轟轟烈烈的，在前面已經提過，就是他在中國吉林省哈爾濱刺殺朝鮮總監伊藤博文的事件。

編者從小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就聽到歷史教師講過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一段故事

。教師講得大聲有色，全班的同學都爲之感動。那時我的一顆幼稚的心兒，也不覺衝動起來；一方面在痛恨日本人——尤其統治朝鮮的總監伊藤博文——壓迫朝鮮人的毒辣，一方面又在景慕安烈士英勇犧牲的精神，同時對於安重根的不得久在世間親自領導韓人的革命運動，又有無限的悼惜，認爲像安重根那樣革命志士，若再活得久些，朝鮮的民族復興運動，也許不久就會成功的啊。

一八七六年，在朝鮮半島上的平安的一個充滿了革命氣味的家庭裏，產生了這位爲朝鮮民族而犧牲的安重根。他的父親是一位學識淵深并且愛國心重的人。幼承庭訓的安重根，不消說，因爲受到這位老國士的影響，所以後來才會作出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

天生的革命志士安重根，像其他許多英雄一樣，自幼就頭角崢嶸，志趣遠大。他十五歲那年，他的父親起義附東學黨——以排西教興東學爲宗旨，他就參與其事，這是他革命活動的萌芽時期。自一八九四年——即甲午中國被日寇戰敗，承認朝鮮獨立的那年，朝鮮已入了日寇侵略的魔掌以後，這位剛才十七歲的愛國志士安重根，看穿了日寇歸

終的目的，是在滅亡朝鮮。於是，他就開始聯絡同志，變日寇作反抗的運動。等到一九〇四年，日寇因爲阻止垂涎朝鮮半島這塊肥肉的俄國的進逼，而開了戰端的時候，安重根認爲這是乘時而起的大好機會，但是，猶淨的寇眼時在嚴密的監視着，那裏有英雄用武之地？因此對他的父親說：『國家存亡，在此一舉；然而國內沒有活動的地方，不如到中國去。』後來他便聯絡同志，到我東三省各處活動。

日寇對於朝鮮，本來是愈逼愈緊，恨不得一時吞下這塊肥肉，以饜其饞吻。可是因爲受了一虎視眈眈的帝俄的牽制，又不敢剽然吞併。迨一九〇四年，日寇把帝俄打敗，它便毫無忌憚的對朝鮮橫施其壓迫，於是就造成了一九〇五年（乙丑）的保護條約——歷史上稱爲『乙丑勸約』，因爲是日寇逼勒韓皇所簽訂的。從此，日寇就派了重兵駐在朝鮮，并把駐朝鮮的日本使館改作朝鮮總監府，而處心積慮的宰割朝鮮的伊藤博文，便『駕輕就熟』的做了朝鮮總監。

這時，尚在我東北從事抗日運動的安重根，東望鴨綠江彼岸的祖國——名存而實已

亡的祖國——裏，充滿了日寇壓迫威逼的氣氛，他不覺悲憤填胸，燃起了更熱烈的怒火。因此，他便南來我山東的青島、烟台等地，聯絡更多的志士，從事大規模的抗日運動。不料正在此時，他父親辭世的噩耗傳來，竟迫使怒火高燒的安重根，不得不把革命活動暫時擱一下，奔回祖國，去治理父親喪葬的大事。

嚴重的國難，正在方興未已，而父親母親的家愁，又相逼而來，這在安重根，正是孟子所說的『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行拂亂其所爲』的時候。但這亦是『天將降大任』給他的一種『增益其所不能』的磨鍊吧！的確，安重根雖有國難家愁的悲痛，但並不因此而稍灰其心。不過，他因爲父親新喪，母親新寡，當時沒有立刻離開祖國，這表現了他既想盡忠，而又能盡孝啊！

安重根在父親死後，雖然沒能夠立刻離國，但他的革命活動，並沒有因爲丁憂，而一時擱淺。一九〇六年，他在鎮南浦創辦了一個『三男學校』，一方面作鼓勵青年的宣傳，一方面藉此作秘密的聯絡機關，革命志士的用心之苦，於此可見一斑！

一九〇七年，萬國和平會開會於荷（Holland）京海牙（The Hague）的時候，那徒擁虛名的大韓國王，因為苦於日寇的虐待，亟欲脫掉，乃遣派了密使向和會請願，并說明一九〇五年（乙丑）的保護條約，係在日寇威逼之下所成立，以及日寇虐待韓人的種種罪狀。這時海牙和會本想予以扶持，乃電詢韓王有無派遣代表出席的事情。不幸極了，這個電報，竟落到朝鮮總監伊藤博文的手裏。伊藤手拿着電報，去逼迫韓王向海牙和會否認其事，韓王拒絕了這個威逼，就被伊藤逼迫讓了王位給他的兒子李坵，剝奪了他的行政權和司法權，并且解散了朝鮮的軍隊。正在藉着辦學作掩護而實際作獨立運動的安重根，這時候心裏真不知充塞了多少的舊恨與新愁！他在氣憤之下，便想馬上舉義，以期打倒強寇；但終因力量不夠，未能如願。

這時，安重根不但感覺自己的力量不夠，難以成功，而且又鑒於日倭毒辣的壓迫和密如蛛網的警察，感覺在國內暗中活動，也有許多不便，且又恐遭遇了日寇的毒手。於是，覺得老道已盡而必須盡忠的安重根，便又拋開了家庭和祖國，到海參崴去從事民族

運動去了。

開頭已經提過，在澎湃的朝鮮革命怒潮裏，來參加革命的志士，是『車載斗量』。他們都在氣憤填胸，謀殺日寇，恢復獨立。安重根到海參崴以後，便很快的集合了志同道合的禹得淳、劉東夏、鄭大鎬、曹道先等十二人。他們爲表示個人的決心，一齊割斷了自己的手指頭，對天發誓，爲國家民族而奮鬥，而犧牲！他們又用手指的血，在國旗上寫了『大韓獨立』四個大字。這是表明了他們的惟一目標，是大韓民族的獨立，不達到這個目標，他們是頭可斷，身可亡，而他們的志願和精神，是永久不會破滅的。

一九〇八年，安重根得到愛國志士李範晉的財力幫助，募得了敢死之士三百人。他們在安重根的領導之下，便在這年六月，渡過圖們江，到慶興，去和日寇的軍隊開戰，殺死寇兵五十多人，又乘勝進襲會寧的敵營。可是，這三百個勇士，雖然敢死，肯犧牲，但沒有整個的民族運動的計劃，和有組織的廣大的後援，終是抵不過有計劃、有組織、有訓練的大隊日寇。所以等到日寇的大軍開到，卒因寡不敵衆，而告敗退。這時，他

們的安息，隱蔽和活動的場所，仍在我國的白山黑水之間。

朝鮮人都深知道，日寇的宰割朝鮮，乃是伊藤博文一手所造成的。所以他們對於伊藤，總在咨嗟涕視，切齒垂罵，大有不共戴天之勢，總想一旦實施報復，一舒積憤。後來情形愈演愈惡，終有壯烈的安重根，出來做了這『一舒積憤』的實行者。

安重根聽說伊藤博文要到我吉林的哈爾濱，會晤俄國的財務大臣，有所協商，他便暗暗自喜的說：『老賊這回必定死在我的手裏！』果然，朝鮮革命史上最壯烈、最光榮和最快人意的一頁，真的由他寫成了！

他同禹得淳、劉東夏、曹道先三位志士，在十月二十一日由海參崴來到哈爾濱，把那裏的一切情形、地勢——尤其火車站一帶的形勢——都觀察得清清楚楚，并且又周密佈置了一下。帝國主義的勢力籠罩下的哈埠，豈能容將要復仇的革命志士在裏邊長此逗留！因此，在第二天——二十二日，這幾位青年的民族英雄，就一同去到比較偏僻的蔡家溝，再作詳密的計劃。在這裏，他們四個人分做兩班，把禹得淳和曹道先留在蔡家

備，以便與各方取得聯絡，并遇事傳遞消息。安重根和劉東夏又回到哈埠潛伏着，靜待伊藤博文的駕臨。

是十月二十六日早晨九點鐘以前，從東方雲霧裏射出來慘淡的太陽光，透過了披著紅葉的樹梢，照耀着壯麗的哈爾濱車站。站台的周圍，佈滿了俄羅斯的警察、憲兵、衛隊和軍樂隊，好像連一個鳥兒，都不叫它插翅飛過似的。漸漸離開雲端的太陽，用他的光芒——一陣陣刺着那些人的眼睛，好像警告他們說：『你們何苦亦在這裏給帝國主義者助威呢？』

不多時，九點鐘了。黑煙繚繞，汽笛鳴鳴，以宰割朝鮮著稱的伊藤總監的專車進站了。站台上的軍樂聲、爆竹聲、歡呼聲，一時大作，響個不亦樂乎，簡直把他們的耳鼓都震聾了。在這噪雜的聲音裏，伊藤博文耀武揚威的下了火車，和照例前來歡迎的各國領事及俄國的文武官員，一個個握手，一個個寒暄，慢慢的擺着侵略者的架子，向站台走來。一邊還舉起右手向來迎者頻頻答禮。這時，伊藤在得意，殺神在竊笑，暗中在觀

「好極了！這列專車，權做伊藤的靈輓；衛隊、軍樂隊和前來歡迎者，正好是給伊藤送殯的儀仗隊，爆竹正是吊炮，歡呼如同哀悼。」

果然，有一位剛過三十歲的青年，呈着緊張的面孔，好像有緊急的大事，急待他來解決似的，乘着人耳如聾，萬目如呆，和各種聲響齊作的當兒，從俄國衛兵的背後，衝了進來。在隔著伊藤不過十步遠的地方，他便拿出十字彈六六砲，瞄準了韓人恨入骨髓的伊藤博文，猛力射擊。當時因為有軍樂聲、爆竹聲，辨不出槍聲，所以射來是得心應手。真是槍不虛發，彈彈中的；一彈中了伊藤的右脅，穿過肺子，一彈由右腋穿進了他的後背，又一彈正中了他的腹部，把腸子都全部流出；不到半點鐘的工夫，這一世之雄的伊藤博文，便一命嗚呼於哈爾濱車站的月台上了！當時靠近伊藤的倭總領事川上，和滿鐵理事田中等，都受了槍傷，險些作了冤屈之鬼！

這位青年，就是年剛三十二歲的安重根喲！他在萬人叢中，見到目的已達，大功已成，不但沒有想到逃脫，反而仰天大笑，高呼『大韓獨立萬歲』三聲！負着警衛責任的

俄兵，只得把泰然自若的安烈士逮捕起來，以事塞責，他們把他解到旅順口的法院，判處了死刑。在就義的時候，他慷慨從容的說：

『我爲大韓獨立而死，爲東亞民族而死，死了值得！』

壯矣！烈矣！安重根的刺殺日酋，可以說，開了朝鮮革命史上的新紀元，不但嚇得日寇喪胆，而又震驚了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主義者，此外，他這轟動全世界的一樁，不知道喚醒了多少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他的朝鮮的同胞，更不消說了！安重根的一擊，雖然沒能夠使朝鮮獨立成功，但在朝鮮民族運動史上，的確佔着最光榮的一頁！

在這對日寇作民族戰爭的大時代當中，我們緬懷安烈士英勇犧牲的精神，應當如何肅然起敬，奮然興起，效作大中華民族的英雄！

尹奉吉

像安重根一樣，尹奉吉也是朝鮮歷史上劃時代的青年民族英雄，并且也同樣的用熱血寫成了朝鮮革命史上最壯烈最光榮的一頁。

中外欽敬的青年革命志士尹奉吉，以一九〇八年生於朝鮮忠清南道禮山郡德山面柿梁里。他從小就聰明過人，七歲在私塾讀書，得到神童的稱譽。他自幼富於反抗的天性，就是師長給他無理的壓迫，他也要據理力爭。他又富於勇敢不屈的精神，所以與人鬥爭，總不會退却的。他十五歲的時候，就能寫中文詩；有一天，鄉中的一位父老，要嘗試一試他的天才，命他落韻成詩，他便立刻的應聲詠起來：

『不朽聲名士氣明，士氣明明萬古清，萬古清心都在學，都在學行不朽聲。』

從這幾句詩來看，我們不但見出了尹奉吉的天才，而且也見出了他的大志，果然不出十年以後的尹奉吉，便留下了世間的『不朽聲』。尹奉吉十六歲的時候，自己學習日語，

只一年的工夫，就能通話。十七歲，在鄉間給無產子弟做教師，到十九歲時又兼辦夜校。一連繼續了好幾年。那些窮鄉僻壤的愚夫，所以能夠吸收些新思潮的，都是他的功勞！

從事『舌耕』，以激發國人的民族思想，固然是根本大計，但又顯得過於遲緩。有志之士，往往都是激昂慷慨的『快人』。革命熱情隨着年歲日見高燒的尹奉吉，看到日寇對於韓人的政治的壓迫和經濟的榨取，實在是忍無可忍，若老是手執教鞭，不去親自冒險，恐怕終久不能夠拯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他常頓足長嘆，甘願一死以報國家。但是，在敵人監視之下，一舉手一投足，都不得自由，於是在二十三歲時，他便斷然離開祖國，到中國來了。

在尹奉吉離國的時候，他家裏有父母兄弟妻子俱全。當時他的父親尹璜，年四十一歲；母親金允祥，年四十三歲，妻子裴用順，年二十五歲；次弟尹奉錫，年二十二歲；三弟永錫，年十五歲。他還有兩個兒子，長子模淳，年五歲，次子淡，年兩歲。他的家庭並沒有恆產，所以生計很是困難，僅以務農，來養活這八口之家。試想尹奉吉那裏甘

心拋棄了天倫之樂的家庭，而奔投人地兩生的異鄉？特以『忠孝難兩全』，所以忍痛割捨了。他爲民族復仇的熱血，是何等的澎湃！

尹奉吉在將要出國時的情形，極堪悲憫。困窮的家庭，那裏有剩下的錢給他做旅費？不得已，他便從他自己所辦的學校的經費裏，姑且取出了幾十元，勉強離開朝鮮半島，渡過了鴨綠江。回頭望一望暗無天日的祖國，再想一想父母兄弟妻子俱全的家庭，心坎裏真是充滿了無限的悲憤與傷感！

尹奉吉到了青島，已經囊空如洗。這時候，潦到異鄉，無地容身的青年尹奉吉，就不得不應用『大丈夫能屈能伸』這句話，想一個『通權達變』的辦法。於是他便含淚忍辱，給倭人中原兼次郎洗衣作工，以圖積蓄，再作遠大的打算。果然，一年後，把自己勞力賺得的工資積蓄起來，匯到祖國，以償還他從前動用學校的經費。他這種廉潔的品格，真是值得欽佩，所謂『君子固窮』，尹奉吉實足以當之！

尹奉吉到中國來的目的地，原是上海，在青島的停留，乃是迫於經濟的壓迫。等他

在青島稍有積蓄以後，就奔向他預定的方向——上海——來了。

尹奉吉到了大韓臨時政府的所在地——上海——的時候，心裏是萬分的高興。可是，身在異鄉，舉目無親，而又迫於貧窮，在常人則未免要有『窮途之哭』；但是尹奉吉偏偏有『子路不恥糲袍』的風格，時常穿著破衣服履，往來在堂皇的馬路上，實足表現出他英雄的本色！因為飢寒所迫，終於進了某藥品公司充當職員，每月所得的十幾元錢，僅夠糊口罷了。在這裏，他和職工十七人，組織了一個工友會，他被舉為會長。不久以後，他因為憤恨廠主的壓迫，就自己在虹口市場開設了一個小菜營業。這個時候，連他的朝鮮的同胞，亦多看不起他，但是忍辱負重的尹奉吉，並無絲毫懷喪的表示。

英雄終會被英雄所識，這位被俗眼所看不起的青年志士，終於遇見了韓人愛國團的領袖金九先生。他們倆一談天下大事，便肝胆相照。這時——一九三二年——正值我中國和日寇有『一二八』的戰爭，韓國臨時政府，授命金九先生，召募敢死之士，乘機舉事。尹奉吉聽着這個消息，認為報國的機會來到，便很快——的去應徵，在四月二十六日加入

了韓人愛國團，當時在太極旗——朝鮮國旗——前宣誓：

『余謹宣誓：爲韓人愛國團團員，誅戮剝正侵略中國之仇人軍事領袖，以期還我祖國之獨立自由！』

從此，尹奉吉的劃時代的轟轟烈烈的革命勳業，便彪炳於朝鮮的革命史上，而爲全世界人類所景仰！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不下十萬的駐在上海的倭寇，在狂歌亂舞的戰勝感當中，來慶祝倭皇的誕日——日寇所謂『天長節』。這是倭寇強佔我東北，蹂躪我滬濱後的第一次的盛典。倭人在那天黎明時候，都喜不自勝的跑到虹口公園，參加祝賀——自然，他們沒有想到樂極會生悲的。在這大羣倭奴如此『樂不可支』的情形下，正給滿腹充塞了悲憤的韓國志士一個殺敵復仇的絕好機會！

果然，這天韓人愛國團團長金九先生，假扮了一個老工人，尹奉吉假扮了一個翩翩的日本青年；他們倆先演了一幕前奏曲之後，那幕以假日本青年作主角的悲壯的歷史劇

便正式開演了。

老工人用悲壯的語調對青年說：

「君命即將與世辭矣！余爲祖國的光復，與民族的自由，切祈於將作偉大犧牲之君！君之赫赫的成功，將與君之精神長存！惟最後有一言語君：吾人之敵，倭寇而已；則今日舉事，切須審慎，萬勿加害於倭寇以外各邦人士。今以二彈授君，一以屠戮敵將，一以毀滅己命。」

「謹遵命！深願先生爲國珍重，奮鬥到底！」青年慷慨的回答說。

「願與君再面於地下！」老人更悲壯的說。

於是，兩人互灑熱淚，握手作別——永久的別了。這一悲壯的序幕，在當時，只有天知道，地知道，和金九與尹奉吉知道！

日寇當着四萬萬五千萬中華兒女，人人必坎上都充滿了悲憤的時候，竟在我中國境內，舉行誇耀贖武的大典，當然要弓上絃，刀出鞘，陳兵列鼎，大張戒備。是的，那天

虹口公園警備的森嚴，果真是前所未有。飛機、大砲、鐵甲車、坦克車、機關砲等的利器，無不羅列。虹口、開北、江灣一帶，都在警戒線內。好幾千的武裝隊伍，成騎兵，或步兵，逡巡在公園內外，幾乎無一毛可入之孔。中國人（漢奸除外）固不必論，就是其他外國人，無招待證的，亦不准入園。所謂堅如鐵甕，固若長城，也不像這樣。但是，強寇雖然有這樣森嚴的戒備，終擋不住一個青年志士的偉大精神！

尹奉吉爲求達到圓滿的結果，以成其報國的大志起見，在四月二十七日，曾先期到虹口公園，妥善的佈置了一下。然後又到虹口，設法弄到手一張白川大將的照片，並且買了一幅太陽旗——日寇的國旗，藏在懷裏。等到二十九日早晨，他穿着西服草履，打扮成一個日本青年的樣子，肩下垂着水壺——裏邊裝的炸彈，手裏提着辨當——是日本人所用的鋁質的長方形的飯盒子，裏邊也裝的炸彈。在他和假扮老工人的韓國革命領袖金九灑淚揮別以後，他便駕車到虹口公園，去執行他的歷史上的任務去了。

森嚴的日寇的警備，既不知警備線終被突破，那會知道寇羣裏混入了朝鮮的革命青年

年？這固然是日寇萬分毒辣的警戒中的一點疏漏，但亦是尹奉吉爲達復仇雪恥的目的，而巧用其技術的結果。

尹奉吉進了公園，混入倭羣之後，日寇駐滬最高文武官員，已齊集在慶祝台上，日僑圍於台下，都興高彩烈的，同祝國運的日隆？聖壽的無疆？不多時，天上的黑雲密佈，降下大雨。這一方面顯示着天怒人怨，一方面又顯示着天助尹奉吉的成功，而又知其必死，故此灑淚以相吊。

正在寇酋齊集司令台上，向衆發話的時候，尹奉吉便開演他那幕悲壯的歷史戲劇。他的兩手一揮，便把手裏提的辨當正正當當的拋到台上去，霹靂一聲，天地震動，台上的羣酋，無一幸免，不是被炸死，就是受重傷。倭駐滬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貞——卽滬變時，操縱浪人，殺人放火的凶首，當時就被炸破了腸腹而死；侵略上海的倭總司令白川大將，身上中了二百零四個大彈片，小片不可勝計。至五月二十六日，死於上海；倭第三艦隊司令野村中將，眼珠被炸出，一目失明；倭第九師團長重田中將，被炸斷了一條

腿；駐華大使重光葵，亦被炸斷了一隻腳。此外，倭駐滬總領事村井，民間書記友野，及倭兵倭婦五人，都被炸傷。只這一個辦當就吃死了和吃壞了這樣多的人，那麼，假設尹奉吉再把水壺裏的硬水——即炸彈——給他們喝了，恐怕當時參加慶典的倭人，還有許多要遭遇和白川大將等同樣的命運。可惜沒有作到！

尹奉吉這一聲巨響，代表了祝賀天皇的二十一響的禮砲——當時的禮砲，確因炸案，而未得鳴放，也是宣告日本帝國主義沒落的吊砲，又是懲罰殺人放火的霹靂！聽到這聲巨響，而大叫痛快的，豈獨三千萬的韓人而已？四萬萬五千萬的中華兒女，亦在鼓掌叫絕！我們死於「一二八」戰役的數萬民族英雄，從此在九泉之下，亦可瞑目矣！

這幕悲壯的歷史劇的主角尹奉吉，眼看見倭會部飲彈而仆而死，可是憤怒的熱火還在燃燒着，正想把肩上的水壺，再行拋去，已被倭兵包圍，難以掙扎。但他見他的目的已達，乃大喊「大韓獨立萬歲」三聲，便從容就捕。被捕後，當時被解到倭軍司令部的，後又押解到日本，至十二月十九日（一九三二年），尹奉吉在日本的金澤，從容就義。

，時年二十五歲。

壯矣！烈矣！尹奉吉雖死，但他的偉大勳業，則彪炳千秋，遐與日月齊光！豈獨爲韓國的光榮？亦爲所有被侵略被壓迫民族揚眉吐氣矣！

最後，我們知道，匹夫有志，可奪三軍之師，當此日寇來侵而國家危急的時候，我們中華兒女——尤其青年，那一個不應當效法安重根、尹奉吉那樣英勇，而去殺敵雪恥！

甘地

印度(India)的「和平抵抗」和「不合作運動」的領袖——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是印度人民唯一崇拜的人物。在全印度，一提到甘地的名字，人民的臉上便表現出一種「笑逐顏開」的樣子。在三萬萬五千萬的印度人民中間，他只要翹起他的小手指頭，就能掀起一個新的全國叛亂，他受人民的信仰和擁戴，由此便可想像而知了。

的確，甘地不但是印度人民所崇拜的人物，也是全世界人類所敬愛的人物，因為他不僅是印度民族的解放者，同時也是真正的人類的朋友。他一生為民族解放的奮鬥，是要用「正義」以增加他的國家的地位，要用「真理」以使他的民族自由，要用「愛」與犧牲去克服強暴而有組織的武力。他同情窮苦的人民，便與一般窮苦人民過着同樣簡陋的生活，并且使這簡陋的窮苦生活，成為莊嚴神聖，使一般王侯的高貴反成為卑賤。

。他的刻苦的生活的寫照，是光着頭，赤着足，裸着身體，腰間纏着一條白土布。他的前面，擺着一個印度手紡車，印度的名字叫「差卡」(Charka)，這個「差卡」便是他復興印度民族的一個重要的工具，也是印度民族復興的一個重要的標幟。

總而言之，甘地的生活記錄，如果用「英雄的」這個字樣來形容，實在是足以當之而無愧啊！

甘地姓「甘地」(Gandhi)，名叫「摩罕達斯·喀蘭達謙德」(Mohandas Karamchand)。現在世人都稱他為「麻哈特瑪甘地」(Mahatma Gandhi)，而翻譯他的名字。「麻哈特瑪」的意義是：「大靈魂」，或「大精神」。在中文裏面，有譯作「大首腦」或「聖雄」的，亦有譯作「聖哲」的。這個「麻哈特瑪」的稱呼，是印度的人民共同叫出來的，因為他們以甘地為印度的靈魂。

甘地係在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生於西印度卡提阿瓦半島(Kathiavar Peninsula)上的波班達(Porbandar)地方。他的家族原屬於印度社會中的商人階級。但是他的祖父

和父親，都做過幾個王邦 (State) 中的「帝萬」 (Diwan)——即「宰相」或「總理」之意，所以他的家族便由平民階級變而為貴族階級了。甘地的祖父渥塔甘地 (Ota Gandhi) 和他的父親喀吧甘地 (Kaba Gandhi)，都是很有特性的人，都有堅強不屈的精神。甘地的大無畏的精神，就是得之於他們的遺傳。

甘地的家庭是信奉印度教 (Hinduism) 的保護神派 (Vaishnava)。這一派最重要的教條是「戒殺」與「禁肉食」，所以甘地一家的人，都是絕對的素食主義者。但是甘地眼看着印度教的種種不良的風習，便想起而改革，他看見印度教崇拜偶像的腐敗，他便和朋友反對神，幾乎成了無神論者，他聽朋友說，英國人所以能夠統治印度，就是因為他們吃肉身體強，他便跟朋友瞞着家裏去偷偷的吃肉。由此，我們知道，甘地自幼就富有革命性，他的違反宗教的教條，亦是為着革命和光復民族而如此，這與他的天賦良心，都是絕對相違反的，所以後來他為孝順的天性所驅駛，便對於他自己違反教條的行爲，深自悔改了。

甘地在十三歲的時候，便和他同年齡的迦斯圖貝 (Kasturba) 女士結了婚。他的婚

她雖然是由父母包辦，但却似乎是「良緣宿繆」，「佳偶天成」。後來迦斯圖貝相夫教子，一輩子追隨甘地，刻苦奮鬥，同艱辛、共患難，并生育了四個有爲的男兒，她不但做了一個偉大的夫人，而且做了一個偉大的母親。

甘地在中小學讀書的時候，成績都很好，很得教師的喜愛，但是他自己對於他的品行，却比對於他的學業看得重些。他每遇到自己的品行，有微細的瑕疵的時候，他便痛苦至於流淚。甘地十六歲，由中學畢業了，第二年便升入卡提阿瓦境內吧福曉伽（Baroda）地方的撒嘛達斯大學（Samaldas College）肄業。但他在那裏只讀了一個學期，便輟學回家了。第二年，他便到英倫（England）留學，去專攻法律。

當甘地要到英倫的時候，曾經過了許多的波折與奮鬥。第一，是他的慈愛的母親，很不放心；第二，是他的同階級的人，極度反對。他們以爲一個人一到了英倫，便喝酒吃肉，無所不爲，對於他們的宗教，一定要有所破壞。的確，在那個時候，他的同階級中的人，還沒有去過英倫的。但是，有堅強意志的青年甘地，畢竟不能被環境所阻撓。

他向他的母親，很鄭重的立下了三個誓：第一，不近女色，第二，不喝酒，第三，不吃肉。他的母親也就放心讓他去了。這時，他的本階級的首腦，發佈革除他族籍的命令，他置之不理，亦不懷恨。只專心一志，去趕赴他的前程。

甘地英倫留學三年，經過了畢業考試，取得了律師的資格，便於一八九一年返回本國，就先在孟買(Bombay)高等法院執行律師業務，後來又搬到啦甲可特(Rajkot)。當時，甘地因見到當地環境的惡劣與政治的腐敗，便感覺非常痛苦，而想與之脫離。適當時他本地有一個大商家，在南非洲經營商業，因事涉訟，請他到南非洲去幫辦這個案子。他得到這個機會，便很快樂的離開他那個惡劣的環境。從此，他得到了一個新天地，他後來的偉大事業，便在這裏開始了。

自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四年，甘地的活動，都是在南非洲，中間雖回過印度，但都是不久便又返到南非洲了。他在那裏開闢了他的新天地，發動了他的新事業，養成了他的「服務宗教」(Religion of Service)培植了他的「精神力量」(Force of Soul)鍛鍊

了他的「真理武器」(Weapon of Truth)。所有這些，不但造成了他個人後來的偉大，而且轉動了印度後來的民族革命運動，并且給予了世界一種新的影響與新的希望。

甘地到南非，本來是以律師的資格，受聘去辦理訟案。原打算在一年以內，返回印度。但是他眼看在南非的印度僑胞受著異國人的殘暴的壓迫，心中非常憤恨，又加上一般印胞的懇留，於是，就留在那裏為解放僑胞而奮鬥。

一八九六年，甘地返回印度，接他的家眷。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叫做「印度人民在南非」(Indians in South Africa)，以為在南非之印度僑胞呼籲。他又在各處講演印度僑民在南非之種種苦況，引起了印度國內很熱烈的注意和評論。路透社(Reuter)把這消息傳到南非，這使南非白種人的感情，大為激動。因此，當甘地攜眷返到南非登岸的時候，便遭受了白人的無理的毆辱。於是，他從此就立下了他後來的一撒提亞格啦哈運動(Satyagraha Movement)的根基，他說：「當我一想起那一天（被白人毆辱的那一天——編者），我便覺得是上帝在試驗我。使我準備去實行一撒提亞格啦哈

運動」。

這個「撒提亞格哈運動」，是甘地所創行的一種反抗政府法令的運動。它的意思，就是「真理運動」或「真力運動」，又叫做「靈力運動」。這種運動的主義方法，是以「真理」去反對「強權」，以「精神」去抵抗「暴力」，以「慈愛」去克服「仇恨」，以「受苦」與「犧牲」去戰勝敵人。這個名詞——「撒提亞格哈」——後來却被隨便利用以表示「不合作」、「消極抵抗」，及「和平抵抗」了。

一九〇四年，甘地在南非洲，辦了一個「印度民意」(Indian Opinion)週報，用英文和印度文字合刊發表。這個週報不但在南非洲發生了很大的效力，而且在歐洲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同年，他又在南非洲腓尼克斯(Phoenix)地方，創辦了一個新村，這個新村，就「腓尼克斯新村」(Phoenix Settlement)。後來他又在勞雷(Lawley)地方，依着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天國在你的心裏」(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的理想主義，辦了一個「托爾斯泰農村」(Tolstoy Farm)。在這兩個新村裏，人人

須做一樣的勞動工作，過一樣的平民生活。這兩個新村，都是後來舉行「撒提亞格啦哈運動」的準備與試驗的場所。

這時，南非洲的印度僑民，因為得了甘地的教導與保育，聲譽與地位，一天一天的增高，大為政府和白人所嫉忌與防範，因此，他們給予印度僑民的壓迫，就一天嚴刻其一天，於是甘地在南非洲的「撒提亞格啦哈運動」，便正式開始了。他在一九〇六年的九月，召集了一個印度人民大會，大家舉行堅強的宣誓，誓以「撒提亞格啦哈運動」，來反抗政府的命令，雖冒任何危險與犧牲，亦不顧惜，亦不屈服。

這個運動，奮鬥了七八年之久，即從一九〇六年起，至一九一四年止。最初發動於曲蘭斯伐耳（Transvaal）省，後來普及到全南非聯邦。在這個運動當中，甘地和他的同志們，曾有好幾次被捕下獄，並罰作苦工，但他並不因此減少他的努力，反之，正因多次的刺激，反抗的精神，更如潮一般的高湧起來。結果，終把政府的殘暴的法令——如「亞洲人的登記法案」如每年每一個有色人的「三鎊人頭稅」的新律，如印度人的婚姻註

冊法案——都給完全推翻了。這時，「撒提亞格啦哈運動」得到了完全的勝利，而甘地在南非洲的活動，也就告一段落了。

甘地在一九一四年十月，返回印度，又嗅到了故鄉的風味。他化了一年的時光，週遊印度一遍，從事於社會服務，并藉以熟習國內各地的詳情。他的足跡所到之處，都受着民衆熱烈的歡迎。

這時，甘地知道他的「撒提亞格啦哈運動」，是必須在印度舉行的。但是在舉行之先，不能不有相當的準備，所以在一九一五年，他便在阿麥達巴得（Ahmedabad）附近，創辦了一個「撒提亞格啦哈阿什蘭」（Satyagraha Ashram）——即「真理學院」。這個學院，正和他在南非洲辦的新村一樣，是後來他在印度所舉行的「撒提亞格啦哈運動」的試驗與準備，也就是他在印度運動的中心與大本營，因為他後來在印度的種種運動，都是由這個學院中發動出來的。

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之中，甘地爲民衆解除痛苦，曾做了三次「撒提亞格啦

哈運動」。第一次，是在印度的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地方，爲農民打倒了殖商人的壓迫，第二次，是在開拉（Khairatpur）地方，爲農民取消了土地稅，第三次，是在阿麥達巴得地方，替人向阿麥達巴得工廠廠主求得了工人的合理待遇。這三次運動，前兩次都是與政府有關係的，但是甘地卻盡力使之完全成爲社會性，而不使之擴大爲政治運動，以表示他對於英政府的誠信。因爲直至一九一八年，甘地對於英政府，還是取忠誠與合作的態度。他以為如果英政府真能以「正義」「平等」爲立場，爲印度國家人民謀利益，則印度並不一定要與英國脫離，以求得那獨立自由的虛名。

但是，甘地這種務求實際不盜虛名的合作的主張，在歐洲大戰結束以後，就一變而爲「不合作運動」（Non-cooperation Movement）了。因爲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英國在歐戰中處境危急的時候，曾以允許印度獨立的籠絡手段，騙得了印度很大的助力。迨至一九一八年年底，大戰結束之後，大英帝國乃「食言而肥」。這種不講信義與違背道德的事實，已使印度人民再也不能忍受，而爲英國爲鎮壓印度人民的政治高潮起見，又

採行了「羅拉特法案」(The Rowlett Bill)，即對於印度人民的行動，認為「革命」或「叛亂」者，政府可以自由處治，而不經過法庭的公開審判。印度人民對於這個「免死拘禁」的法案，更是深惡痛絕。印度全國沸騰了，而甘地遂亦不能不領導印度人民，來反對英政府，以求民族的解放了。

甘地爲對於「羅拉特法案」表示抗議與悲憤起見，在一九一九年初，宣佈了一個全國總罷工與罷市，全國各地，都熱烈的舉行，於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遂在阿木里察 Amritsar 發生了一幕怪誕的慘劇。這幕慘劇的發生，因爲阿木里察的人民聽到甘地爲領導罷工與罷市而被捕的消息，激起了劇烈的暴動，這時英國的戴哀將軍 (General Dyer) 下令，向大多數沒有武裝的印度民衆——男人，女人，小孩——開槍。他們沒有方法逃脫，結果被槍殺五六百人，受傷的，更不計其數。至是，甘地覺得若再與英國合作，簡直是一種罪惡，於是運動全世界的「不合作運動」，遂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正式開始，而遂引起印度全國了。

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的範圍與方案，共有八條，於一九二〇年九月，經「全印度國民大會」[All-India National Congress]在加爾各答[Cochin]所舉行的特別會議，一致通過。同年年底，國民大會又在吡叻坡[Norfolk]開常年大會，又對於「不合作」案，予以追認，並略加修正，成為下列八條：

「一」拒絕一切英政府所賜給之官銜，爵位，及名譽官職。

「二」戒絕酒類。

「三」一切男女學童，不受英國教育，免為外人奴隸。

「四」設立學校及大學，以印度國語及手工業為主要科目，以英語及其他歐洲語文為

次要科目。

「五」排斥英國司法制度及英國式之法庭與律師。

「六」抵制外國布，使用印度土布。

「七」印度人不再在英政府及不列顛軍警行伍中服務。

「八」不繳納租稅。

當甘地初發起這個運動的時候，英政府尚不甚介意，認為不足重輕，那知道，甘地聲高一呼，全國響應。律師紛紛從法庭撤退，公務員紛紛辭職，父兄們把子弟都從政府的學校，召回家來，抵制英貨，拒絕納稅，以及退還官銜和勳章等等，在在都是表現堅決「不合作」的事實。但這時，對於印度鄉村經濟最關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使用手織棉布。隨著「不合作運動」的發展，最後就是一直到印度半島上的最僻遠的鄉村裏，都恢復家庭紡織了。這立刻就困窘了英國的輸入，復興了印度的鄉村經濟。這就是甘地實行他的「回到手紡車去」的政策成果，所以說，手紡車——即「差卡」——是甘地復興印度民族的一個重要的工具，也是印度民族復興的一個重要的標幟。

「不合作運動」成了甘地的一個政治武器，同時又成了全印度的一個精神力量。這個運動的最要條件，本為「不暴動」，這是甘地的「阿喜姆沙」[Ahimsa]教義。「阿喜姆沙」，就是「非殘暴」[Non-Violence]。「阿」的字義為「不」，「喜姆沙」為「傷害」，合起來，就

是「不合作」，凡是有「傷害」，就是「殘暴」。甘地的主張，是要全印度人民以絕對的「愛」，以克服英政府的「殘暴」，以絕對的「和平」，克服英政府的「武力」，用極端「犧牲」性的精神，以忍受因運動所控致的任何痛苦。

但是，甘地的這種教義，在英國的暴力壓迫之下，欲使三萬萬五千萬人民，完全奉行，當然是一件極難的事，果然，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又發生了趙里龍拉（Chauri Chaura）事件。一羣憤怒的印度人民驅逐并燒死了一夥警察。這事使甘地極為傷心，他認為印度人民尚未成熟，但是他認為自己應當負責，所以俯首貶抑，并且絕食五天，以時暴動的羣衆所犯的罪過。

本來甘地正在準備由「不合作運動」進而為「文明反抗」（Civil Disobedience），開始反抗法令，實行不納稅給政府。但是因為趙里龍拉事件的發生，他便把這「文明反抗」的運動停止了。這自然要遭印度人的訕笑，并引起同志的灰心，可是他所企求的是「真理」與「和平」，那超乎人之上的權利，不是他想得的，他寧肯讓人笑他怯懦，亦不

背違背他的企求「真理」與「和平」的良心上的主張啊。

甘地雖然極力制止人民暴動，但是在英政府的壓迫與威逼之下，暴動仍是不斷的發生。甘地的「文明反抗」雖然停止了，而「不合作運動」仍是繼續風行，不可遏止，因此英政府便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把甘地逮捕了。這時他很愉快的說：「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我逮捕。……我希望人民應該保持一種完全的自制，把我被捕的日子看作是快樂的日子」。

甘地入獄之後，「不合作運動」失其領導，就漸漸有不振之勢了。這時全印度國民大會內部，又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取消「不合作運動」，用立法手續，加入議會，而求達到自治，這一派叫做「合作派」；一派主張仍繼續「不合作運動」，并更進而實行「文明反抗」，這派叫做「不變派」。因為兩派的主張不同，所以彼此間衝突，異常劇烈。同時，印度教集團與回教集團的爭鬥，又起了紛爭，因此「不合作運動」便在無形中停頓了。

甘地在監獄裏將近兩年，忽然發生了很嚴重的盲腸炎病，因為要施行割治，乃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四日，無條件的被釋放了。甘地出獄之後，眼看國民大會內部的分裂和印回兩教的紛爭，心中感到萬分的痛楚。他認為外面的強敵並不可怕，所以怕的是內部有下裂痕，所以這時，他一方面要為國家民族以與英政府奮鬥，一方面又要彌補內部的裂痕。他彌補內部的唯一辦法，就是自己受苦，以替國人擔過。於是，他便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四日起，首先為印回兩教的紛爭，實行絕食二十一天，希望由自己苦行的榜樣，使印回兩教恢復舊好。這個「偉大的絕食」(Great Fast)，真使印度全國人民，無不感動。這時印回兩教的領袖和其他各團體的重要人物，都聚集在他的面前，誦經祈禱。最後的一天，甘地喝了一點橘子汁後，便結束了他的「偉大的絕食」。

其他絕食完竣之後，各領袖便開了一個團結會議，從此印回兩教就重新聯絡起來，以爲國家民族的共同福利而奮鬥。同時，甘地把國民大會內部及各黨派間的矛盾，又一「因勢利導」的加以調整，使它們都能夠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各行其是。甘地對內部

裂痕的彌補，至此已告成功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英國派遣了一個「西門委員會」[The Simon Commission]，到印度去準備改革憲法。這時英國駐印度總督伊文爵士[Lord Irwin]宣稱，英政府認為印度憲法改革的自然結果，就是獲得自治領的地位，但是這種宣布，只是一口惠而實不至。因此，雙方又展開了鬥爭的陣線。印度羣衆的憤怒又燃燒起來了。甘地給伊文寫信說，他認為英國的統治是「一個禍端」，他向「惡魔的」政府提出來要求，但遭受了拒絕。因此，在一九三〇年三月，「文明的反抗」又開始了——比以前更來得有聲有色。

這次反抗，是始於甘地所領導的「食鹽長征」[Salt March]。食鹽曾是——現在還是——英政府的專利，鹽稅之重，使貧苦的人民無法爲生。甘地便抓住了這一點，做爲每個人鬥爭的起碼。這次的長征，要算是近代史上最轟轟烈烈的一幕了。甘地領着一隊義勇隊，由真珠學院出來，慢慢的穿過了印度大陸，向着丹迪[Dandi]海岸前進。去

實行製鹽，以破壞政府的「鹽律」[Salt Act]。甘地在羣衆擁護之下，終於達到了丹地海邊。從水裏汲取食鹽。於是全國仿效，遍地風行。甘地又打算進而破壞蘇拉特(Surat)和孟買의鹽場，并且使令人民抵制外布，排斥酒類。這時，英政府見其情勢愈來愈猛，且有牽及其他法律的危險，乃於五月四日中夜，又把甘地逮捕了。

這次甘地被捕之後，印度的情形，却和一九二四年不同了。全國人民，仍然奉行「文明的反抗運動」，真是前仆後繼，百折不回，幾千幾萬的羣衆，都慷慨激昂，投入監獄，而不願停止其運動。弄得英政府無法應付，於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甘地釋放，並方議定，甘地暫將反抗運動停止。這時英國又在倫敦舉行「印度圓桌會議」，邀請甘地參加。因爲會議裏對於印度自治的實際問題，一點沒有提到。甘地乃宣告退出返回印度，仍繼續推行他的反抗運動。遂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又被捕入獄。這時印度人民的反抗運動，不但沒有中輟，反而引起了更大的怨怒與仇恨，因此就發生了許多嚴重的亂子。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英政府又在倫敦召集第三次「印度圓桌會議」，決定實行改革印度憲

「非暴力」(Satyagraha)。這時印度人民已精疲力盡，大小領袖，自甘地以下，被關下獄者，多至七萬五千人，各種事業的破壞與財產的損失，更是不可以數計的。至是，幾年來轟轟烈烈的「文明反抗運動」，遂又不得不暫告停頓了。但是，英國對印度兩件讓步的事——一是改革印度憲法，許印度以「聯邦自治」，二是甘地所領導的國民大會得於一九三七年，參與立憲的工作——不能說不是一文明反抗運動「所收的成果啊」。

甘地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再被釋放後，乃專力從事於印度的「賤民解放運動」。賤民是在印度社會四大階級——僧侶階級，貴族階級，平民階級，奴隸階級——之外的一種人民，他們被叫做「帕利阿」(Pariah)，又被叫做「不可接觸者」(Untouchable)，他們的數目約有五千萬，這種人在印度社會中，簡直沒有做人的地位，他們不得進公共的學校，不能入公共的廟宇，甚至連公共的大路都不得走，公共的井水都不得取，以免與上等階級的人相接觸。這種「不可接觸風俗」(Untouchability)在印度社會中，已成為一種定律，千年相沿，沒有能夠更改，甘地既憎恨這種怪惡的風俗，又悲憫這種

可憐的人民。他時常說：「『不可接觸風俗』，實爲印度教的一個最大的惡魔與最大的玷辱，印度若不消除這個惡魔與玷辱，要得到獨立自治，是不可能的。」

其實，甘地對於打破「不可接觸風俗」，老早就隨時隨地的在進行着，他在歷屆國民大會裏，平日演說作文章，都在提倡打破這種怪惡的風俗，不過沒有集中力量罷了。這次他專力的要打破這種根深蒂固的「不可接觸風俗」他舉行了一個嚴重的自懺，一面替「不可接觸者」受苦，一面替印度教人担過，他的自懺，就是實行絕食三星期。絕食之後，他便週遊全印度各鄉市城鎮，一面喚起上等階級的印度教人自覺，一面教「不可接觸者」組織團結，又給他們立學校，興實業。他每到一處，萬民歡騰，至一九三四年八月，他的這個「賤民解放運動」，便完全成功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全印度國民大會在孟買開第四十八屆常年大會時，甘地辭却了他的獨裁領袖的職權（這個獨裁的職權是一九二九年國民大會所賦予甘地，使他負責指揮一切反抗事宜的——編者）。他雖然表面上辭却了領袖的職權，但實際上，因爲他已處

爲印度全民族的靈魂，仍在幕後去負着他領導的責任。他所以要脫離國民大會的原因，是爲了使他自已更忠誠一些，更超然一些，他願意自己處於一個裁判的地位，不僅能緩衝於國民大會內各黨派之間，而且又能緩衝於國民大會與英國人之間。另一方面，他要藉着僻居鄉村的機會，專力從事於鄉村經濟復興運動——如恢復印度鄉村家庭工藝中之手紡織等，以奠定復興印度國家民族之基礎。所以甘地現在大部份的工作，除了國民大會的工作委員會開會的時間以外，都集中在復興鄉村，并由此而阻止鄉村人陷入城市裏的可怕的污坑裏面。他關於鄉村的福利和經濟的計劃裏，有五點有價值的綱領：一、獎勵家庭紡織，二、提倡鄉村的職業教育，三、改進衛生，四、提攜「不可接觸者」進入社會，五、獎勵鄉村工業。

一九三九年二月，甘地的故鄉拉甲可特（Rajkot）的民衆，因爲遭受了地方統治者的壓迫，發生了紛擾。甘地爲解救他這故鄉人民的痛苦，便又實行一個新的絕食。這次的絕食，正如他早年的絕食一樣，全世界都在屏息的注視着。他絕食了九十八小時又二

十五分鐘，一直到英國人表示讓步爲止。

關於甘地一生爲國家民族而奮鬥的偉大事績，已經從最初說到最近。我們看他一生的歷史，可以說是一篇反抗「強權」與「暴力」的歷史。在他一生奮鬥的過程中，他受盡了苦難的折磨，但是他對於苦難，不但不感覺其爲苦難，而反甘之如飴，認爲是人類成功的試金石。他的有名的關於苦難的一段話說：

「苦難是人類種族的標誌，它是萬世不易的法則。母親遭受苦難，於是她的孩子降生了。生命是從死裏來。麥子生長的條件，是必須種子消滅。沒有一個國家的興起，不是經過苦難火燄的磨鍊的。……苦難的法則既然是大千萬物不可少的生存條件，所以不可把它除掉。進化須由所遭受苦難的數量來衡量，……所遭受的苦難越單純，進化也越巨大。」

甘地一生奮鬥的結果，到現在雖然未能使印度完全脫離英國的羈絆，但是印度獨立自由的幼苗，五是因為受了他的培養和灌溉，而在發育滋長。雖然沒有開花於現在，亦

必要結果於將來，我們同情於印度民族的人們，只好拭目以待了。

甘地今年——一九四〇——已經是七十一歲了。他的體格和精神仍是健旺的。在他六十二歲和六十六歲的時候，有人說他「還是一個青年中的青年」，相信這句讚語，仍可應用以形容現在年逾古稀的甘地。我們希望他老人家，為印度，為人類，在這多苦多難的世界裏，多住些時日！

尼赫魯

「啊，印度的寶貝，……」，「啊，犧牲的化身，……」，尼赫魯的太太，姊妹和他的女兒，常這樣用印度羣衆所賜給他的光榮的渾號來稱呼他。

尼赫魯 (Pandit Jawaharlal Nehru) 是印度一位僅次於甘地的民族英雄，因為他在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中，發着做甘地的繼承者，但是他並不像甘地那樣單純，他比甘地複雜得多。他是一位已經完全西洋化的印度人，他是一位由貴族而變成的社會主義者，他也是一位成功偉大羣衆領袖的個人主義者。此外，他還是一位具有現代頭腦的人，是一位富有理智的人——是一位唯理主義者。他在階級森嚴和宗教狂熱的印度大陸，偏偏能混去階級的觀念，又厭煩教儀的束縛。因此，他常被稱為「不可思議的尼赫魯」及「現代化的尼赫魯」。他面對着印度的中古遺風，既須向大英帝國作鬥爭，又須向自己民族的深溝峻壑的教條固守主義作鬥爭。他的鬥爭，是以二十世紀的新頭腦，來進行一個猶

停留在中古以前的民族革命。就在這一幕上，尼赫魯要寫出來一部現代的印度歷史。

尼赫魯是在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阿拉哈巴（Allahabad）。他的家庭，原始於喀什米爾（Kashmir）的山中，最先奠居在德里（Delhi），後來喬遷到阿拉哈巴。他的家庭是屬於貴族階級，但是素有服務社會的深厚家風。

尼赫魯的父親毛提拉爾·尼赫魯（Porfir Motilal Nehru），是印度的有名的律師，收入甚豐，所以少年時代的尼赫魯，除了雇有英國的保姆來監護，又聘有英國的家庭教師來教讀。因此，他自己常說：「我幼時承家庭的庇蔭，絕無奇事可言。」但是他在幼年時，就富有桀傲不馴的氣概。當他聽着他的兄弟們談到英國人怎樣殺戮印度人，怎樣不許印度人坐火車裏的包房，怎樣不許印度人坐公園的椅子……他就氣憤填胸，思想起而報復。

一九〇五年，尼赫魯十五歲的時候，就負笈英倫，就學於哈洛（Harlow）中學。因為他的成績優良，校中獎以屈勒維廉（Trevelyan）所著的「意大利建國偉人加里波的傳

一，他讀了這本傳記以後，便立志要做印度的加里波的。

尼赫魯在哈洛中學讀了二年，就轉入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研究化學、地質、植物三科，并拿文學、歷史、政治、經濟、哲學各書，作為課外的研讀。這時文學對他很有吸力，他因受了王爾德（O. Wilde）和裴德（Walter Pater）作品的影響，頗傾向於享樂主義，但是他所說的享樂，並不是縱慾無度的意思，乃是不像宗教家視人生為罪惡的態度。他自己嘗說，他素愛冒險之學，對於金錢，對於人生大問題，常以賭博者自居，雖孤注一擲亦所不惜。他又讀了湯生德（M. Townsend）所著的「亞洲與歐洲」，深受感動，回到印度受治於英國的恥辱，便激起了他的反抗的決心。

尼赫魯在一九一〇年畢業於劍橋後，又專攻法律二年，得了律師證書，便於一九一二年，返回印度，這時他纔二十三歲。

尼赫魯回國以後，就執行律師的業務，但不久的時候，他對於這種呆板的職業，感覺厭煩了，常有棄律師而投身政治的意思，於是不久就參加了民族解放運動。這時他的

生活馬上就給他很深的磨練。任何情形，都使他不能不和政治發生密切的接觸——例如一九一六年在他的父親家裏所磋商成功的全印度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的聯合。就在這個時候——一九一六年——他認識了甘地。他對於甘地的批評是：『所有我們都很讚美他（指甘地，下同）過去在南非所立下的光榮戰功，但是他對於我們許多青年人，似乎有很遠的距離，有很多的差異，並且很不政治的。』

一九一九年，甘地擬定實行其「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這種運動的範圍及方案，已詳述於「甘地」一文。）後，全印度國民大會於一九二〇年，在加爾格答（Calcutta）開特別會議，同年又舉行常會於那格坡（Nagpur），都是研討「不合作」的方法。自從這兩次會議之後，全印度的人民都歡騰鼓舞起來了，好像解放的時期行將來臨似的。尼赫魯在他的自傳裏，描述印度人當時準備犧牲的心理說：

「一九二一年中，凡為國民大會方針工作的人……都在滿丁刺激，樂觀和熱烈。各人都自覺其為正義而奮鬥。吾人絕不躊躇與懷疑，因為路途既已認清，只有前進，和同

志之聞見，勉勵而已……

「同時吾人心中，有自由的感覺，而且自傲其得此自由。從前受壓迫受制裁的心理，完全消滅了。我們再聽不見有輕聲軟語，又聽不見有斟酌法律字句，以免召忌的商討，我們簡直發表心中之所欲言而大聲疾呼之，至於結果怎樣，認為可以不去管它，就是入了牢獄，亦所甘心。每個人要準備入獄，惟有這樣，才可以發展國民大會所決定的運動（藍指「不合作運動」——編者）……」

「我們不僅對於這種政治工作，表示滿意，自信獲得自由的日子不遠了。同時我們覺得我們的方法和目的都勝於敵人，因此我們又有一種道德的優勝心。我們自幸得到這樣的領袖（意指甘地——編者）與其方法。我們雖然在鬥爭之中，而心裏倒是覺得寧靜自若。」

尼赫魯——其他許多印度人也是這樣——對於民族革命的事業，既抱有這樣的信心，并且對於甘地的運動和方法，又那樣的讚美，所以在甘地的「不合作」的方案宣佈以

後，他就拋開了他平日所愛好的家室，朋友和書籍，竭全力以從事於這種運動。

不久以後，尼赫魯的生活到了轉捩點。他偕同他的抱病的母親和妻子北上去莫蘇里（Mussorie）——適遇一個阿富汗的代表團——在一九一九年阿富汗戰爭後，來和英國議和的——和他住在同一個旅店裏。這時英國的警察疑忌他來，有和阿代表密談的意思，就命令他不准和他們接觸，但是天生高雅的尼赫魯，竟拒絕了這個不合理的命令。因此，三正式被從莫蘇里驅逐出境。這是他和英國統治者衝突的第一遭。從這以後的兩個星期中，他沒有什麼工作，但結果，他對於農民和他們的疾苦，都得到了相當的瞭解。莫蘇里事件使他對於印度問題，愈益關切。

尼赫魯在過去，本已有了不確實的社會主義者的傾向，現在這個傾向開始深入而堅牢了。他會和一些同志到小農場去訪問農民，他直接看到了農民的疾苦，聽到了農民痛苦的呼聲。他在他的自傳裏這樣描述說：

「他們對我們表示無限的熱情，他們用親愛的和希望的目光注視着我們，好像我們

是福音使者，是能導引他們到理想希望之境地的嚮導者。我注視着他們的無限憂鬱和奔放的感激的情緒，使我充滿了慚愧和憂愁：慚愧的是我自己的優裕安逸的生活，和我們僅限於城市的狹隘的政治活動，對於半赤裸着的廣大的印度兒女們，完全沒有注視到；憂愁的是印度的落後性和難堪的貧困。一幅新的印度圖畫似乎擺在我的眼前，那就是赤貧，飢饉，被壓榨，和極度艱窘悲慘的一幅圖畫。」

一九二一年是印度「不合作運動」表現得最熱烈的時期。這年冬季，英國的太子來遊印度，印度人本着「不合作」的原則，拒絕招待，於是政府根據其一九一九年所頒佈的「羅拉特法案」(Rowlatt Bill)，逮捕一切抗命的人，因此，尼赫魯就開始了他第一次的監獄生活。

一九二三年，尼赫魯出獄以後不久，緊接着又在奈巴(Nagpur)被捕了。他偕同幾個同志到奈巴那裏去調查社會情形，因為沒有人境的護照——其實這不是正當的理由，他們全被逮捕了。尼赫魯被一個既不識英語又不懂印度語的法官從滑稽的判處了兩年

半的有期徒刑，幸而又被停止執行了。

截至現在——一九四〇年，尼赫魯前後共入獄七次。牢獄或牢獄的威脅，曾消磨了他一生的黃金時代。總計前後他被判處了十年半的徒刑，其中有幾次，判決而未執行，又有幾次，未滿期就被釋放了。所以實際上，他不過嚐到了五年半的鐵窗風味。他最後這次入獄，是在一九三四年。這是在「和平抵抗運動」被停頓以後，他在加爾格答發表了一個主張暴動的演說，因此就被捕了，被判處了兩年的徒刑。

尼赫魯雖然不像甘地那樣崇拜牢獄生活，且他也不大感痛苦。他在牢獄的生活當中，通常是受優待的。雖然也曾受了許多的虐待，准許他看書和攜帶一切文具。因此，在獄中時，他把他的六一七頁的那本自傳，大部份寫成了。他這本自傳是精細的，複雜的，有邏輯力的，有無限修養的，浸潤着很多的疑問，充滿着理智上的熱情。印度總督伊文斯爵士（Lord Irwin）曾說：「任何人不論『尼赫魯自傳』，就不能瞭解印度」。這本自傳不僅是一部最銳利透闢的自傳，也是一部整編印度社會史，是一部印度民族生存

發展史。

在尼赫魯的自傳裏，有許多美麗的章節，描述他在獄中生活的情景。他曾以帶有希望的目光，來一注視着太空中微渺而蔚藍的帳幕，就是囚徒們稱呼的蒼天；注視着飄忽搖動的白雲，在天海裏張着銀帆。他不像甘地那樣視苦如飴。他自己說，他在天性上不是個慣於自省的人，但牢獄生活，却給他一個深邃研究政治和深自內省的機會。這時他的社會主義的信念，已經具體化了，并且浸假和他的民族主義融和在一起。他開始看到，印度問題並不是反抗的印度民族主義者和英國的國家主義者之間的鬥爭問題。他瞭解了祇有由資本主義長成的英帝國主義，纔是他們真正的敵人，打倒英帝國主義，必須從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兩方面着眼。英帝國主義的基礎，是建築在帝國的政治要求和經濟的剝削上面，所以一個合乎邏輯的英帝國主義的反抗者，不僅必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同時也必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是尼赫魯的基本信條。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企圖把這個基本信條講給印度人民，使他們都能深刻瞭解。

一九二五年，尼赫魯因陪同他的夫人凱瑪拉（Kamala）到歐洲治病，乃又得到遊歷歐洲的機會，曾出席於比京被壓迫民族會議。在一九二七年冬，他返回印度以後，認為印度的出路，只有兩個：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但是他的成功，還是歸功於民族獨立問題。一九二九年，他的一「印度獨立決議案」，在國民大會裏通過了。不久的時候，他又曾更改為「獨立日的誓約」，并以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六日為第一獨立紀念日。現在把這個誓約裏最重要和最精彩的兩段摘錄如下：

「吾人確信印度人民不容移讓的權利——同時也是別國人民不容移讓的權利，即為享有自由，享受本土所產的成果，且獲得每日生活品，以實現其完全發展的機會。」

「吾人又確信任何政府奪取人民這種權利而施行剝迫者，其人民就有改造或推翻政府的權利。印度的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政府，不獨剝奪印度人民的自由，且專以剝奪印度人民的利益為事，而在生計上，政治上，文化上，精神上，都把印度弄到衰亡的地步。因此，吾人確信印度必須對英國斷絕關係，以達到完全的獨立。」

此外，對於英國怎樣剝奪印度人民的生命，怎樣破壞印度的手工業——如手紡紗之類；怎樣榨取印度的金融；怎樣消滅印度人民的政治自由；怎樣使印度實施奴化教育——尼赫魯都給有誓約裏一一揭穿，並且最後又說：「吾人認為對於這種加害於印度人民的政府，若再忍受下去，簡直等於對人類對上帝的犯罪行為。」因此，他在誓約裏又提出「文明反抗」，從「不合作」和「不納稅」做起，手抵抗英政府，以求達到完全自治的目的。

尼赫魯的這種提議，正是印度三萬萬人民一致的要求，所以一下就被國民大會，就得到全場一致通過，成為「獨立決議案」。從此以後，尼赫魯的聲譽，就一天一天的增高了。他在一九二九年被選為國大黨主席以後，更受到羣衆熱烈的讚揚和擁護。一九三〇年，他受到熱烈的英雄崇拜，一躍而為民族英雄，一躍而為他身「這類的讚揚之詞，就是羣衆於熱烈崇拜之中所流出的愛慕」。這聲音在印度所受到的崇拜，可以說除了甘地一人之外，再沒有能和他比擬的了。

自從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即「文明反抗」開始實行的日子——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在這幾年的當中，尼赫魯除了如同甘地領導「文明反抗運動」和時時刻刻不斷的奮鬥外，他的大部分的光陰都消磨在牢獄裏邊。他雖然投身在縲絏之中，過了非人的生活，但是他爲民族求解放的意志，仍是堅定不移。這是因爲他老早就認清了獨立與奴隸的兩境之中，不容有遷移的領地啊！

一九三五年九月，尼赫魯因爲他的夫人凱瑪拉在瑞士病危，要去探視的關係，他得到了政府的允許，就從最後的監禁裏被釋放了。原來凱瑪拉已經患病多年，當她在印度時候，英人自動的想恢復尼赫魯的自由，以便照拂他的夫人，假設他肯非正式的担保允許放棄他的政治活動。他拒絕了這個提議，同時凱瑪拉也要他拒絕這個提議。由此可知他的革命意志，是何等堅決啊！在一九三六年，他的夫人拋棄了他和對他革命事業的協助，他竟與世長辭了。

一九三七年，印度新政府條例頒行，尼赫魯發表宣言，反對政府強迫國民大會參加政

府，於是也巡行國內，在一個障礙叢生的運動下，幾乎匹馬單槍使國民大會在七個省份內獲得勝利。全印度都擁護和愛戴他，擁護和愛戴他的程度，幾乎和擁護愛戴甘地一樣。

尼赫魯所以能夠受人擁護愛戴和得到權力，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主要的是因為：（

一）他在政治上的堅定性，是不可動搖的。凡是他所選定的道路而又信其為正確者，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使他拋棄；他不喜歡妥協，他不像甘地那樣有時而動搖不定。他決定一件事物，很小心謹慎的，既經決定之後，就必定遵手。（二）他是胆魄雄渾和勇敢鬥爭的人。這從他每次領導反抗政府的運動中，就可以知其大無畏和勇敢鬥爭的精神了。（三）他是「先天下憂之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這從他的同情於困苦農民大眾的一段描述裏來看，再從他的「印度獨立決議案」——即「獨立日的誓約」——的全文來看，就知道他的「民胞物與」的胸懷了。（四）他對於自己的職務，是一個技術的長才，例如，有一個時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是阿拉哈巴的一位優良的市長。（五）他是一個為國家民族而尊賢敬長的人。本來甘地的性格和主張，並不是他全然都贊成

的，可是他因為甘地「終歸改變了印度的面目，給一個屈辱的和頹敗的民族以自尊心和地位，並使印度問題成爲一個世界問題」，他却極力的去讚揚甘地，他指出甘地的「驚人的不可抗拒的精神力與對人民微妙的權力」和「無盡藏的精神力量」。總而言之，他這一切優點，都是他受到「英雄崇拜」的主要條件。

一九三九年，尼赫魯正式辭去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他這種舉動，在表態除印度完全獨立外，國民大會所採任何政策，他都不負責。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這位印度革命領袖，蒞臨了我們戰時的首都——重慶，代表晉謁我革命領袖，代代印度各位革命領袖祝我抗戰勝利，建國成功。於九月五日，尼赫魯完成其中印合作旅行，而返回印度了。

我們總括起來看尼赫魯的一生——他現在是五十一歲了。從他留學返國的那一天起，他所表現的是：除了領導民族革命，就是渡其獄中的生活。他的一生，可以說並沒有尋常歷史上的所謂功勳，但是世人都看他是政治上的偉人，而印度人民都崇拜他爲英雄。

的，就是因爲他的志願和行動，是在於求印度民族的自由獨立，雖犧牲個人塵世的享樂而然所惜。他曾說：『吾人超脫各自之小我，而盡瘁於民族之大公，此吾人所以取得其活力與重要性也。』這種『民族至上』的觀念，是他一生的行動指針。至於沈毅堅決與不妥協的性格，便是他戰奮的精神。我們正在爲自由獨立而戰鬥中的中國民族，對於尼魯赫這種充滿奮鬥活力的生平及其人格，當然要表示無限的崇敬和欽佩！

凱末爾

世人一提起凱末爾(Mustapha Kemal Pasha)將軍，就想到他是「歐羅巴的損失」土耳其(Turkey)的救星，因為他曾把土耳其從危亡中拯救出來。我們要知道他怎樣拯救土耳其於危亡，也就要先了解土耳其民族，就必須連土耳其興衰的歷史，很簡略的說在一起。

土耳其人原是歐羅巴上稱為突厥的遺族，信奉回教。十三世紀時，因為要避免蒙古民族的侵逼，由中亞細亞西遷，一二八八年他們的酋長奧托曼(Othman)，就在小亞細亞建國，以回教為國教，後來拓地日廣，人種宗教漸形複雜，算到現在已經有六七百年的歷史了。

凱末爾所拯救的土耳其國，原來和我們中國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我們中國從前隆盛的時代，也是進貢，威震八方，在國際上曾經很出過風頭，土耳其從前也是很出過風

頭的。可是，我們小國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喪失辱國，受不平等條約的壓迫，真是晦氣的時代，土耳其也是同樣的經過這個晦氣的時代。土耳其從一五六六年蘇利曼大帝(Solyman the Magnificent)逝世以後，就由盛而衰了。就內裏來說，有母后和宦官的亂政，軍隊的跋扈，蘇丹(Sultan)——即回教國王的稱呼——的腐化；就外面來說，土耳其飽受帝國主義者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侵略，締結不平等條約，喪失一切特別權利。在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特別發達之後，土耳其更被各野心國認為待決的「近東問題」，人人企圖染指，和他們所稱中國為「遠東問題」者，如出一轍，所以自一五六六年至一九二〇年（即十六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葉）的四百年左右，歷史家稱為土耳其的衰落時代。

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土耳其當時和德國親善，加入同盟國方面，結果完全失敗。一九一八年十月，土耳其乃求和於協約國，和協約國締結了「摩德洛斯休戰條約」(The Armistice of Mudros)，依照戰敗國的例子，一切都任協約國自由處置。海軍全部

交出，陸軍亦都繳械，同時，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一切鐵路交通及各處要隘，都被協約各國先後佔據和使用。這時的土耳其，真好像刀俎上的鯨魚，任人宰割。在這種極度危亡的局面之下，土國人民忍無可忍，終於一九一九年五月霹靂一聲，凱末爾——土耳其的救星——率領他的國民黨（Nationalist Party）同志，在小亞細亞的埃爾斯蘭（Ezronium），正式豎起了革命的旗幟，拚命奮鬥，把命在旦夕的土耳其救出了來！

凱末爾於一八八〇年生於巴爾幹半島（Balkan Peninsula）東北部的薩羅尼加（Salonica）。他誕生了不久，他的父親就死去了，只剩下他和母親及一個姐姐相依為活，後來他姐姐出嫁了，只有他的母親撫養他。由此，我們知道這位名震寰宇的民族英雄的身世，原來是孤苦零丁的！

凱末爾自幼就是頭角崢嶸，就有尚武的精神，他每一見着街上走過的土國的軍官，心裏就非常羨慕。當他母親想送他到回教寺立學校的時候，他曾說：『我不願意進和尚

的學校。我要去做陸軍軍人！」因此，在十四歲時，他就進了薩羅尼加的陸軍預備學校。那時，因為他的天資聰穎，又很勤奮，所以學科術科的成績都很優良，深得教師的鍾愛，他的凱末爾（Kemal）——土耳其語「正義」的意思——的名字，就是這時鍾愛他的一位數學教師所賜給他的。他在陸軍預備學校畢業後，便進了軍官學校。在這個學校畢業後，又進了君士丁堡的軍事大學，他的自由思想和革命思想，已在那時一步一步的潛滋暗長了。

凱末爾在軍中大學畢業的時候，纔二十二歲。他在君士丁堡的參謀部內供職，就開始了他的革命活動，立了一種自由黨，日夜勤勞，力圖黨務的發展。但當時正是專制魔王哈密德二世（Abdülhamid II）當國的時代，傾用了大批偵探，專以撲滅國內的自由思想，凱末爾的革命活動，不久就被哈密德嚴密的偵探發覺了。他被處了三個月的監禁。

但是凱末爾的革命思想，正燃燒着萬丈火焰，不是當時專制魔王的高壓政策可以鎮

服得住的，所以他在受過了監禁，被放派到達馬薩（Damascus）的騎兵隊裏去以後，毫無顧忌的又在達馬薩設立了一個自由黨支部，公然宣傳共產主義，浪費去了不少的光陰和心血。後來他想到在這種偏僻的鄉下，實行社會運動，有什麼效果？所以一天晚上，他就逃到埃及（Egypt）的亞力山大里亞（Alexandria），隨後他又化裝潛入他的古鄉薩羅尼加。當時薩羅尼加是土耳其革命的策源地，凱末爾在這裏積極的活動了四個月，仍被偵察發覺，乃又被放逐。後來因遇君士坦丁堡的陸軍大臣卸職，有了更動人員的機會，他再被調至薩羅尼加，任第三軍團司令部的參謀，他就拿這個機會做了革命的活動。當時還有一部份人，因鑒於土耳其國勢的危險，組織了一個青年土耳其黨（Young Turk Party），大本營已遷巴黎（Paris），移回薩羅尼加。凱末爾就把他所領導的自衛黨和它合併，造成統一進一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國內的革命團體，都受這個委員會支配。土耳其的革命事業，至此已由前備時代遞進而至實行時代了。

土耳其的革命運動，大概可以分做兩個階段：一爲一九〇八年的「青年黨」人革命，一爲一九一九年的一國民黨人革命。土耳其的救國事業，雖然在凱末爾一派的國民黨人發起第二次革命以後，纔有驚人的成功，但是凱末爾在第一次革命，也曾參與過，這對於他的經驗和知識，也很有關係。

「青年土耳其黨」在一九〇八年七月高揭革命一旗的結果，哈密德二世被迫恢復憲法，由「青年黨」人秉一。至一九〇九年四月，哈密德二世嗾使叛徒驅逐「青年黨」人，進行反革命運動，後經駐紮薩羅尼加的第三軍團擊潰，亂事平定。那時凱末爾以第三軍團參謀的地位，指揮平亂，異常出力，後日統率土耳其國民軍的凱末爾，此時已經小試其鋒了。

一九〇九年四月反革命運動平定以後，哈密德二世被廢，另立新君薩德五世（Mahmud V），但實際政權完全在「青年黨」首領安佛爾（Enver Bey）的手裏。這位安佛爾，原來也是君士坦丁堡軍事大學的畢業生，與凱末爾是前後同學，只因爲二人的主

張不同，所以變爲政敵。這是安佛爾既握政權，對於凱末爾的意見，當然不能採納，因此凱末爾就堅決的卸去政治上的職務，仍去做一個陸軍軍官。

凱末爾因與安佛爾不和，所以就被安佛爾逐到杜里波里(Durumci)防守希臘邊境去了。恰巧這個時候，發生希臘與土耳其的戰爭，凱末爾以無畏的精神，勇敢到前線，襲擊敵軍，因此他的面部竟受了敵彈，而致左眼失明。所以在他做總統之後，每早起來，第一件事工作，就是把他那隻巴黎製的人造眼睛，裝在左眼上去。

一九一四年，由巴爾幹的一角激起了世界大戰。這時熱血沸騰的凱末爾在葡萄牙得到土耳其行將參加德奧同盟作戰的報告，就急速返回君士坦丁堡，痛陳利害，極力主張土耳其嚴守中立，但是他這種國家興亡所繫的主張，不但不能爲親德派的安佛爾所採納，他反須受命統軍到達旦尼爾(Dardani)去，助德抗英。安佛爾這次調遣，原想借英軍之手結束凱末爾的性命，但是結果適得其反。凱末爾勇猛的戰爭，竟奏凱旋，這時連德國的報紙，都用大字排印，讀爲「現代英雄凱末爾將軍」和「土耳其現代的天才戰術家」。

，並且由於這次空前的大勝利，凱末爾竟被推爲加里波里半島（Gallipoli Peninsula）的土軍聯軍總司令。此後的凱末爾，就變成回教徒崇拜的對象。

凱末爾這次赫赫的武功，更燃起了他的政敵安佛爾挾嫌忌才的烈火。於是這陰險的政敵就利用自己陸軍大臣的權威，任命凱末爾爲高加索的軍團長，使他到俄國國境的激烈戰地，以爲這一次一定會結束了他的性命；但結果，凱末爾又立了偉勳。這時安佛爾的陰謀，乃完全歸於失敗。

一九一七年，凱末爾上給安佛爾一個很長的條陳，作最後的忠告，指出君士坦丁堡政府的腐敗，國家的軍力財力已在破產，若祇顧一昧的奉承德國，結果惟有亡國。這裏既披瀝了凱末爾愛國的熱忱，又表示出他識見的遠大，可知他不但是個堂堂的將軍，而且是一位見解高明的政治家。可是，他這種卓見遠識的條陳，不僅不能震動了胸襟險惡的安佛爾，反使他放逐凱末爾到德國，去做土耳其皇太子的附衛武官。

一九一八年秋間，土耳其國勢已臨到破滅的境地，與協約各國締結了「摩德洛斯休

被條約一以後，土國政府已變成了協約國的傀儡，這時一國土耳其也被解散了。這個時候，凱末爾和他的愛國心，如火如茶的燃燒着，他說：「土耳其之末日，無論支付若何犧牲，在外交上，非防禦列強之侵佔，在政治上，非改革政治，謀國家的獨立不可。」但當時的政府中人，都是外人的工具，非但沒有堅決的主張和勇敢的反抗，還把凱末爾放出君士坦丁堡，貶為小亞細亞東部埃爾斯倫州的一個小小鎮守使。那知這樣一來，反給予他一個造成新興勢力的機會，他就在這個小亞細亞的大草原上，着手土耳其第二次大規模革命的奮鬥，這時——一九一九年——的凱末爾，才是三十九歲的青年呢！

凱末爾在埃爾斯倫，撫輯流亡，整軍經武，從事於一種新勢力的創造。各處愛國志士，聞風響應者很多。不久，即發起國民軍，組織國民氣，對帝國主義和蘇丹政府開始奮鬥。國民黨是凱末爾做領袖，同志都是覺悟份子，實為「新土耳其」新生命之所自出！

後來——一九一九年十月，君士坦丁堡政府的內閣，以不堪攻擊而倒。新閣成立後，即由國民軍的要求，成立新議會，國民黨同志在選舉中，大獲勝利。於是國民軍的根據地，亦於此時由東部遷至小亞細亞中心的安哥拉（Angora）。現在新土耳其國民政府的首都。

一九二〇年一月，新議會召集第一次會議於君士坦丁堡。在這個會議裏通過了一個重要的議案，就是土耳其復興史上最著名的「國民公約」（National Pact）。後來歐美八十都稱這公約為「新土耳其的獨立宣言」，其重要的程度，可想而知。這公約原是凱末爾所草起的，共分六條，現在把其中最重的四點摘，摘錄如下：

- （一）奧託曼的回教民族所住的地方，不能分割；
- （二）居民多阿列伯人（The Arabs）的地方，由其投票自決；
- （三）西色雷斯（Western Thrace）亦由其居民自決；
- （四）所有政治上，司法上，財政上，及其他種種有礙土耳其獨立的限制，一律反

對。

由這四點看起來，「國民公約」是明白的反抗帝國主義的無理侵略，及其由侵略所造成的種種束縛，這實在是等於取消不平等條約，要爲土耳其取得完全的自由與獨立。

「國民公約」雖是土耳其再造的福音，但同時却是帝國主義者的眼中釘。所以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協約國軍隊，進至君士坦丁堡，一面要求土皇嚴懲國民黨，一面竟派兵包圍陸軍部，海軍部，佔領各重要交通機關，并逮捕著名國民黨黨員數人，其暴戾專橫的情形，使全國爲之髮指，而土皇不但不抗議，反表示贊同。於是國民黨與土皇政府，宣告決裂，在安哥拉召集新議會的各議員開會，改稱國民議會（General National Assembly）並議定，「根本組織法」（Law of Fundamental Organization）成立國民政府的國民政府，凱末爾以國民議會議長的資格，總理一切，氣象煥然一新。

一九二〇年五月，協約國把已經擬定的對土耳其的條約，交給土政府。八月十日雙方代表在巴黎西南的塞佛爾（Sever）簽訂了塞佛爾條約，Treaty of Sevres。這個

條約簽訂的結果，所有土耳其固有領土，都被分割爭盡，并且財政和軍事，須受英、法、意三國委員會的監督，治外法權和關稅限制等等不平等條約，都恢復了一九二〇年一月以前的原狀。這種亡國條約，凱末爾所領導的安哥拉政府一面警告舊政府，一面發表宣言，誓不承認，後來也沒有相當的結果。

先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希臘竟派兵佔據土耳其的士麥那，其勢洶洶，竟無磋商的餘地，於是凱末爾所統率的國民軍乃起而抗戰。國民軍和希臘軍苦戰了三年之久，其間雖由英、法、意等國，先後招請雙方代表會議於倫敦和巴黎，但都無效果。這次的戰役，因為凱末爾指揮有方，國民政府團結努力，軍隊已受新訓練，竟打得希臘一敗再敗，直敗到完全退出小亞細亞。凱末爾這種風馳電掣的勁旅，使帝國主義者爲之胆戰心寒！

土耳其既把希臘打得落花流水，又得力於對俄，對法，對意以及其他各國的靈敏外交，於是遂有兩次洛桑會議（Lausanne Conference）的召集，外方折衝，結果終歸締結了。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日的洛桑和約（Treaty of Lausanne），參加的，有英、美、法

、意、日、俄、土、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諸國。在會議的過程中，土耳其國民政府始終保持其一九二〇年一月之一「獨立宣言」——「國民公約」——的態度，百折不回，終於把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製，一概取消，君士坦丁堡的各國駐軍，也同時撤退。於是，塞佛條約將要消滅的「新月」——土耳其國旗——之光，從此又大放異彩於新土耳其的國土之上了。

當一九二二年，國民軍打敗希臘，接着就開和平會議的時候，由國民議會議決實行廢除蘇丹政治，從此以後，土耳其就沒有皇帝了。不久，新政府要查辦前蘇丹及各大臣，於是名義上回教主的前蘇丹穆罕默德六世(Mehmet VI)，也就倉皇出走了。國民議會另立伊凡第(Abul Mejid El-Fatih)為回教主，并增訂法律，嚴禁一切復辟運動。這樣一來，就把土耳其的舊政府及其歷來的一切積弊，徹底肅清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國民議會正式宣告土耳其為民主共和國，并在「共和國萬歲」的歡呼聲中，凱末爾被選為第一任大總統了。從此，非常時期告終，建設時期開

始。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正式頒布土耳其憲法，凱末爾執政的事蹟中，最驚人的，就是解除多年來宗教的束縛，使宗教與政治完全分離。此外如教育的普及，實業的振興，交通的發展，司法的改良，女權的提倡……都是凱末爾的建設事業，都在積極的推行，向着光明燦爛的路上前進。一九三八年秋，這位年將五十八歲的土耳其的大救星竟而與世長辭！這不但使土耳其人哀痛如喪至戚，就是正走在復興之路上的我們，亦同樣的深表哀悼惜之意！

土耳其常被稱為「近東問題」，和我們中國之被稱為「遠東問題」，是遙遙相對。現在我們看了凱末爾將軍怎樣把土耳其從危亡中拯救出來，我們——青年——當知如何的努力奮鬥，驅除倭寇，以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奎松

菲律賓 (Philippine) 自治領的第一任大總統曼尼爾。奎松 Don Manuel Quezon An^t nioy. Molina)，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正如凱末爾是土耳其的國父一樣。二十世紀的菲律賓羣島 (Philippine Islands) 的歷史，和奎松的傳記，是形成了不可分離的二位一體了。

奎松的爲人，是富於彈性，充滿着熱力。他是一個異常活躍的短小人物。他那放蕩不羈的和勇往直前喜歡惡作劇的性格，實足表現他是東方政治家中的一個活潑好動的頑童；但是他的胸襟非常沈毅，神經非常銳敏。他是世界上第一等的跳舞家，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最柔和最堅決的現實政治家。他喜歡打牌喝酒和穿漂亮的衣服，他也熱心愛國并愛好個人的事業。他在少年時代，就富有革命性，就被人斷定將來一定要變成一個革命家。這更引起少年時候的兩段軼事，以做證明。

當奎松是一位十八歲的少年的時候，有一天他父親帶他去拜訪本村的要人——當地
的牧師。按照當時的習俗，凡是拜訪牧師的人，必須一吻其手。這位牧師原來是一個胖
子，當他很莊嚴的坐在椅子裏，伸出他那隻胖手——好像專為接吻用似的——讓奎松去
吻的時候，這位年輕的奎松並沒有去吻，祇是和他握一握手罷了。在當時破壞了牧師這
樣尊嚴的禮節，是多麼驚人的一舉！這位牧師立即要求奎松的父親懲其不敬，而這位年
輕的奎松雖然暫時忍受，但却等待機會，以報此仇。他發現了這位牧師和本村的一個女
郎交好，因此他便設法和這位女郎相識，以後他和女郎二人並行街上，他很趾高氣揚的
把那位牧師所贈給女郎的手帕插在他的西服小兜裏面。

在同時：奎松又和這一村莊的另一個要人發生了衝突。原來是為爭另外的一個女郎
，和守衛隊的西班牙軍官口角起來。因而他便跑到這個軍官和女郎會面的地方，飽該軍
官以老拳。可是在當時毆打西班牙軍官，是一種罪大惡極的行爲，因此後來他就被捕而
監禁起來了。但當局為掩蔽口角事實的真像，並不提及女人的問題，他們僅僅聲言奎松

的被捕是因為他是一個革命分子——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本來在這個時候以前，奎松間沒有聽過菲律賓獨立運動這個名詞，可是從此以後，他對於革命便開始感覺有趣味了，他因為這件事情得着一種信念，就是革命者——不論其政見如何——總該是上等的人物。

這兩件軼事，雖然似乎瑣屑小事，却極關重要。奎松的天性本是愛進取和抗爭的，因而老早就被人認定後來總要變為革命家的，但由於這回早年就和書局發生衝突，更使他對於未來的奮鬥越發堅決起來，并且他也得到一個大的教訓，曉得他應該站在什麼立場。現在讓我來介紹他一生的事蹟在下面：

奎松是在一八七八年八月十九日生於呂宋(Luzon)島的白拉(Belar)小鎮。他的父親是菲律賓的一個學校校長，自然不算殷實，但亦並不是一貧如洗。他的母親莫林那(Molina)，也在學校裏面執教鞭。具有一半西班牙人的血統。孩子時代的奎松，天資是很聰明的，只是有一點懶惰性成。在學校的時候，他的綽號叫做『直率人』。他的父母勉

爲其難的把他送到八十哩遠的馬尼刺(Masila)去讀書。他首先進了一個名叫三元得列堂(San Juan de Letran)的專門學校裏，以後又在三多陶馬斯大學(Santo Tomas Univer-
sity)的法律學院裏讀書。後來他的學業便因參加一八九八年反抗西班牙的革命而中斷。從此以後，他便開始他的革命生活了。

原來菲律賓羣島是在一五二一年由西班牙的航海家麥哲倫(Magellan)所發現的，後
從一五六五年起就受西班牙的統治，共計有三百二十四年之久，至一八九八年，才轉
讓給美國。在西班牙人統治的時代，所有的實權都操之於當地天主教堂和幾個貴族及地
主的手裏，他們專以吸吮人民的膏血爲目的。因此，自從西班牙統治的時代起，菲島人
民就連續在愛國志士耶卜洛特(Tambolot)——一六二二年、大谷賀(Dagohoy)——一七
四四年，西郎(Silang)——一七六三年，以及李沙(Rizal)——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七年
這些人的領導之下，起而反抗西班牙的壓迫。從一八九七年李沙被殺之後，又有青
年亞昆那爾多(Aguinaldo)出而領導菲島的革命運動。當時亞氏年三十歲，著推爲獨

立軍的總司令，終久因爲軍需接濟不上，遭受挫敗，逃往香港。等到一八九八年美國攻佔西班牙的菲律賓領土的戰爭——即西、美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爆發的時候，亞昆那爾多就應了美國海軍提督杜威(Dewey)的商請，參加了美軍方面，以抵抗西班牙的軍隊。本來，亞氏的目的是在於幫助美國戰勝之後，能得到菲島的獨立——本來杜威當時也這樣允許他的，那知道美國戰勝之後，就把菲島據爲己有。亞昆那爾多在極端憎恨美國的欺騙之下，立刻就糾合同志，對美宣戰。但是烏合之衆，那裏能抵過精銳的美國軍隊？終於一九〇一年亞氏因挫敗而遭逮捕。

當亞昆那爾多對美宣戰的時候，少年的奎松湊趣兒似的也加入了戰爭。他站在亞昆那爾多的方面，在一年之內，便由士兵升到少校。在休戰旗幟之下前進的時候，有人即以亞氏被扣與戰爭結果一事相告，當時他還不肯相信。以後美國人便把他亦逮捕起來，押送到馬尼刺，叫他親眼去看亞氏被捕的實況。他在獄中住了六個月。他的囚室是在馬刺東南門附近城牆內的土窖裏面，距離他的三元得列堂母校不到百碼之遠。等到十五

年以後，他從華盛頓攜帶進茲法案（The Jones Act）——爲準備菲律賓獨立而草成的——回到馬尼刺的時候，已竟把這個門改稱爲奎松門，以資紀念。

菲律賓反抗美國的革命運動平定之後，奎松異常憤恨美國，當初和美國並肩作戰以反抗西班牙的菲律賓的志士們，更發現了他們是被人出賣了。因此；奎松在出獄以後，憤怒填胸，決計不學英語——亦即美語。但後來他遇到了一位美國軍官班德郝爾茲將軍（General Bandholtz）——是第一個他瞭解很清楚的美國人——才立刻發現美國人並非西班牙人可比。班德郝爾茲極力勸他學習英語，班比不但自願教他英語，而且反倒給他學習的新俸。以後班氏回祖國去了，他便拋棄了英語的學習，直到一九〇九年他作了駐華盛頓的菲律賓委員的時候，他才又以突飛猛進的速度學習英語。

奎松在從事革命以後最初幾年，所遭遇的情形異常困難。等到他不用去作零工以維持生活的時候，他又從新研究法律。旋因他父親逝世，他便回到故里百拉（Baler）整理家庭的產業。不久他就在塔巴亞斯（Tabayas）省開始律師的職業，他立刻獲得了他職業

上的成功。但這時政治活動的引誘又向他招手了，他便放棄了這個每月可得五百元收入的職業，去作每月僅得七十五元的檢查長一職，由於膽敢檢舉一個犯欺詐罪名的美國律師，而馳名全國；這事發生在一九〇四年初，在這以前，向來沒有聽說一位年輕的菲律賓人竟敢攻擊外國人。及至一九〇六年，他已經做了塔巴亞斯省的省長，一九〇八年，他才三十歲的時候，他就做了菲律賓議會的議長，顯然已成了一個未來的人物。

奎松從三十歲以後的二十五年中千變萬化的生活，都是環繞集中在一個問題上：就是從事於百折不撓的革命運動，以謀國家的獨立。在這個當中，有兩件事情是對於他有莫大幫助的：一件是在美國激盪起來的反帝國主義的高潮，想要在政治的立場上，使菲律賓逐漸達到解放的境地；另一件便是在華盛頓運動通過糖業一案的成功。奎松又老早就見到華盛頓是個解決一切事件的樞紐，所以他便設法做了駐華盛頓的委員——從一九〇九年起到一九一七年止。他富於運用手腕以運動議案通過的才能。他在一九一三年——美國民主黨威爾遜（Wilson）任大總統的時期，曾運動美國政府派遣親菲的哈里

遜 (Francis Burton Harrison) 作菲律賓的總督。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所通過於美國國會的準茲法案——是允許并規定菲島於一九二一年獨立的法案，雖然不是奎松所實際起草，但在精神上奎松實是獨立案的創始者。奎松又見到一旦菲律賓完全獨立，馬上就會使菲律賓陷於經濟上的破產，所以他繼續計劃採取折衷的途徑。

一九一七年，奎松看出馬尼刺在爭取解放的戰略上是比較華盛頓更好的一個據點，因此他就回到馬尼刺，繼而他就做了菲律賓參議院的議長，於是他便成了菲律賓的第一個要人。他曾和反對哈里遜政策——給予菲島以自治權的政策——的總督，伍德將軍 (General Wood) 作過好幾年有聲有色的鬥爭，他也曾用誘惑和恫嚇的手段，來討好於其他的總督。自一九二一年——準茲法案所規定承認菲島獨立的一年——以後，菲律賓見美國不履行其一九一六年國會所通過的準茲法案，乃派人到美國去請願及宣傳，絡繹不絕。這時奎松以上院議長的身分，亦曾扶病赴美——從事運動。當時他曾發表一篇談話說：

「吾人何所求。求人民安享幸福，完成自家之支配耳。威爾遜總統曾有言：『與其爲純粹之動物而存在，毋寧爲自由之人而死亡』。吾人今借用是言以自狀。吾人不要美國之博愛，亦不要求美國予以宗教或商業的援助，吾人惟要求美國之寶物——自由」。

最後在一九三四年，奎松努力奔走運動的結果，美國國會終於通過了泰丁斯麥都費法案 Tydings-McDuffie Bill。這個法案中規定，在一九四六年以前，美國以菲律賓仍保有某種權限，代負菲島防衛的責任，并且要用美國的法律以統治菲島的稅率、移民、債務、貨幣和國外貿易等事；等到了一九四六年，美國在菲島所有的一切權限都將取消了，那時菲律賓即變爲一個獨立的共和國，任其自由的興衰。這個法案的理論根據，在於規定一個十年的過渡期間，在此期間內，菲律賓可以學習獨立。這個法案的通過，至少算是奎松在奮鬥中取得暫時的勝利，因而使菲律賓取得自治共和國的地位，并將於一九四六年完全獨立。

奎松在選舉成功之後，回到菲律賓，就被選爲第一任大總統。這時他的唯一的政敵亞昆那爾多老將軍——主張菲律賓不應該妥協，而應立刻獨立的，已經被他戰勝了。那位美國總督，現已改名爲駐菲專員，移出了馬刺坎南宮（Malacanán Palace），別立公署，而馬刺坎南宮便變成了菲律賓的總統府了。

奎松大總統真是勵精圖治的。他每星期內總要在馬尼刺各處，做兩三次的突然的視察，他既不事前通知，又不拘用什麼禮節，逕直走到當地警察局、監獄、煙草工廠，或者任何政府的機關去；如果發現那裏漫無秩序，他便立刻震怒起來。他很喜歡聽取別人訴苦，有時他和工人一起在院時裏邊吃午餐。

這裏順便再舉出奎松的幾種優點，藉以明瞭他的勢力之所由來。他是菲律賓的最優秀的演說家，可用英語，西班牙語，或塔加爾語（Tagalog），任何一種來作演講。至於他那動人的態度，愛國的熱誠，施政的本領以及巧妙的融合着美國人講求實際的特性，與拉丁民族在談話時的柔順和悅的遺傳，在在都是促進他事業的成功。再者，奎松

唯一的優點，是他有一種祕訣，就是無論和貧者與富者，也無論和馬尼刺地方的饑餓貧民與西班牙的百萬富翁，都能樂處得融洽。民衆是愛慕他的，因為他周濟他們。有錢的人也喜歡他。這樣一來，他在政治上就造成了一種莫可敵對的勢力。

當奎松就任總統之後，馬上就發現一樁奇事。他寫了一個故事給他美國的好友侯德（Roy Howard）大憲說：『菲律賓獨立的夢已經逐漸消滅了』。如果奎松在起初獲得選舉勝利之後，就反而表示不願爭取菲島的獨立，這是多麼奇怪的事？是一定要受人指責的。但是他寫這個故事的用意，是在于刺探美國的政情，另外也許是表示他不願想美國即時放棄了菲律賓的人民。

一九三七年，奎松却站在極端反美的戰線上，他馬上跑到華盛頓要求完全的獨立。他說：

「菲律賓人民蒙受美國經濟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指導，已幾近四十年了。在歷史上，在外國旗幟之下的人民，向未有如菲律賓人民受美國這樣的寬厚待遇？……我們現

在，和八年以後（蓋指一九四六年以後而言

編者）一樣，已經有資格來治理我們自

己了……在實際的試驗之下，獨立法案的條文，頗能引起人民的激烈的反感。一個專員，即令其品格最高尚，如果缺乏同情心，也就會造成一種最不幸的衝突……一個國會（美國的）顯然不能約束後一屆國會的行動。因此，我們只好在現存這一獨立法案的約束之下，而這一法案更是我們無權力加以修改的，那麼，我們菲律賓人便要在一些私自利的美國政客商人的擺布之下，而受其增加國稅或貿易定額的災害了。」

這是一九三七年初的事情。等到一九三九年，情形又爲之一變了，原因是由於日寇以武力侵略中國而來。許多菲律賓人士對於日寇非常恐懼，他們認爲如果美國完全走開，日寇就會進來。

奎松曾竭盡畢生之力，以謀菲律賓的獨立，但是現在他却不敢斷定它是否真個需要獨立，而菲島，民經過四十年的奮鬥，才走上了民族解放之艱，但在今日却對於他們所一貫要求的獨立，反恐怕其立時到手了。這種矛盾心理的形成，正是因爲受了歷史的教

訓，唯恐怕『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倒不如像奎松所說的『受美國的寬厚待遇？』爲較好咧；因爲美國並不是一個十足的帝國主義國家，若和日寇比較，就不啻是一位慈愛的師保，而且美國隨時準備要離開菲律賓的。

無論心理上是如何的矛盾，奎松總統以及全菲島的人民，總是以國家民族爲前提，而在戰戰兢兢的惟恐其多年心血所培植出來的獨立自由的幼芽，遭受了意外暴風雨的摧殘，所以與其說是心理上的矛盾，毋寧說是奎松顧慮的周到；這正是說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柔和最堅決的現實政治家』，也正表現出他的『愛國的熱誠』和『謂求實際的特性』。

在內政方面，奎松總統在一九三七年，宣布了一種菲律賓的『新政』(New Deal)。他聲明說這是一種『分配家』的哲學的一種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折衷途徑，他又講政府的任務是要利用全副力量，以強制執行財政分配，藉使富者不要太富，貧者不要太貧。他爲政府工作人員規定一個最低的薪金標準——每天一元菲幣，並且開始實行一種

新的稅制。

奎松總統作到這樣地步，已經是煞費了苦心。他現在已是六十二歲了。我們站在同情弱小民族的立場上，極希望他『老當益壯』，繼續其內外興革的大業，以實現一九四六年以後的菲律賓的完全獨立，而完成其民族解放的使命！

喀 富 爾

十九世紀的初葉，在南歐洲的靴形半島上，產生了三位民族英雄，後來把十八世紀的僅是「地理上的名詞」的意大利，從內憂外患交迫的狂瀾中，拯救出來，而登其民族於衽席之上。他們一生的血、汗和精力的結晶，就是現世的墨索里尼（Mussolini）所憑藉以暗鳴叱咤，耀武揚威的意大利。這三位英雄的大名和勳業，不但永垂於意大利的史冊，就是在世界民族運動史上，亦各佔其光榮的一頁。他們就是赫赫有名的意大利建國三傑馬志尼（Mazzini），加里波的（Garibaldi）和喀富爾（Cavour）。

這三位民族英雄的個人生活史，和全部的意大利史的發展，是有不可分性的，就是說，意大利能夠把它的歷史延續到現在，并且把它的國際地位提高到世界列強之林，而使黑衣宰相得有叱咤風雲於歐、非兩洲的今日，無疑的，都是他們老三位當年的汗馬功勞——所以梁任公——啓超——所說的「三傑則無意六利」這句話，並不是甚其詞。

啲！

這三位英雄各有其不同的個性、主張、和革命的途徑與手段，因之，在革命事業的成就上，亦各有其性質、程度與結局的不同。論個性，馬志尼是充溢文學天才的崇高的思想家，兼實行家。加里波的是一個鹵莽的豪放的與冒險的革命軍人，喀富爾是足智多謀，高瞻遠矚的大政治家。馬志尼的革命主義，是以絕對的民主共和為依歸，因此，他對於喀富爾以薩丁（Sardinia）王國既定的勢力為復興意大利的中心，和假借外力——如聯法驅奧——以求獨立的革命手段，都極端反對，且認為是違背了革命的眞義。但是，不顧毀譽而一味以復興民族為前提的喀富爾，終以他的修明內政，巧用外交和對奧宣戰的政治主張，而一步步的成功了。加里波的的革命主張極為單純，他惟一的目的，只是要國家統一獨立，民族自由解放，任憑用什麼辦法，他都不反對。他曾以喀富爾割讓他的故里——奈斯（Nice）——與法國，以為聯合驅奧的交換條件，而極表不滿，但迫喀富爾在外交軍事都獲得勝利的時候，他為求國家的統一，在他征服了西西里（Sicily）

及那布勒斯（Naples）之後，他又功不自居，把牠們都交給薩丁國王來統治了。

談到他們革命事業的成就，在前面已經說過，他們都是意大利民族復興史的創著者。本沒有成功大小的區別。不過，因為他們的個性和革命的主張，各有不同，所以在革命成就上，不免要有性質和結局的差別，而這種差別的形成，只可以說是由於他們在革命過程中的分工而來的。

剛才說過，馬志尼是救國的理論家，所以他的成功，主要是在喚醒民衆，同心協力來爲祖國奮鬥犧牲。他在民族革命運動中，可以說是達成了精神建設的任務。加里波是有名的義勇軍統帥，不避艱險，不畏強敵，終身馳騁於疆場之上，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又提倡建軍，以充實革命武力，終於達成了軍事上的任務，所以他在意大利民族革命當中，可以說是它的軍事建設者。喀富爾以世界大政治家的眼光和才能，修明內政，靈活的運用外交，發動對奧的戰爭，終於奠定了意大利統一的大部份根基。他在意大利民族革命史中，可以說已達成了政治建設的任務。

總括來說，這三位大英雄，雖有主張、才略、手段和事功的不同，但他們的總目標，畢竟還是相同，它就是意大利民族的復興，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他們本着這個共同的目的，終於得到『殊途同歸』的成果——意大利民族復興的基礎的奠定。所以梁任公說：『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又說：『之三傑者，其地位各不同，其懷抱各不同，其才略各不同，其事業各不同，其結局各不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爲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

史家對於意大利建國史，都一致推崇三傑。我本着史家的意思，持着相提並論的態度，來一述三傑各人的一生事蹟。請先述喀富爾。

但在談到喀富爾的本事以前，容我再佔一點篇幅，來把意大利民族的盛衰及其民族運動的情形，先作一個極簡略的說明，以便明了三傑的時代背景，而知其革命思想與革命行動之所由來。

意大利民族——拉丁民族——過去在歷史上文化上的光榮，有羅馬帝國的偉業；有

公正、平允、博大精深的羅馬法律；有中世紀的沿海城國的操縱海外貿易；有中世紀光被世界的天主教；有文藝復興中的文學藝術的偉大成就。但這些歷史上文化的偉業，到十五世紀以後，就湮沒而不彰了。從此以後，意大利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步步落後，於是奧大利（Austria）和法蘭西的勢力便相繼侵入，因之文化燦爛的意大利也就四分五裂，成了奧法兩國角逐之場，而淪為他們的殖民地了。

等到十九世紀，歐洲民族主義勃興，意大利受了它的影響，遂發生了很激烈的民族復興運動和統一運動。當時的堯炭黨（Carboni）、自由瓦工黨（Free-Masons），以及馬志尼所組織的青年意大利黨（Young Italy），都是代表意大利民意來發動這種運動的祕密組織。自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三〇年，再由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九年，意大利的志士犧牲於革命運動的，真是難以數計。終至一八五〇年，革命運動，歸於失敗。這時馬志尼和加里波的在一八四八年所建立的羅馬共和國，終因抵抗不住法國的武力壓迫，而歸於瓦解了。

這個時期裏，祇有西北意大利的薩丁（Sardinia）王國，不改其自由主義的政治。所以當時希望意大利民族復興和國家統一的志士，莫不竊竊期待從薩丁王國中建設出新意大利國家，薩丁王國包括皮德蒙（Piedmont），薩瓦（Savoy），奈斯（Nice）及薩丁島諸地，其統治者爲薩瓦王室。這個王國的發祥地本來是薩瓦，後來移都到杜林（Turin）。自一八一五年以來，奧大利的勢力，控制了北部意大利的全部，獨有這一薩丁王國沒有受到奧人的蹂躪。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北意大利與奧軍作戰，薩丁獨立支持，雖然屢經挫折，而奮鬥不懈。迨一八四九年，薩丁國王阿爾柏脫（Carlo Alberto）因與奧國戰爭失敗，乃讓位給他的兒子陽瑪諾二世（Victor Emmanuel II）。從此意大利的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運動，便在這賢明仁厚和知人善任的陽瑪諾時代，而得告成功了。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的失敗，證明了祕密結黨和分頭起事的方法，是難以成功的。這時薩丁出現了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喀富爾，抱有復興民族和統一國家的大志，並且知道要想意大利民族復興與統一的完成，非另覓途徑不可。他認爲：第一，意大

利的統一，必須有中堅的勢力。如薩丁王國；第二，欲解除意大利的壓迫，必須借重外力；第三，意大利的前途，仍須決於戰爭。喀富爾因為有這樣的認識，所以奠定了意大利的民族復興和統一的大部份的基礎。

喀富爾 (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 以一八一〇年八月十日生於薩丁的首都杜林 (Turin)。他的父親麥凱爾、第、喀富爾 (Michael Cavour) 是薩丁的貴族，他的母親亞黛爾 (Adele) 也是名門的女兒。他的本姓是「朋肅」 (Benso)，「喀富爾」 (Cavour) 一字是一個鄰近堡壘的名字，偉大的喀富爾在早年就從其姓名中摘去「朋肅」和其餘的部份，而簡稱自己為喀富爾伯爵 (Count Cavour)。

喀富爾在十歲的時候，就被送進杜林的軍官學校裏，在那裏他學了六年，便以第一名畢業於一八二六年，並被任為工兵少尉。這時，少年的喀富爾，便開始發表他的自由主義的思想，這不但在家庭裏引起了極大的反感，而且使他為警察所注目。

在喀富爾進軍官學校以前，他的父親早已傾慕了卡羅·阿爾柏脫 (Carlo Alberto)

卽當時的皇太子。他給他的兒子在這位未來的薩丁國王那裏謀得了一個侍衛的職位。但幼童喀富爾與皇太子之間，立刻發生了深隙而互相疑忌，一直繼續到阿雷柏脫之死。後來當阿雷柏脫繼承薩丁的王位時，喀富爾果然辭去了軍中的職務。其後數年的時間，他多消耗在國外的旅行和學術的研究中。他曾瞻拜過日內瓦，巴黎和倫敦。他在英國，特別考察英國工業發達的狀況，親臨議院，聆取英國政治家的言論，又特別注重英國的「救濟貧窮法」和愛爾蘭問題，且嘗作文以論之。喀富爾遊英的結果，使他對於政治、經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這對於他後來建國的事業，有很大的幫助。

喀富爾一回到杜林，便覺得：因了他和國王間的不和，他與公衆事業的關係已被斷絕了。一八三五年，喀富爾因為要做些事情，便去執行家庭財產的管理，結果非常成功。所以到了一八四八年的時候，他不但已給他家庭增進了大量的財產，而且也爲他自己安置了一份很舒裕的產業。他是把近代的科學農耕介紹到意大利來的第一個人，他最先把中世紀的農耕方法變爲英，法流行的近代方法。

一八四七年，喀富爾爲自由主義所感動。又見薩丁王阿爾柏脫漸具自由的思想，認爲使比蒙特——他的子鄉——自由主義化，甚至建立憲法的時機已到，於是，他趁此機會在杜林創辦了一種報紙，定名爲「光復報」(Il Risorgimento)。他的意思是指意大利國的光復，換句話說，是要使意大利恢復原有的光榮和偉大的意思。他藉着光復報的篇幅，爲他平素所信奉的主義——自由主義——作有力的無畏的鼓吹和戰鬥，無疑的，光復報的不斷的鼓吹和抨擊，大有助於驅使阿爾柏脫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八日憲法的頒布和六星期之後的對奧宣戰。

在憲法頒布後，喀富爾就被選爲第一屆的國會議員。在國會裏，他雖然不是一個雄辯家，但至少是一個有力的幹練的發言人。在他服務的早期，他致力於農業和財政問題的探討，且被認爲這兩個問題的權威的研究者。因此，達賽格里奧(D'Azeglio)內閣的農商實業大臣聖大、羅莎(Santa Rosa)於一八五〇年死後，喀富爾便被任以接替羅莎之職。

喀富爾在農商實業大臣的任內，施行自由貿易，并和各國分別訂立互惠低稅條約，政績卓著。不久以後，又被任爲財務大臣。這時正當薩丁新王陽瑪諾二世勵精圖治的時期，見喀富爾有這樣的雄才大略，便於一八五二年，擢升喀氏爲首相。喀氏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就從此開端了。

喀富爾的雄心，是要親眼看見意大利幾個分散的小國，統一起來成一個大國。由薩丁王來統治。但是他知道，要想達到這個目的，非先把意大利境內的奧國勢力驅逐出去不可。他又知道，沒有一種強有力的外援，意大利人自己是決不能完成這種偉大事業的。他更知道，必須薩丁本身的情況轉佳的時候，才能夠得到強有力的外援。因此，他施政的第一着，便是用全副的精力和時間，從事於薩丁內部的建設。他獎勵造船設廠，開墾荒地，發展交通，改良教育，施行新稅，整防軍備；凡所設施，都是薩丁的當務之急。他又常和散居各地的反奧的志士相聯絡，其中以民族英雄加里波的，尤爲他所賞識，意大利的復興運動中，得力於加里波的的地方，實在很多。

薩丁本身的情況既已改善了，喀富爾的第二步工作，便是運用縱橫捭闔的外交手段，以獲取一強有力的同盟。一八五四年，英、法以干涉俄國在近東的發展，與俄國發生克里米戰爭（Crimean War）。這時喀富爾認為聯絡法國的時機已到，乃於一八五五年遣兵一萬八千人，加入英、法聯軍，以與「風馬牛不相及」的俄國作戰。當時意大利人多不明瞭他的意思，議會尤為反對，等到一八五六年，克里米戰事結束，巴黎和會開會的時候，喀富爾便代表意大利，親自出席，在會議中，他痛詆奧國在意大利實施高壓政策所生的慘狀。從此意大利的國際地位既已提高，列強又深知意大利人企圖統一的懇切，因此在兩年之內——一八五八年，便與法帝拿破崙第三（Napoleon III）締結了「法、意密約」。這個密約中的主要條件是：

（一）法國允許在意奧發生戰爭時，出兵幫助意大利；

（二）威尼西亞（Venetia）與倫巴底（Lombardy）兩省，在奧國的勢力被驅出時合併於意大利；

(三) 意允許以北部的薩瓦 (Savoie) 及奈斯 (Nice) 割與法國，以爲將來法國出兵助意的交換條件；

(四) 薩丁王的女兒嫁給法帝的從弟。

這個密約訂立了以後，法、意聯合以排斥奧國的大勢，於以造成，這又是喀富爾在外交上的成功啊。

無疑的，法、意聯盟是於意大利有利的。喀富爾獲得了強有力的外援，便敢公然對奧國反抗了。所以他的第三步的工作，更是以戰爭，來決定意大利的前途。

這時，喀富爾的黨徒和青年意大利黨，在意大利的各部分大事宣傳，於是反奧的運動，到處都有。一八五九年四月，奧國對薩丁政府發下哀的美頓書，要求在三天以內解除兵備，而薩丁王苦無開戰的口實，乃斷然予以拒絕，意、奧的戰爭便開始了。薩丁王親率大兵渡河而東，這時逃亡在美國的加里波的也聞風回到本國，組織義勇隊，以爲策應。法帝拿破崙第三爲實踐密約，親自領兵來會。瑪塞塔 (Margherita) 與莎菲利諾 (Saffi)

Oneghino) 的兩次大戰，法、意聯軍大獲勝利。結果奧軍敗退威尼西亞，而倫巴底完全脫離了奧國統治。同時，意大利的中部及北部的人民紛起響應，組織臨時政府，都願歸附於薩丁國王旗幟之下，喀富爾一個個遣使慰問，并且予以切實的指導。

拿破崙第三看見這般情形，恐怕薩丁不久要統一整個意大利，將為法國的後顧之憂，有違背他和喀富爾訂立密約的初衷，於是不商量於喀富爾，便私與奧皇締結了菲拉弗朗加 (Villafranca) 和約。和約裏規定奧國得保留威尼西亞，只把倫巴底讓給薩丁，而各小國仍皆恢復其原來的王室。

法、奧的和約既成，意大利的愛國志士都大為反對，但薩丁王以迫於大勢的不得已，終於忍痛的承認了這個和約。喀富爾以力爭不得，乃辭職以去，以示憤慨，同時加里波的義勇隊也被解散。於是意大利的復興與統一運動，一時又呈暗淡的景象。

喀富爾的期望，雖因法帝的中途變計而未能完全達到，但是意大利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的機運，却由於他的聯法攻奧而得到了不少的進步。忍辱負重和審時度勢的喀富爾

，衡度當時的情形，知道只能取得倫巴底和中部意大利諸小國。於是激於民族復興和國家統一的大義，又於一八六〇年回任首相。

這時——一八六〇年，意大利南部亦起了革命，領袖就是加里波的。他率領餉需不充和軍械不足的義勇隊二千人攻入了那布勒（Naples），結果把那布勒國王推倒了。喀富爾再運用他那敏捷的外交手腕，卒至南意大利的小國也入了薩丁的範圍，意大利統一工作，至此已大體完成。第一次意大利統一國會乃於一八六一年二月開會於杜林，三月宣佈陽瑪諾第二爲意大利國王，再過三個月，即一八六一年六月六日，喀富爾便僅以五十一歲的年齡忽然與世長辭了。

喀富爾雖然未能看見意大利的完全統一，但是大部份的成功，都是他親身經歷到的。那時沒有歸入意大利範圍之內的，只有威尼西亞與羅馬兩地，但是九年後，由於加里波的、馬志尼以及其他愛國志士繼續奮鬥的結果，這兩個地方也歸入意大利的版圖。

喀富爾的驟死，震動了全歐洲，意大利的民衆尤其悲動。他們的自由，他們的統一

，大部份都是他所造成的。所以他的軀殼雖然沒存在到人所希望的那樣長久，可是他的精神却常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他的確是意大利的民族英雄，亦是十九世紀中世界偉大的政治家。

馬 志 尼

「至高的道德是犧牲，凡是我們的責任在那裏，就應該按照責任之所在，去思想，去奮鬥，去奮鬥，去受苦，但不是爲己，而是爲人，爲了至善克服罪惡。」

這是意大利建國三傑中的馬志尼（Mazzini）的人生觀，也就他的革命思想。他的一生爲意大利民族奮鬥，而流亡流放的生涯，都是爲了要實現他這種人生觀——或革命思想啊！

他說：「生命是一種使命」。又說：「生命就是和惡魔鬥一場戰爭，我們雖然不能根本剷除它，但是我們只要不死的時候，就和惡魔鬥，一天可它的領域漸漸縮小。」

這都是他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認識。他認為人生雖短但負起一種使命，能實現這種使命，才有人生的價值，到底怎樣才算是實現了它呢？馬志尼的意思，是在於犧牲奮鬥，以求克服人間的罪惡，而達到至善的境界——這才是人類應該追求的，才是生命所追求

的最終目的。他所指的惡魔，並不是人類在追求至高的幸福途中，所遇到的障礙，乃是妨礙國家民族獨立，自由的魔鬼。

的確，在馬志尼的時代，他的同胞外受奧、法兩國的壓迫，內受苛政的虐待，他目覩時艱，認為這都是妨礙國家民族獨立自由的魔鬼。——以他一生的奮鬥，就在于驅逐了它們，而使國家民族達到至善——獨立與自由——的地步。他為驅逐這些魔鬼而奮鬥的原動力，就是他的愛國心，他的一切學說和一切行動，都是基於這種原動力——愛國心——而發的。

「意大利人呀！看你們的國家高山吧！那裏儲藏着無限的力量和不可磨滅的勝利！」

馬志尼因為參加革命，而被專制政府放逐到國外的時候，——阿爾卑斯山（Alps）——這樣呼喊着。在他呼吸他的最後一口氣時，他對親人作最後的叮嚀說：「誠懇的為我們國家努力吧！把她帶到更光明的路上，這就是你們愛國的最好的方法。」他的愛國的熱情，若用梁任公——啓超——所說的「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

，舍國事無忿懣，舍國事無競爭，舍國事無歡欣。『這幾句話來形容，實足以當之而無愧啊！』

這位一生爲意大利民族復興而思想、而奮幹、而受苦的英雄，於一八〇五年生在靴形半島上的熱那亞（Genoa）地方。在年幼的時候，因爲受了他父母新教主義的影響，對於當時的教會和政府，都感不滿。他的革命思想，在這時，就在發育滋長了。他十六歲的時候，眼看見皮德蒙（Piedmont）暴動——即一八二〇年三月，軍官巴爾瑪（Palma）率領熱那亞軍隊，要求國王陽瑪諾一世（Victor Emmanuel I）承認西班牙憲法的事件——失敗後，革命黨人被驅殺的慘狀，他的革命的怒火，便燃燒起來。從此，他就穿上了黑色的衣服，終身服祖國之喪，一直到死。

『箕之子恆爲箕，裘之子恆爲裘』。馬志尼的父親是一個醫生，所以就很盼望他的兒子。當他在十七八歲的時候，成爲自己職業中的一個精手。但是因爲少年的馬志尼害怕施行手術，他父親在很失望的情緒下，便叫他學習法律，可是，他對於法律

，也不十分感興趣，他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研究文學，歷史和詩歌上面。他的革命思想的勃發，恐怕是受了意大利傳統文化的推動。和但丁（Dante）的『神曲』（Divine Comedy）有關係吧？

馬志尼在研究學問之暇，便給窮人作義務律師，或者寫些文章，在雜誌和報紙上發表。他的文章充滿着熱情和前進的思想，很受讀者的歡迎。但是不久以後，他所投稿的兩家報紙，都因為刊載他的文章而被查封了。這件事，又重新燃起了他的革命思想；他痛恨當時的專暴政府，不能低頭外侮，恢復國家民族獨立自由，反而壓迫國內的新思潮，他覺得欲復興意大利民族，非推翻這些各各專暴的政府，而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的政府不可。從此，他便把整個的身心獻給國家。他自信，他已負有為祖國、為自由、為人類，而奮鬥的義務。

當意大利的革命潮流還很幼稚，惟一的革命組織，就是燒炭黨（Carbonari）。這是自稱爲『燃炭夫』的人們的祕密結社，它的目的是驅逐外族，建立立憲政體，它對

外的名義，是一個盛行於十九世紀的歐洲的『共濟社』(Freemasonry)——亦稱『互助團』。它的黨員們雖然抱有不同的政治理想，但在忿恨各小暴君和王室的貪污與頑固這點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它是一個無黨派組織和信仰的團體，同時，它的領袖，大部是中產階級的中年人物，因此，不甚喜歡積極的青年人加入。可是，馬志尼因為要想利用它來作革命的工作，遂於一八二九年——他二十四歲的時候——投身到那裏，開始他革命事業的活動。

既加入了這個組織，事實又使他灰心。它除了缺少嚴密的組織和中心的信仰外，馬志尼又認為它還犯了兩件必趨於敗亡的錯誤：第一、它沒有把握住事實，第二、它沒有抓住廣大的民衆。果然，在馬志尼加入以後的第一年，因為它的組織不嚴密，被薩丁政府探悉，大捕其重要的黨員，馬志尼也未能幸免，他被囚於薩瓦納(Savona)，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入獄，後來他被放逐到法國去了。這是馬志尼革命生活的開始，從此以後，他便永渡着他的流犯生活，而他最愛的祖國——意大利——與慈母，便永與他隔絕了。但

他絕不因此灰心，相反的，他爲國奮鬥的決心，越加堅定起來了。

燒炭黨的屢次失敗，便震動了馬志尼另組新黨的心絃。他認爲燒炭黨的政治的失敗，主要的還是歸咎於惡力的指導，和無意識——即無中心信仰——的策動。他想，若使革命能得着優越的成績的表現，則必須以滿懷潛伏着忠誠的，熱烈的，和活躍的思想的青年人來作指導者，因爲他們可以純潔的、真摯的、朝氣的理想，激動起人們勇敢的情和前進的力量。他又認爲，在那些青年的團體裏，蘊藏着無限的力量，青年的呼聲在廣大的羣衆裏，呈現着奇異的影響；並且在青年的身上，才能尋找着新宗教的福音。但他又相信，青年的生命是在運轉着，逐漸的生成偉大的熱情與虔信；所以必須以高尚的使命，來貫注他們，以競爭與獎勵來激動他們，在他們之間，要散播下『火』，『興奮』這種情緒的種子，告訴他們以『祖國』，『光榮』，『權力』及偉大的『信念』。

視青年有如至寶的馬志尼，本着『青年爲革命之先鋒隊，爲國家之新生命』（本團團長告青年書）的信念，便在法國的馬賽（Marseille）集合意大利的流犯，組成了青

年意大利黨（Young Italy）。他鑒於燒炭黨以中年人當政的失敗，乃定下一條規則，即除了特殊情形以外，凡年逾四十歲的人，皆拒絕其加入。他說：『一個黨的力量，不是基於它的黨徒的數量，而是基於黨徒之間的協和性。』這便是馬志尼組織黨的要訣，因之對於入黨的資格，限制很嚴。但是由于他的自我犧牲的努力，終於表現了極優越的成績。當時一般革命青年，大都是青年意大利黨的黨員——如加里波的（Garibaldi）便是其中的著名者，而這個團體便成為他以後革命的基礎。

青年意大利黨是以『上帝與人民』（God and the People）為號召的口號。馬志尼所以用這個口號來號召，是和他的革命思想有關係的。他認為一個有力量的革命運動，必須有一種宗教的力量來維持着。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容易因紛爭而瓦解的，所以必須藉着一個不可知的上帝，以維持人心。但是他所說的上帝，與普通基督教徒所謂神化的上帝不同。他說：『上帝就存在我們的良知（Conscience）之中，存在仁道（Humanaity）之中；存在我們的周圍一切現象之中。』又說：『上帝為我們而存在，上帝賜給我

靈感與生命。而上帝亦就是存在我們的靈感與生命之中。」又說：「上帝的意思，即於仁道與良知之中表現出來。」又說：「上帝的意思，即表現於芸芸衆生。」他的這種主張，很和孟子所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意想相似。他在「上帝」之下接以「人民」的字樣，就是說，上帝是爲人民的。我們敬仰上帝，也就是要順着上帝的意思，爲人民服務。他的革命旗上所寫的「上帝與人民」的意思，就在於此。

青年意大利黨的主義，有三個要點：第一，便是信任意大利。對於這一點，馬志尼希望以一己的對於意大利和她的命運的超卓的信仰，來啓迪他人的信心。他認爲，在過去意大利曾兩度王天下，同時他又是大文學家，大藝術家及教皇的產地，和文藝復興的發源地，而激起整個的歐洲思想，所以只要憶念及此——偉大的光榮的憶念，便決不會使人失望。第二，是義務觀念的鼓勵。他知道創造意大利，乃是一番偉大的事業，它的成功，便是千萬的生命的犧牲，便是流放，囚禁，與貧困，便是毀家，棄愛人。因此，人只有以義務的要求，來担負起這種偉大而艱鉅的任務。但是這種觀念僅能生於「敬崇

主義，敬崇正義與真理，犧牲，永遠的犧牲！」第三，是社會的改革。即拿以前兩種主義爲手段，而造成政治上、經濟上的改革。此外，青年意大利黨只建設統一的民主的意大利，和逐出敵人爲革命上主要的政治主張。

馬志尼爲了青年意大利黨，犧牲了他一生的精力與時間，他希望能從它產生出新的革命的苗芽，培養成復興的意大利。他利用這個組織，計劃暴動，總計不下數十次。雖然他的力量薄弱，又受了法，奧兩國的壓迫和破壞，終未獲得大的成就，但是意大利統一復興的根芽，早已隨着革命烈士熱血的灌溉，而在發育滋長于人民意識之中。

馬志尼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其顯著的表現，要算一八三一年的薩沃(Savoy)暴動，和一八四八年的反奧大革命。這兩次舉動已確實掀起了民族革命的高潮，博得世界的同情。同時，奧國的侵略政策，確亦從此而根本動搖了。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戰爭當中，馬志尼曾自己荷着一枝來福槍，和敵人血拚，有好幾個月不得寢息。在食糧不濟的時候，每天僅以馬鈴薯來充飢。到城破時，他還在喊着：『我們要造成歷史，拋開生命，功』

不必由我而成，人心却不可由我而死！飢渴與不眠，決不能使我們對敵人屈服。」他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真是動天地而泣鬼神！但是他雖然充滿着如火的熱情，終因力量的單薄，而遭遇了失敗的厄運，最後又不得不逃到瑞士(Switzerland)，繼又被迫逃到英倫去了。

先是，在一八三一年二月，因為參加暴動失敗，馬志尼就被流放到國外。從此以後的三十多年的奮鬥生活，幾乎盡消磨在海外的流竄裏。中間除有幾次爲策動革命——如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而潛入祖國國境之外，他永在與祖國別離，渡着流浪的生活，雖然在他最後的呼吸的一年，他仍是負着通緝令，悄悄的用假名兒隱退到祖國的一個無聲無臭的鄉村裏。

馬志尼的國外的流浪生活，大部份是在馬賽、倫敦和瑞士間的奔竄。這種奔竄的生活，時常使他感到精神上的缺乏，因爲他得不到可讀的書籍。他極悲痛的寫信給他的朋友說：『我可以被囚在狹窄的小屋裏，而安然的渡過一生，假設我的一切書籍都在手中』

。『實在的，他永住在狹小的暗室裏，在白天他不得越門戶一步，必要時，在夜間躡悄的溜出，然仍須刻刻留意。精神上的痛苦，固然使他難以忍受，而物質上的困窘，使他的處境更為惡劣。在他的經濟極度艱窘的時候，他所有的一切，全都走入當舖；他母親給他的戒指，他自己的表、書、地圖、大衣、都化為典當的目標了。典當的結果，使他的衣服時常不全，因此，他時常終日停留在房內而不外出。』然如此，他對於那些比較自己更窮的朋友，仍忘不掉他那種『推食解衣』的義氣，這使他自己更陷入黑暗之鄉裏。

但是，高度的困窮，並未使他有一時一刻放棄了他的義務——恢復意大利歷史的光榮。他用他的文學天才，宣傳民族革命，他的充滿熱情和激動性的文字，喚醒了每個有祖國觀念的青年，受他奮鬥精神和血與淚的十字所感動的青年，都趨集在他的旗幟之下，為國犧牲。他的大名和他的新組織——青年意大利黨，遂成為當時每個青年從事民族革命的象徵。

前面已經說過，馬志尼在渡着他的流徙生活當中，他曾經數次秘密的回國，參加革

運動。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前面所說的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他和與他的命運相同的，即由流竄中回國的加里波的等愛國志士，在短短幾天之內，把教皇統治的勢力推翻了，把教皇統治的羅馬（Rome）改為共和政體的羅馬。馬志尼，沙飛（Saffi），和亞米亞尼（Armenani）被選為執政官，加里波的為將軍。這時的馬志尼，未嘗不自引為欣幸，所有生平的抱負和救國的理想，現在獲得了試行的機會，認為意大利民族復興的基礎建立了。那知道法國政府竟宣稱保護教皇，用武力把驅走的教皇實行迎來就位。於是那新鮮的革命嫩芽——還待培植灌溉的嫩芽，就波法蘭西的鉄蹄給摧毀了。因為法國這次摧殘了意大利的復興運動，馬志尼便更仇恨法國。所以嗣後喀富爾以外交手腕，聯法以騙與馬志尼表示極端反對，他認為乞憐於外人——尤其壓迫意大利革命的法國以求民族解放，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民族史上的恥辱！

一八七〇年，仍在為國家民族繼續奮鬥的馬志尼，從瑞士放出，在海船上又遭遇了逮捕，被幽禁在基塔（Gstaad）兩個月。從此以後，他的革命生涯，便告結束，於一八七

二年，竟遭世長辭了！

總括起馬志尼的一生，都是爲祖國的自由而犧牲，爲祖國的統一而奮鬥，個人的快樂與榮譽，他永遠沒有放在心上。他很羨慕家庭的快樂的生活，他很希望能得到異性的安慰，他說：「女人與男人是人生的兩根弦，缺一邊，就彈不出和諧的生活曲調的。」他也曾熱戀過兩個女人——盧斐尼夫人 (Madame Raffin) 和席多麗 (Giuditta Sordani)，但是他又宣稱：「快樂的家庭生活是別人的事，在我是沒有意義的；我不能享受安樂的家庭生活，因為我還有一顆空虛的心沒有填滿。」這是一位赤心的愛國者，爲他的國家，終于一生甘心渡着他那獨身而流浪的生活。

馬志尼的一生，爲國家爲民族受了很多的苦，流了很多的汗，撒了很多的淚！可是我們在他的一生革命事業中，找不出甚麼驚人的成功。乾脆的說，他並趕不上喀喀爾和加里波的那樣，他的革命總算失敗的。他也並沒有看見祖國民族復興的完成，他雖然奮鬥過一生，渡着亡命生活，但是在他自己看來，却是很難不得意得意，而費志以移！

不過，如果從行動的成就上去評定馬志尼，那對大大地誇大了他的偉大——他甘地一樣，不在乎他奮鬥的形式上的成效怎樣，而是在乎他的奮鬥的目的，——他個人以為民族求解放的革命人生觀。所以他最大的成功，乃是在他個人的道德人方面，而也影響於意大利的，也以這一方面為最大。他的道德是積極的意志，是對於責任永不退縮的道德，是自我犧牲的苦幹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革命的道德。在惡勢力籠罩下的意大利革命運動的浪濤，所以能層層湧起的高漲着，就是由於他這樣思想和道德的激動。所以鮑爾頓金（Bolton King）——馬志尼傳的作者——說：「意大利革命，若無馬志尼，至少要晚數十年成功，或者到現在（一九二二年）還不能成功。」——祇這幾個簡短語，已判定了馬志尼的偉大的成功！

此外，我們欲求更明瞭馬志尼的偉大和並給予意大利民族的影響，我們對此，應該有以下的幾點認識：

第一、是他的服務的人生觀。前面已經提到，馬志尼認為「生命是一種使命」，這

種使命，就是要順着上帝的意思，爲人民服務，『爲了至善克服罪惡』；它的目的是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可能的幸福，而在改善自己和別人，在執行上帝的法則——行仁道，在準備着犧牲，而促進國家民族以及全人類的利益。由此，我們知道，他那種『爲人』而『不是爲己』，『犧牲』而不是追求個人的幸福的精神，完全都是出自他的服務的人生觀。

第二、是他的拚命實幹的精神。他提出兩個有力的口號，亦可以說是他的學說，來作自己和別人的警惕：第一、就是『休息是罪惡』。他認爲人生沒有一時一刻不在勞作，如果停頓了勞作，那就違背了正義的要求。這和易經上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意思很相似，亦和我們的團長所說：『動是行，靜亦是行』的『力行』的意思相吻合。第二、就是『思想與行動必須一致』。他主張無論在公私生活，思想與行動必須打成一片，一個人絕沒有權利把自己的精力專用於理論的探求，而拋開實際的工作。他這種主張，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意思是相同的。他說：『行動是民衆的教本』亦是勉人『力行』的意思。他對於以寫愛國文章而代替實踐的愛國行動的意大利人，

他感到重分的厭惡。由此，我們知道，馬志尼不但是革命的思想家，同時亦是革命的實行家。

第三、是他的鋼鐵般的意志。前面說過，馬志尼一生雖然永渡着顛沛流離的生活，然而從沒有一刻放棄了他的光復祖國的義務。他那種『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和『愈挫愈奮』的精神，正是由於他的堅強的意志所形成的。他永不承認失敗，而相信第一次舉事總歸失敗，但必保留一種生動的偉大精神，最後它一定會引導着走向勝利之途。他有一次對他的正在患病中的朋友說：『我聽說你正在患病，請振起意志和英氣而恢復原狀；我時常這樣做，而都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最後他對他說：『你要注意，在正為民族的自由而奮鬥的過程中，患病是極端荒謬的事啊！』他這句話，似乎是不近情理，但是我們從這句話裏，更可以看出他的意志是何等的堅強！他的意思並不是說在民族的自由未爭取以前不許患病，乃是說，『應振起意志和英氣』來克服病魔，以爭取民族的自由。

最後，是他的熾烈的愛國心。他的革命道德——犧牲，他的服務的人生觀，他的拼命實幹的精神，和他的鋼鐵般的意志，都是由於他的愛國心而發的。他有了愛國的熱情和思想，便想怎樣去愛國的方法，那就是要實行革命，但革命是一種艱鉅的事業，不是一舉就可以成功的，故必須有犧牲的精神和堅強的意志來作後盾，以拼命的實幹和服務來作先鋒，這樣，然後才能『雖危能安』，『履險如夷』實現愛國的思想。馬志尼的犧牲的精神，服務的觀念，拼命的實幹和鋼鐵的意志所形成的勇敢的再接再厲的奮鬥，完全是發自他的愛國心啊！

我們對於馬志尼有了以上幾點的認識，也就知道他的偉大和他給予意大利民族的影響——亦即他的成功，是在他以革命思想灌輸國人，以革命道德和人格感召國人，在每一個意大利人的意識中，培植了恢復他的祖國——意大利——歷史上的光榮的萌芽，預伏下碩大的成果。

加里波的

與喀富爾、馬志尼同時領導意大利民族復興運動的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於一八〇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靴形半島北部的奈斯（Nes）地方呱呱墜了。

這位爲意大利民族的獨立自由而奮鬥的英雄，幾乎像馬志尼一樣，也很年輕——二十七歲——的時候，就因爲參加民族革命，而曾度其逃亡的生活。他自幼就具有俠義的性格和冒險的精神，他這種性格和精神，在他八年的時候，就以拯救墮水的浣衣婦而表現出來。後來在亡命南美的時候，又受了他這種性格和精神的支配，而替人家打了六七年仗。這留待後面再談。

和普通人一樣，這位大英雄的豪放俠義的性格，一方面得自他父母的遺傳，一方面是由於幼年時代的教育及環境所陶冶成的。他的父親多門尼柯（Domenico Garibaldi）是地中海上以擲船技術著稱的舟子，因爲受了海上波濤的鼓盪，就養成一種豪爽不羈的性格。他並沒有把他的兒子——加里波的——送到當時上等入子弟所入的學

校，他也沒有給他的兒子以當時上等人所應受的教育！！充當寄生蟲似的小教士。這位海上老英雄認有那茫無際涯的大海，是少年人最好的學校，在驚濤駭浪中如履平地的行舟，少年人最好的教育。的確不錯，加里波的為民族復興而奮鬥的原動力！！豪邁之氣和愛國心，多半是這位老人的『周覽四海名山大川』的教育所陶冶成的。意大利人喲，你們應該怎樣感謝這位民族英雄之父！

加里波的的母親羅薩·拉奇安多（Rosa Ragionto），『是一切婦人的模範』，這是他自己在感激他的教養！！善良的教養！！的情緒下，帶着很驕傲的樣子說出來的。的確，她的慈悲心，使她的兒子為人類打不平，而忘其一身；她的大無畏的精神，使她的兒子在驚濤駭浪中，在槍林彈雨中，終其一生；她的愛國心，使她的兒子以恢復意大利民族的獨立自由，為其終身的職業。加里波因為受了偉大的母教，所以後來能和喀富爾、馬志尼同樣的担負起意大利民族復興的使命。○意大利人到現在翻開他們的歷史一看，又應當怎樣感謝這位民族英雄之母！

前面說過，幼年的加里波的，即富有冒險的精神。因此，小他就渡着航海的生活。這種生活，正如他父親的所見到的，恰好是愛國心的天然訓練；如旗幟的識別，如身歷各商埠所受的刺激，時時使他記起祖國。有一次，當他隨他的父親航行到具有歷史光榮的羅馬（Rome）時，他在它的荒涼的景象中，猶追憶它過去的偉大。他由於追懷過去光榮的歷史，而激憤當時外族的橫行，和強隣的壓迫。由此，他便下了決心，來恢復那歐洲文明的燈塔——羅馬。

依加里波的自述，一直到二十四歲時，他不斷的在搜覓訪問關於再造意大利的人和事變，但都毫無所得。幸有一次，當他航赴塔干洛格（Tasano）時，他發現船客中，有一位意大利的愛國志士。由於和這位愛國志士的談話，加里波的才知道為意大利民族自由而奮鬥的生活，才明瞭意大利過去那些事變的真像。他不但從愛國志士的口中，聽到祖國過去及當時的狀況，和為祖國而奮鬥的可歌可泣的事蹟，而且在另一次航行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時，因為和一羣聖西蒙主義者（Saint Simonians）——即是

爲一種新宗教而鬥爭的信徒——的領袖會談的結果，使他的胸襟更擴展，嗣後他所討論的對象，不僅限於意大利，並且擴及於全人類的重要問題。他以後亡命南美洲時，冒萬死爲共和軍而鬥爭，也許就是由於這次和聖西蒙主義者一席話的結果。

愛國有心，救國總須有路；受愛國志士所啓導的青年加里波的，既有愛國的熱心，又知救國的路徑。於是，他一面設法和燒炭黨發生關係，一面又設法結識新革命領袖馬志尼。有志竟成，終于一八三三年，當他航行到馬賽時，經他的朋友柯維（Corti）的介紹，和馬志尼會見，談起國家大事，不覺兩氣相投。因此，他便加入了馬志尼的新組織——青年意大利黨。從此，加里波的爲意大利民族而革命的生涯便開始了。

加里波的結識了馬志尼並加入青年意大利黨以後，就參加了一八三四年一月由馬志尼所發動的熱那亞（Genoa）革命運動。在事變進行中，加里波的擔任運動水兵的任務！——因爲他是海軍一等兵，奪佔軍艦，響應革命軍。可是當然那亞政府軍前來鎮壓，海岸上施行戒嚴的時候，他和他的同志，還未動手，就已成爲哨兵捕捉的對象。他急速

逃匿在附近的水果店裏。主審同情他的苦衷，把他喬裝鄉人，在晚間離開了熱那亞，這是一八三四年二月五日的舉。

加里波的經過了二十多天的困苦，逃至馬賽，一得報，知道他已被宣佈了死刑。於是，他不得不改名爲約瑟·巴尼（Joseph Bani），後經友人的介紹，他搭船前往南美洲的里沃·詹尼洛（Rio Janeiro）去了。

在那裏，加里波結交了患難的朋友羅西提（Rossetti），和里沃·格蘭國共和國（Republic of Rio Grande）大總統剛查利（Bento Gonçalves）——是當時巴西（Brazil）帝國的俘虜。他聽說，里沃·格蘭德共和國是爲反巴西暴政而建立的，它的人民正爲着自己的自由幸福，而對巴西帝國發動解放的戰爭。就是，不計利害而純爲俠義的青年加里波的，就慨然加入了里沃·格蘭德共和軍，替打人家的不平，在一八三五年初。

在里沃·格蘭德對巴西帝國的戰爭中，加里波的的頭脈管，曾中了無情的槍彈，但由於他的奮不顧身，和他的嫺熟的操舟技術，終于把敵人的船打退了。這時，他一面追

陣陣亡的同志，一面感激上帝對他的眷愛，『否則』，他感慨的說，『我永久不能再見意大利了，我就永久永久不能再爲她而鬥爭了！爲她是我一生的唯一希望！』

傷愈後，加里波的又跑到里沃·格蘭德的行都皮蘭丁寧（Piratinia）去參見剛查利總統：請纓組織海軍，以便對巴西繼續作戰。在兩個月之內，十二至十八噸木船所編成的艦隊，便下了水，他自己率領一隊去對抗強大的並有汽船的巴西帝國海軍，能夠所向無敵。同時，在陸戰裏，他也能夠以少禦衆。

但是，小小新生的共和國，終不是老大巴西帝國的敵手。最後，里沃·格蘭德共和國終于遭受了塔力發（Tartar）一役的慘敗，總統和主要的官吏都遭逮捕。加里波的見大勢已去，便往另一個小共和國——蒙特維多（Montevideo）去了。

加里波的一生的，和在滔天大浪中漂流的船隻一樣，它永遠沒有平靜，充滿着奮鬥和冒險。剛亡命到南美，他就拔劍而起，替里沃·格蘭德共和國抵抗巴西帝國，前後有六年之久。到寄居在蒙特維多共和國的時候，又因激於義憤，放棄了逐寸一之利及舌

耕的生涯（因為他初到那裏的時候，曾經營小本商業兼充家庭數學教師），重過他的農場上的生活。

加里波利的在蒙特維多共和國，眼見那裏的人民輾轉在反共和的暴力之下，又燃起了他的義俠之火。於是，他毫不猶豫的參加了蒙特維多共和軍，給殘暴者以致命的打擊。後來，敵軍聲稱屠城，各國僑民組織義勇隊的時候，加里波利又作了一千人的意大利隊的隊長。色洛（Oleg）一戰，以寡敵衆的意大利義勇隊，於民衆熱烈的歡呼聲中凱旋，時在一八四三年三月。參加這一役的勇敢的鬥士，如軍旗官薩奇（Saghi）等，後來都成為保衛羅馬共和國的英雄。

加里波利所統率的意大利義勇隊的盛名，感動了蒙特維多共和國國父李維拉（Rivarola）將軍，他特於一八四五年一月三十日函謝加里波利的和全隊的戰鬥員，并願把他自己的田產作為酬謝該隊戰功的禮物。加里波利的代表隊員覆函謝他的厚意說：『以全隊的名義，一致宣稱：當接受武裝與允諾為共和國服役時，舍分担其所垂愛之國民的危難外，

沒有假期別的報酬。因此，在奮鬥中，他們聽從良心的呼號。目前，於完成他們視為一種職責的義務後，他們當按情況必需的要求，繼續分與尊貴的蒙特維多人的辛勞和危險；但他們要求盼望別的代價，以對他們勞動的酬償。『加里波的的俠義心，於此又可見一斑！』

在加重波的爲蒙特維多貢不拉河許多戰役中，最足使他自豪的，是聖。安多尼沃（San Antonio）一戰。當時兩軍相遇，衆寡懸殊，加里波的不令軍中說：『敵衆我寡，敵愈多愈佳，我愈寡則戰功愈大。我們要靜守防線，非到他們近射程以內不開槍，以便容我們作白刃戰。』他用這種戰術，最後給敵人一個致命的打擊。意大利義勇隊以最少犧牲的代價，取得了無上的光榮。時在一八四六年二月八日。

自從一八三四年二月，因參加熱那亞革命運動而亡命海外的加里波的，到現在——一八四六年二月——已有十二年未曾看見祖國了。『身在異國，古人所悲。』而況志在光復民族的加里波的，豈能不望祖國而興嘆？又況祖國正在危難中掙扎而需要他的時候

，他豈能挾勢失了救國的良機。

一八四七年，素以違背奧大利的意志而以自由主義者見稱的羅馬新教皇庇厄斯九世(Pius IX)，因不甘奧國的壓迫，揭起反奧的大旗，請意大利各邦的君主們合作，共同抵禦外侮。一時借於梅特涅(Metternich)——奧國宰相——對「聖父」無禮的人們，都起而響應他。這時遠在異國的加里波利，也為「聖父」的舉動所感動，於同年十月十二日，與同時亡命在南美的意大利志士麥薩尼(Mazzini)聯名上書教皇，恭維他的革命運動。他們相信：「我們的祖國已產生了一個人，理解他的時代的要求，明白他自己怎樣去適應時代的要求。」

加里波利的一面上書教皇，一面準備率領同志返歐洲，服務祖國。因為得到駐蒙特維多的熱那亞僑民安唐尼尼(Giuseppe Arduini)的援助，他於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離開南美，於六月二十四日抵達他的故鄉奈斯。

庇厄斯九世對意大利各邦君主奔走呼號的結果，終於在一八四八年一月，革命的弟

一個浪潮，起於北意的米蘭(Milan)，造成意大利歷史上的『米蘭五日戰爭』。接着，革命的火燄瀰漫了整個的靴形半島，那布勒斯(Naples)的暴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被迫而頒布憲法，威尼斯(Venice)的人民宣布了共和，并推十年來爲威尼斯人民謀幸福而遭千辛萬苦的馬寧(Mariano)爲元首。尤其動人聽聞的，就是薩丁(Sardinia)國王阿爾伯脫(Alberto)自統大軍進駐諾瓦拉(Novara)，并聯合教皇及他國王共同合作，一致用武力對奧國宣戰。這一舉動，把全意大利人民的民族意識，更加發揚起來，由鄉村到城市，由平原到山谷，充滿了抗奧的義勇軍。王公政治家，教士貴族，學生，工人都捲入了民族主義的浪潮裏。

正在這個時候，逃亡在國外十四年的加里波的，率領他的同志們重返故國。懷着滿腔熱血和絕大希望而歸返故國的他，本想請纓殺敵，以償其救國的志願。孰知他始而遭了阿爾柏脫的冷淡，繼而受了陸相李西(M. Ricci)，輕視——他回到奈斯去指揮幾隻小船，充當海盜，終而感覺救國有心，請纓無路！

遭受冷淡和輕視的加里波的，豈甘生活在這冷酷和空虛的環境裏？於是，他就往米蘭去了。馬當聞加里波的到，便倒屣相迎，立刻授以將軍職，并責成他編練倫巴底(Lombardy)義勇軍。加里波約受命後，乃召集各地來歸的志士，編成隊伍，名爲「安薩尼隊」，藉以紀念他的「生死之交」的亡友安薩尼。

五日後，加將軍擁有四五百壯士，佩着犀利的槍械和美觀的服裝去到伯加莫(Bergamo)，會見馬志尼。這枝荷着「上帝與人民」(God and the People)旗幟的數千人的部隊正在蒙查(Monza)受優勢的奧大利騎兵的壓迫，凌亂敗退，幸賴加將軍的聲援，未至潰散。

正在這個時候，由於奧軍有力的反攻威脅，一時高揭反奧旗幟的底厄斯九世，忽然做了漢奸，離開抗戰陣線，被迫頒布憲法的那布勒斯王，乘機用武力鎮壓革命，自動發起抗奧的阿爾柏脫，亦因自己的軍隊節節敗退和奧軍的重陷米蘭，而露出了妥協的尾巴。正陷於危地的加里波的，一面宣布阿爾柏脫是賣國賊，意大利人不應再擁戴他，一面

所率七百五十人進駐亞浪那(Arena)。趁獲船隻，乘夜登陸盧依諾(Lunio)。在這裏，他忍受熱病的侵襲，指揮部隊作戰，終得勝利。他猶賈其餘勇，進追奧軍的主力，但結果敗退森林中。約在這個時候，教皇出走，他遂變更策略，率領殘兵，開赴羅馬。

一八四九年一月，加里波的收集敗兵，開始退却。他在離開里爾提(Rieti)時，好像離開米蘭鎮的岳武穆一樣，人民揮淚相送，以爲無再見之日！他的戰友，如在南美共患難的薩奇(Sacchi)等，愈在他處在危難之中，他們愈欽慕他的高誼，來追隨着他。一路之上，人民對於他和他的部下，可以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那種情景形容之。他率領着五百之衆南行，原來的企圖，是要去拯救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那布勒斯，但當將近羅馬時，他忽然改變宗旨，於四月二十九日入了「不朽之城」——羅馬。

加里波的進入羅馬，正是羅馬共和國被法軍攻擊的那一天。他在大眾歡呼聲中入城後，共和國政府立即授他以將軍之職。他率領着二千五百人防守波特西門(Portese Gate)一帶。迨法軍來攻這「不朽之城」時，加將軍又大顯其以寡勝衆的神靈，大敗法軍。

這時加將軍已決心請兵，乘機遠遁，而彼認爲敗軍不必追趕的執政官元首馬志尼斷阻，遂使法軍捲土重來。歷史家都認爲這是馬志尼不明戰略的錯誤。否則，意大利的命運，或可另有變更。

法軍再來，加將軍仍率衆奮勇抵抗，但以戰士死傷大半，最後不得不請准共和國國民會議，放棄了這『不朽之城』。於是，那曇花一現的羅馬共和國遂成爲意大利歷史上的一段插話。但它畢竟是馬志尼和加里波的們的血與汗的結晶，它在意大利民族革命史上，總不失爲光榮的一段插話。

離開羅馬的加里波的，在敵人面前，作『歷史上最奇特的退却之一退却』。和他一起退却中的人物，除了和他共患難的同志朋友，還有他的夫人安妮他（Anna女士）。

這位加里波的在南美洲共同馳騁於疆場之上的安妮他，在她的丈夫離開南美以前就先攜三個愛兒——門諾提（Monetti）、里敘提（Ricciotti）和特利西提（Terzetti）——返國，以爲戒備。到羅馬被圍，她笑於五月十四日，冒法軍的砲火，投入她的丈夫的懷裏

。加里波的當時的心境是：『現在每宗事對我都好像十分圓滿，保護我的天使，已回到我的身邊。』男裝的安尼他，和別的健兒同站在戰壕內，抵抗敵人，她忘卻了她自己是孕婦，她要追隨她的丈夫，爲爭自由的意大利流最後的一滴血。不幸極矣，在驚險萬狀的退却中，因爲疲憊不堪，她終於成爲意大利民族革命中的犧牲者！失掉天使的加將軍，哀悼的留下她的可憐的屍體，極力壓住他心內的悲傷，帶着愛兒，繼續前進，奔赴美國去矣。

這時，靴形半島有線獨立自由的光明，自薩丁王國放射出來。在「喀富爾」一文內，已經說過，薩丁的新君維克多，陽瑪諾二世（Victor Emmanuel II）知人善任，勵精圖治，又得大政治家喀富爾爲首相的輔弼，國之意大利的一部民族復興史，就由他這一代著成了。

喀富爾佩了相印，輔弼陽瑪諾二世以後，除努力於內政的修明，和外交的靈活運用，并努力在國內推動全民陣線的建立。因此，他除了極力拉攏馬志尼派的馬寧，更注意

於久歷沙場的加里波的將軍。因爲一旦對奧開戰，固然不能缺少像加將軍那樣勇敢善戰的將領，再就國內團結的觀點而言，他也不能不取得爲青年所崇拜的加里波的的贊助。

加里波的自一八四九年逃往美洲後，曾在紐約被僱爲製燭工人。以後又赴南美，因感無活動的機會，乃重返歐洲，充當一個商船船長，轉運貨物，以所得之利，購買了一個名叫古普列拉（Cuprera）的島子。他和他的兒子及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該島從事大規模的墾殖，有時爲售賣貨物而至奈斯。不消說，這時的加里波的，好像在許昌種菜的劉皇叔一樣，其目的固不在耕種，而是等待機會，重爲意大利而奮鬥。這時，他的惟一政治活動，是呼應馬寧，籌集軍火。

因爲加里波的與馬寧呼應的關係，喀富爾對他更爲信賴，遂於一八五九年，請他到杜林（Turin），薦之於國王陽瑪諾二世，國王立即委他以陸軍中將，令他統率義勇軍。這樣一來，使北自阿爾卑斯山南迄西西里島的青年，爭相趨集於加里波的旗幟之下。他着手召集舊部，把義勇軍成爲此後著名的遊擊隊，并發揮著名於戰史的游擊戰術。這時

陸相妒忌他，多方加以掣肘，但加將軍和他的部下，毫不以爲意，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時候一到，他們就去爲意大利統一復興，各流最後的一滴血。

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奧大利對意宣戰。這時候，全意大利上下一心，集中在陽瑪諾二世的旗幟之下，一致對外。加里波的本人，在奧國宣戰前，已奉到進軍布魯薩西哥(Brusasco)的軍令。他於開拔前，發表極興奮極激昂的訓詞，以鼓勵全軍將士，其中最足激勵士氣的有：『我們正走近我們所盼望的目的地，你們的希望，不久就會被決定，你們是正開往與你們的祖國的壓迫者相肉搏，也許到明天，你們就手執武器，向掠奪我財產，強姦我婦女的奧大利，作滿意的要求』等語。

加里波的所統率的軍隊，是來自意大利各邦的義勇兵。由他們的出身來說，有四分之一是貴族的子弟，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由他們的職業來說，大半是工程師，藝術家，學生，律師及商人；由他們的年齡來說，都是由二十到三十歲的青年。他們的服裝，簡單整潔，兵士穿灰色的外套，深藍色的短褲，黑色的子彈帶，軍官穿綠領的藍色束腰

外衣，有綠條紋的藍色短褲。這級則由外衣邊的銀線手袋現出來。這一羣人馬，於四月

二十六日——即奧國對意宣戰前三天——就已到達目的地——布魯薩西哥。

加里波的所統率的軍隊與奧軍相見，即獲得了五月八日的卡薩里（Casale）的勝果。

由於這次的勝利，陽瑪諾王又令加將軍防守波河（Po）右岸，並統率該地的義勇軍。不久，他又得喀賓爾及陸相的命令，馳赴聖，日耳曼諾（San Gerardo）去幫助遜那斯（Sanson）將軍，十三日的大戰，他們使奧軍不能有寸步的進展。

五月間，法帝拿破崙第三，因為實踐法、意密約（詳見「喀賓爾」文內），親率大軍抵意，波河右岸的防務因之強固。加里波的乃請准薩丁王率領部隊，擾亂敵軍後方，藉以喚醒各地民衆起而抗奧。義勇軍所過之處，無論是那一種人，都狂熱的歡迎。在神聖的三色國旗高懸之下，人民高呼着「加里波的萬歲！」，「意大利萬歲！」義勇軍列隊所過的市街，充塞了婦女拋擲的鮮花。他們就這樣的，由這一村到另一村，由這一城到那一城。差不多每到一個地方，加將軍便發出文告，喚醒人民，他常用的警語是：

「武裝起來吧！結束那奴隸的生活！」

「誰能夠手執干戈，而不挺身以保護祖國的，就是賣國賊」。

欲曉得英勇善戰的加里波的的部隊在抗奧戰爭中，所建立的功勳，請看陽瑪諾王六月八月爲加里波的所頒發的第十六號獎狀：

「當聯軍還取守勢時，加里波的將軍統率『阿爾卑輕步兵隊』(Cacciatori delle Alpi)，勇敢的攻擊杜伊那(Duino)沿岸，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進攻奧軍的右翼。數日之間，他抵達西司托，卡達底(Casco-Cadetti)，於擊退敵人後，他進入倫巴底境內，最後駐紮於凡列西(Varese)。當時烏爾般(Urban)元帥(奧軍元帥)率三千步兵，兩百騎兵，四門大砲攻擊該城，加將軍指揮全血的惡戰，并獲得勝利，雖然他一尊大砲也沒有。由其他的戰鬥，他派開了到柯莫(Como)之路。在那裏，他又擊敗奧軍，并奪得他們的軍械及輜重。這些驚天動地的戰功，都是那些青年而老於疆場的義勇軍所建立的，他們應得最高的嘉獎，他們已善爲他們祖國家而努力……」

六月二十四日，法、意聯軍獲得勝利，著名將莎萊利諾（Sarrailh）最後的勝利。拿破崙第三意欲大利於一役，終於有所不利，並將奧帝國的威風凜凜，迫得瑪利王簽字後，加里波的因不滿於國王對和約的妥協，便辭却了義軍總司令的職位，遊歷中意大利，所作政治活動。像從前率領軍隊時一樣，他所經過的地方，有如凱旋之王，受居民熱烈的歡迎，并充滿着「加里波的萬歲！我們的將軍萬歲！」的呼聲。

加里波的辭職後，於九月間陽瑪諾王仍特命他爲十一師師長，且因他爲政治上及軍事上的意見，與政府不合，終于去就師長職。從此，他再隱居古吉列拉島，從事於購買百萬枝快槍運動，企圖再舉。

這時，遠道在英國的馬志尼，聽說那布勒斯的二十歲的新君法蘭西斯二世（Francis II）對於人民的暴虐，仍不亞於他的父親——斐迪南二世，他乃決心鼓勵西西里的革命，以拯救南意大利人民於水火。並觀察時勢，知道這一偉大事業的領導者，只有加里波利堪以勝任，乃爲書請加里波利率領舊部，前往西西里。

一八六〇年四月，加里波的便召集舊部與募加將軍盛名的狂熱者，共得一千又四十八名健兒，號稱『千人隊』，又名『紅衫隊』(Red Shirts)。內有大學生，醫生，律師，商人，水手，藝術家，大學教授，公務人員及一個婦人——西西里革命家克立斯皮(Francesco Crispi)的夫人。

加將軍祕密的——因為怕引起與，法蘭西的干涉——帶着這千餘健兒，由南部意大利，經過千辛萬苦，奔赴西西里。當時，西西里民衆的意識，早被馬志尼喚醒，再加上他們又不堪法國旁波(Bourbon)王朝的壓迫，加將軍一至，他們認為解放的救星從天而降。加將軍在軍民協力合作之下，很快的就克服了那布勒斯軍，而取得了西西里。

取得西西里的加將軍，又着手攻擊那布勒斯。像在西西里一樣，被少年的法蘭西斯暴君所壓迫的那布勒斯人民，不消說，對於加將軍的熱烈歡迎，亦有如歡迎救命的天使似的。因此，加將軍又在軍民合作的優越條件之下，而舉出法蘭西斯登那布勒斯的人民於維席之上，并立下南北意大利統一的基礎。

在五個月內，征服了全部南意大利的加里波利將軍，此時假如存一點私心，他便可安穩的做南部意大利一方之王，民衆絕無不心悅而誠服的。但是，他那大公無私的個性和愛護國家統一的赤誠，使他把本身所打下的江山，和盤托出，交給薩丁國王，使意大利漸趨於統一獨立的狀態。加里波的這種坦白的大公無私的精神和以國家民族爲前提的赤誠，真足以激古今中外革命軍人的模範！

大公無私的加里波的，把自己打下的江山拱手讓與薩丁王後。薩丁王念他的功勞過於偉大，乃許他以正規軍的大將職，終身佩昂諾西亞（Arnoiside）的頸飾，別墅，采邑及公爵爵位；次子任國王的侍從武官，女則賞賜富厚的嫁奩。那知國王的這些個「富位勢厚」的誥封，竟遭受了「等富貴如浮雲」的加里波的謝絕，這時他明瞭繼續進攻羅馬爲不可能之事，即於十一月九日，回返古普列拉島。

由于加里波的拱手讓與那布勒斯及西西里，在靴形的半島上，除威尼斯及羅馬外，都屬於維克多，陽瑪諾的統治區域。一八六一年二月十八日，開第一次意大利國會於杜

林。三月十七日，宣布意大利王國的成立，并尊瑪爾諾二世爲意大利王。

這時，羅馬形成教會的特別區，顯然妨害意大利的統一。於是，收復羅馬，歸之於意大利王國的版圖，實是當務之急。這時候，由國王到首相——現在喀富爾已死，新任首相爲黎加索里（Ricasoli），都一致感覺到。收復羅馬的事業，只有一個人能夠負擔，這個人就是歸隱古普列拉島的加里波的。

先前，當加里波的進入那布勒斯城的時候，馬志尼認爲時機已至，不遠千里由英國跑到那布勒斯，而告加將軍，立即進攻羅馬，頒布共和。但明瞭時勢的加將軍，當時拒絕了他的懇求，使他快快返回英倫。但當他離開那布勒斯時，加里波的和他有一密約，即利用所有的武力，進佔羅馬，驅逐法皇的工具庇厄斯九世。加里波的認爲收復羅馬，是意大利統一必不可免的一步，乃於一八六二年六月間，又出現於西西里。意大利政府——這時黎加索里已辭職，新首相爲拉塔齊（Rattazzi）——恐怕得罪於奧、法兩國，於八月十七日宣告加里波是「國家的叛賊」，并下令通緝他。

不顧一切惡勢力阻撓的加里波的，於八月二十日，率二千義勇軍，橫渡海峽，企圖進襲羅馬，卒被討好於奧、法兩國的意大利政府軍所包圍。結果，義勇軍潰不成軍，加里波的被捕，囚於杜林。

這時，亡命在英國的馬志尼，對於意大利王國政府，大事抨擊，因之久慕加里波的將軍威望的全國國民，都被馬志尼的呼聲喚醒，激起了憤慨的高潮。拉塔齊內閣因為經不起國內外輿論的夾攻，遂於十月釋放被囚的加將軍。一八六四年，加將軍應了英國人士的邀請，曾赴英倫一遊。英國朝野人士，聞加將軍的大公無私的精神！假設當初他有特製一種衣袖，名為『加里波的袖』以紀念這偉大的英雄。或許造成南北兩國一至如此！

一八六六年，意大利國王陽瑪諾以外交手腕與德相鐵士麥（Bismark）締結盟約，因以收復威尼斯之後，只剩下羅馬問題，成為整個意大利統一運動者所欲解決的對象。一生以收復失地統一意大利為目的的加里波的，因而再起。但因有法帝拿破崙第三的干涉，加里波的遂又被第三次出任閣揆的拉塔齊所陷。於一八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又遭逮

國，政府用武力把他押回古普列拉。

境況愈困難，英雄愈堅強，不甘屈服的加里波的，聽到他兒子門諾提率領他的部隊攻入教皇領的拉那，便於十月間又逃出孤島。會見他的兒子，率領四千義勇軍，與法軍鏖戰五次，均告大勝。羅馬的規復即在目前，而新任普魯士參事勃里亞（Membrèa）勾結法軍，出而阻撓，義勇軍終於敗績，加將軍亦被政府羈押。

這是加里波的爲統一意大利最後一次的戰鬥。到七月爲時已至，不遠千里由英國來的邀請，參加驅逐拿破崙第三的革命。雖然未能建立大功。

一八七〇——九月二十日，意大利軍隊乘拿破崙第三充當畢士麥的階下囚時，佔領了巴黎的盛況，和慶祝意大利自由與統一的成功。於一八八二年二月，這位永久受人崇拜的民族大英雄，竟以七十歲的高齡，長辭了他與馬志尼，喀富爾所手創的意大利！

總觀加里波的的一生，像前面所說過的，『和在滔天大浪中漂流的船隻一樣；它永遠沒有平靜，永遠充滿着奮鬥和冒險』。和其他許多民族英雄一樣，他曾數次亡命在海

外，數次隱匿在孤島，亦曾數次被捕。但他每遭一次挫折，每多一次經驗，而志向每愈堅定。他的一生，可以說，苦、辣、酸、甜、鹹的滋味，都嚐遍了，但對於這些滋味的辨別，他只知有甜而不知其他，這一種甜的滋味，就是他預期的意大利的統一，獨立自由！

談到加里波的偉大與成功，不消說，他樹立了抗奧的與征服南部意大利的武功，建立了意大利革命建國期中的民族武功。但這部似乎是有形的功勞，是盡人皆知的。他的偉大與成功處，是前人所說的以國家民族爲前提的大公無私的精神！假設當初他有一點私心，不把勒布勒斯和薩西里，拱手讓與陽瑪諾，也許會造成南北兩個意大利，亦未可知；能否把『昔日之意大利，造成今日之意大利』，實是一個疑問。只就這一點——大公無私——來講，他在意大利歷史上的偉大，最不能用文字去形容的。再把前言重提：加里波的這種坦白的大公無私的精神和以國家民族爲前提的赤誠，實足以做古今中外革命軍人的模範！

馬砂力克

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從滅亡的奧地利和匈牙利帝國的廢墟上，生長出好幾個小國家，其中政治最修明的，首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Czechoslovakia），也就是在最近——一九三九年三月——又被納粹德意志所吞併的捷克。

捷克，我們普通一般人都知道是第一次歐戰後新興的國家，其實，在一五二九年以前，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自敗於奧國，屬於奧國，經過了四百年的奴役，國家的意識久已消沈了。到了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爭自由的時期乃至，人民不願再受奧國的統轄，這時在國外的捷克人都冒險含辛，組織軍隊幫助協約國，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受英國認為協約國之一，同年十月十八日，宣佈獨立，十一月十四日，受各國承認，新的捷克共和國乃於是乎成立。

說起捷克共和國的成立，固然是由於捷克人，在歐戰前已達到很高的文化水準，可

是更應當歸功於領導復興捷克的偉人馬砂力克(Thomas Garrigue Masaryk)博士。有人說：馬砂力克不但創造了捷克共和國，並且是再造了捷克民族，他這種偉大的成功，只是憑他滿腔的熱血，壯烈的情緒，和鏗一般的理智，來運用他的三寸不爛舌和一枝鋼筆，而得來的。

馬砂力克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七日，生於斯洛伐克亞(Slovakia)的一個農家裏。他的父親是一個貧苦的御車者，後來因為過慣流浪生活，又決心改做農夫。不過因受着奧國政府苛酷的租稅所榨取，所以他的貧困，便一天一天的加重了。當時馬砂力克年紀雖然很小，可是他有這樣一個思想：

「我們這些生活於貧困的人民，怎樣能脫出這被壓迫的陷阱呢？」

馬砂力克六歲時，就入了附近的小學，九歲的時候，就能夠閱讀較深的書籍。但是因為家貧，他老早就要担負麵包的義務，所以在這時，他已不能安然的享受學校生活了。他在晚上就要到教會裏去做雜役的童工，才可以得到一塊粗黑的麵包。

七歲的時候，馬砂力克又請求父母的允許，入了師範預備學校，果然，他那超人的天才，就佔了級中的第一位。但不久因學費問題，又退學了，去做了五金店的夥計。同時他的家庭也遷移到奧京維也納（Vienna），他在維也納的五金店裏，很受奧地利人的歧視和虐待，這時他深深的感到失去祖國的悲哀，乃決心將來復興捷克的民族，所以格外潛心的研究各種的學問，他說：

「現在我們捷克民族，在德國和奧國這種淫威之下，變為一個刀俎上的魚肉……他日想爲這悲慘的民族，由死亡的末路，拯救到再生的新途，非具有偉大的毅力和高深的學問不可。」因此，書本就成了他的唯一的朋友了。

但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不幸的事情，就在此時發生了，他用他苦苦節省下來的錢所買的那許多寶貴的書籍，一天被店中一個流浪的同伴偷去了，這給他一個很大的打擊。他看不慣這個罪惡的環境，因此便憤而回了家，被他父親罵了一頓，便命他到打鐵店做鐵匠。他在打鐵的時候，還這樣想着：

「我被盜了比我的生命還重要的書籍，不過我的捷克民族是失了比書籍更重要的領土，爲奧國所盜去了。要取還這些被盜去的領土，將怎樣辦呢？唯有勞動和讀書，除此別無他法！」

這時，馬砂力克以工讀的方法，考入了（Prague）中學的二年級，從繁重的用工，所以他的成績，更是超羣拔萃。因「猶太人」以「猶太人」立中學。這時，因爲困窮，他往往兩三天吃不著飯，更何況讀書呢？但是，這窮困的苦境，馬砂力克這人，把書當做麵包吃咧！」但是，這窮困的苦境，馬砂力克的懷抱，更堅強的求知慾。

中學畢業後，馬砂力克繼續用工讀的方法，考入維也納大學，不消說，仍然是優等的成績畢了業，不久便被母校聘任爲哲學系的講師了。貧窮隨他一生，他那勵志苦學，也有得着報酬的一天。維也納大學派他爲公費留學生，而入德國來普濟（Lipsia）大學。這時，發生一件可喜的事情，他和一位帶有法國血統的美國姑娘名叫謝諾額利，發

生戀愛，一年之後，便結了婚，不久，他們便到美國去了。這不但決定馬砂力克他自己的的一生，并且也決定了捷克國的命運！因為當時最盡力援助捷克獨立的，第一個是法國，第二就是美國。謝諾維利女士，對於捷克的獨立，給了馬砂力克一生許多的幫助。

一八八二年，馬砂力克三十三歲時，負了衆望，由美國歸來，任布拉格大學教授，後又調任該大學科學部長。此時馬砂力克的政治活動，也就帶着很濃厚的彩色了。

這時，馬砂力克的名著「自殺論」，「催眠術論」，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追後又出了一部名著「體母論」。此時，他的哲學地位，名噪於世。他當時所具有的毅力和勇氣，總的哲學解放，作為哲學上，文學上，政治上的現實主義之先驅，實是一切靈感的偶像。他以三寸不爛的舌頭和鋒利的筆尖，作為戰爭的利器。

一九〇四年，馬砂力克在布拉格大學裏，發現了一位生於波希米亞（Bohemia）的一個農家子，名叫貝尼斯（Edward Benes），他是剛進布拉格大學的，馬砂力克和他以師生的關係，結合為同志。不久貝尼斯去法國留學，以提出奧地利問題與捷克問題

的大論文，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回來任母校的講師，這是馬砂力克從事捷克獨立運動時的大幫手。

一八九一年，馬砂力克被選爲代議士。同時他創辦了「那塞托巴」和「我們的時代」的兩種雜誌，以堅強的爭取自由，平等，獨立爲宗旨。一八九九年，在波爾那城附近的一個森林中，發現了一個少女被暗殺的案子，不知誰人是兇手，這時官府以「猶太人因宗教的迷信，有時必須要少女的血，來做儀式的祭禮」爲口實，而竟把一個住在波爾那城中的猶太人希爾司那捉去抵罪。這時，動了馬砂力克的公憤，他出來爲人道而宣戰。他說：「這事是很大的問題，絕不僅是關於希爾司那一人的生死問題，而是影響於捷克民族和人道主義的問題。」他力斥政府的糊塗，當時迷妄的民衆，都反對他這正義的主張，就是從來信仰他的學生們的也是這樣，有的學生竟開始罷課。但不久真的犯人發現了，他的爲正義作戰，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他的熱忱的真理和高貴的人格，也才爲一般人所了解。

這樣，在一九〇七年，馬砂力克被選爲下議員。他組織了一個捷克黨，自己爲首領，大放異彩於維也納的議會室中，而引起了奧人的注意。他受政府和保守黨的抨擊，被認爲危害國家的叛徒。可是，在這惡劣的環境中，意外得到安慰的，便是捷克民族的自覺，同時對他的信心，也加普遍了。全捷克民族，如電光爆發了一個宏亮的警聲：

『馬砂力克博士萬歲啊！世界上的學者啊！民族復興的戰士啊！我們捷克民族的救主啊！』

馬砂力克從此益發努力於捷克獨立的運動，在他的筆尖下，到處都產生了捷克民族的叛亂。於是奧匈政府下了祕密的命令，捉拿馬砂力克，這時馬砂力克毫不在乎，可是他想著『生命自然不足惜，同時我的年齡也將近古稀了。不過現在被他們殺掉，那革命便不會成功，獨立永無希望啊！』因此，他便偷偷的逃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Venice）。

馬砂力克逃走的理由，並不是怕犧牲了自己的性命，正是爲整個捷克民族的獨立而

逃走的，他想『捷克獨立的大本營，非設立在國外不可』。他在意大利居住不久，大概和意大利社會的中心人物都會見了之後，他就走到瑞士的洒布尼，設立捷克的大本營。馬砂力克鼓吹革命的方法，由教育宣傳開始，以捷克民族過去歷史之由來，和將來的出路，使全世界知道爲目的。這時，他又組織了有名的「潛行組織」，並且想出最巧妙而祕密的通訊法。這樣，在瑞士有馬砂力克指揮活動，在奧匈布拉格地方，就有不露聲色的貝尼斯負責。

馬砂力克雖然已逃出了奧匈國境，但是眼睛看不到的繩索，仍然環繞束縛着他的週身。奧匈政府所派到瑞士來的暗探，時刻追隨着他的蹤跡，并且使用很卑鄙的手段，買動那些送牛奶的德國工人，來用毒藥暗殺他，當時，幸虧他的親密的同志勸告他，從此他才多方當心，防備暗算。

這時，貝尼斯因爲在奧匈布拉格地方活動的結果，也引起了奧人的注意，於是也逃到瑞士來，同馬砂力克住在一起，訂定了捷克獨立的憲章，一面分頭到巴黎，倫敦，去

作國際活動。

一九六一年，馬砂力克到了倫敦，接辦了他的故友砂羅利博士所主辦的「侯北利雜誌」。作爲捷克獨立運動的機關雜誌，在這個雜誌裏，每星期必有馬砂力克雄辯的筆鋒發表捷克獨立黨的理論。不久，又得友人的推薦，他便任了英國輕古斯大學的教授。他在大學第一次講演的題目是「危機中的歐羅巴諸小國問題」，這篇講演，給當時政治界和思想界一個很好的反響。他在倫敦也開了一個大規模的政治講演會，爲其主腦的，便是英國愛斯葵首相。首相的講演是「捷克民族獨立問題」，這次講演的結果，更引起了世界對捷克民族的獨立的同情，而捷克斯洛伐克亞（Czechoslovakia）這個名字，也被宣傳到全世界了。

馬砂力克對於宣傳，具有一種高超的卓見。他以宣傳的力量，得到了協約國國民的同情，以世界輿論的力量，促成捷克的獨立。他更具有一種熱情的真理，他說：「宣傳的方法，不可化爲煽動的政治宣傳，務必要闡明真理。宣傳要正直的言論，要不偏不倚

的精神，訴諸感情，不如訴諸理性。不能仿效商人的方法，申述貨物的好歹，不能以欺騙方法，勾引人民來盲從。更不能利用民衆感情衝動時，作爲一種革命的力量。」

當時有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怎樣籌劃經濟？經過了最後的決定，便定下了這樣一個議案：「輿論和政治軍事，請求協約國政府援助，經濟，請求僑居英美兩國的捷克同胞援助。」當時的捷克人，對於馬砂力克的信心，異常狂熱，因此共捐了二百萬元的巨款。馬砂力克看到捷克人對於獨立運動，這樣的燃燒着熱情，他便被感動到流淚。他說：「啊！我們捷克，無論如何，是不會亡國的！因爲捷克民族的心，還不曾死啊，他們還有血，還有淚？但是我們這些領導他們的人，應該要怎樣拿出我們的良心，拿出我們的血，來完成這艱鉅的工作。親愛的同志們，我們應該如何盡到我們的責任！無論怎樣，都不要使他們失望啊，你們可知道，這一分一厘，都是他們的血汗啊！」

這樣的籌集了捐金，革命的進展，較爲順利了。一九一六年夏季，成立了捷克國民委員會（Czechoslovak National Committee），馬砂力克當選爲會長，貝尼斯爲祕書長。

，這就是創立捷克共和國的先聲。當時又得到法國總理白里安（Briand）的幫助，使法國政府承認捷克民族的自決。同時從大西洋的彼方，美國大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了著名的民族自決條件，這是馬砂力克一個大大的幫助。正在那時，在俄國活動的史德芬尼克（Stefanik）來了一封電報說：『已糾合在俄國的捷克民族，組織一個軍團，已得俄國當局的諒解，請即來俄國相助！』他看到了這個電報，不覺的笑了說：『啊！走到了成功之路。』

馬砂力克即刻走到法國，去訪問貝尼斯來決定他們的計劃。他說：『獨立的前途，展着明亮的曙光。我即刻要到俄國去，率領着一團軍，去和德奧軍交戰，我們就變為協約國中的一個獨立國了。將來在和平會議席上，我們才有重要的發言權呢。』

馬砂力克雖懷着滿腹希望到俄國去，但恰巧俄國正在鬧波爾雪維克（Bolshevik）革命的漩渦中。這時，波爾雪維克政府想把那五萬人的捷克軍團收歸己有。馬砂力克這時一面訓誡他的五萬捷克青年軍人，叫他們堅決奮鬥，退出俄國，去參加協約國作戰，

一面通謀波爾雪維克政府，表示捷克軍團一定要退出俄國，去從事於自己民族的獨立戰爭。此後，他急由西伯利亞鐵路向日本去了，途中他開始拿起筆來，寫「新的歐羅巴」一書。

一九一八年五月九日，馬砂力克到了古巴（Cuba），和威爾遜總統相會，有了很深的交情，這點對於捷克的獨立，更得了不少的便宜。同時，五萬的捷克軍隊，在西伯利亞爲赤俄的軍隊所包圍，最後，只得往太平洋退去，這事使美國民衆都爲不平，而爲捷克軍的脫出虎口喝采。

在這期間，德奧同盟軍的命運，就一天一天的危急了。馬砂力克趁此機會，發表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宣言，把捷克國民委員會，改稱爲捷克斯洛伐克國臨時政府。他自已爲大總統兼國務總理及財政部長，以貝尼斯爲內政部長兼外交部長，以斯德芬奧克爲軍政部長，那時奧、匈已受了最後的打擊，而捷克新興國家，被法國及協約國相繼承認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馬砂力克乘了爾馬尼號，從紐約回國，指導一千三百萬國民奮步前進，并定布拉格爲國都。這樣，他那和祖國共存的新生命，便活潑的發展着。但是，不幸極了！捷克因爲內部民族過於複雜，就給了希特勒侵略的魔掌以可乘之機，於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納粹的砲火，又粉碎了馬老總統多少年心血所創造的新興捷克！捷克的復興獨立，剛剛才到二十年，又遭遇了第二次的厄運，這是馬砂力克在長眠中，所夢想不到的啊！不過，他的繼承者貝尼斯總統，帶着捷克政府，亡命在外國，正是像他們當年一樣，在從事於民族復興運動，這點，亦足以安慰馬老總統於九泉之下吧？！

畢蘇斯基

第一次歐戰的烽火熄滅了以後，從三次被瓜分過的一個中歐的王國廢墟之上，剛復興起來二十多年的波蘭（Poland），在去年——一九三九——的九月，又遭遇了第四次瓜分的慘禍！它的志士和英雄用熱血所染成的那幅波蘭地圖，現在又改變了顏色，而「波蘭」這個字樣，亦成了世界歷史上的一個名詞了。這雖然是帝國主義節節侵逼的結果，而波蘭的「老成凋謝」，以致「人亡政息」，恐怕亦是最大的原因。我們緬懷往賢，就不能不稱述在三次瓜分後的波蘭之復興者畢蘇斯基的英雄事業了。

畢蘇斯基（Joseph Pilsudski）是波蘭共和國的創造者，所以人都尊他為波蘭的國父。他是在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生於俄屬波蘭的威爾納（Vilna）附近的柴洛（Zulow）地方。他的一家都是參加革命運動的，所以他從小的時候，就眼看到革命失敗人士所受的殘酷刑罰。他的母親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思想新穎，意志堅強的女子，她曾以波蘭

浪漫文學傳授給她的兒子，因此，事蘇斯基自幼就酷愛自由。在一八六三年的革命當中，他的叔父不幸被難，同時他的祖父，父親和姑母，也相繼被捕入獄，使他幼稚的心靈受到很大的刺激！

後來，畢蘇斯基入威爾納高等學校讀書的時候，他的同學大多數是俄國政府官員的子弟，他受盡了他們嘲笑和侮辱，因此他就更痛恨外人的壓迫，於是他立志拯救自己的民族，使它脫離俄國的羈絆，而完全恢復它的自由和獨立。十八歲那年，他入了克勒科大學（University of Cracow）研究醫學，不久的時候，他因為參加波蘭解放運動，而被學校斥退了。離開這個學校以後，他就回到威爾納，聯絡青年同志，從事反抗俄國的革命運動了。在一八八七年他二十歲的時候，他竟因革命的活動，而被捕下獄，更輾轉被放逐到西伯利亞（Siberia）。

在這次的放逐中，畢蘇斯基遇到了一位波蘭革命的老前輩，名叫夏華士（Boleslaw-Schwarz）。這位老前輩和他傾長時間的談話，便成了他終身的政治理想。

畢蘇斯基住在不毛之地的西伯利亞，共有五年之久，至一八九二年，俄皇大赦政治犯時，才被釋放。回來以後，他又到威爾納，仍然繼續從事於革命運動。他組織了一個波蘭社會黨，以恢復波蘭民族自由獨立爲目的，竭力鼓吹國民軍事訓練，以備對抗俄國。同時，他又創辦了一個機關報名叫「勞動者」，用作革命的宣傳，這使俄國政府對他更加注意了。

畢蘇斯基所創辦的這個「勞動者」，老早就爲俄國政府所忌視，而想把它禁止刊行，但是永沒有發現它在什麼地方，直至一八九六年他和他的刊物的印刷所終於被俄政府所發現了。於是他又被捕，被監禁在瓦薩（Warsaw）的砲台裏，後來又遷禁到聖彼得堡的聖保羅（St. Paul）監獄，他在這個監獄裏，整整過了五年的痛苦生活。後來有一個名叫馬呂奇維支（Mazurkiewicz）的波蘭醫生到監獄來給犯人看病，畢蘇斯基就假裝起瘋癲來，暗中和這位醫生密謀逃脫。結果他和醫生掘破了監獄醫院的牆壁而逃走出來。

畢蘇斯基脫獄以後，靠着朋友的幫助，從俄國跑到了奧國邊境的克勒科（Czeco）地

方。在這裏他着手組織并訓練起一支波蘭軍隊，準備時機一到，就可作為波蘭解放的工具。一九〇四年，日本和俄國的戰爭爆發，畢蘇斯基認為反抗俄國的時機已到，於是他就顧緩和平派的反對，獨自跑到日本，和日本朝野商議合攻俄國，并請日本接濟軍火和糧餉。不幸的，這個時候，波蘭國家民主黨的領袖杜模斯基（Roman Dmowski）正在東京極力反對畢蘇斯基的這個計劃，致使日本沒有同意。這時畢蘇斯基只得失望的跑回波蘭，但是他仍舊竭力設法使波蘭軍隊不受俄國的調遣，以減削俄國對抗日本的力量。

一九〇五年，俄國發生革命，畢蘇斯基就乘機率領他秘密組織的軍隊參加抗俄，劫掠俄國的邊地，釋放革命政治犯，劫持俄國的火車，組織各種的暴動，這些事情，他都親自參加，并且屢獲勝利。不幸不久的時候，俄國革命失敗，沙皇政府即於一九〇七年派大軍到波蘭，用極殘酷的手段，把波蘭的亂子壓平了。這時畢蘇斯基迫於不得已，乃將他的軍隊由波蘭撤退，散伏於世界各地，同時從事宜傳和組織，以號召起更廣大的解放祖國運動，於是從前對於國事不甚關心的人，也都自願給他效力，甚至於犧牲了他們

的生命。

後來，因環境惡劣，有一個時期，畢蘇斯基和他的同志蘇斯基庫斯基（Casimir Sosulowicz）隱匿於克勒科，指揮同志在奧屬和俄屬波蘭境內秘密組織軍隊。至一九一三年，這種秘密的組織，在奧屬波蘭共成立了支部三百多處，在俄屬波蘭境內的，為數更多。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德國把軍隊都集中在西線上，把東線的防禦，幾乎完全交由奧國負責。這時畢蘇斯基認為攻俄的時機又到，乃率領部下的軍隊四千人去幫助奧國抵抗俄國。八月六日，他率領軍隊攻入俄國，佔據岐爾斯（Zimorod）城，從此便奠定了波蘭復興的基礎。

一九一六年，俄國的軍隊慘敗以後，俄屬波蘭又被德奧所瓜分，而德奧對於波蘭的壓迫，仍然備極殘酷。在這種情勢之下，波蘭絕無獨立的希望，於是畢蘇斯基又與俄國聯合，轉其槍刺以對德國。結果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和他的參謀長蘇斯基庫斯

基竟爲德軍所擒，被囚在馬德堡(Magdeburg)獄中。他在獄中的時候，仍然鼓勵他的同胞，繼續爲祖國的解放運動而奮鬥。直至第二年——一九一八，德國發生革命，社會黨大赦獄犯時，畢蘇斯基和蘇斯庫斯基才被釋放出來。

原來，在畢蘇斯基被囚以後，波蘭的愛國志士都在世界各地，極力圖謀波蘭的復興，因此，大得英、美、法等國的同情和援助。所以在一九一八年歐洲大戰告終的時候，波蘭的獨立臨時政府，就在瓦薩成立了。迨畢蘇斯基由馬德堡獄被解放歸來後，便就任了臨時政府陸軍總長的職務，并率領軍隊，解除德國軍隊的武裝，遣送他們回國。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即歐洲大戰休戰後第二日，臨時政府辭職，於是國務會議便公推畢蘇斯基爲波蘭的大總統。

但畢蘇斯基是一個有雄心的人，他一心想建設一個不受國會節制的中央集權政制。所以到了一九二〇年憲法會議草定了一份帶有多量民主氣味的憲法。而至一九二二年依之舉行總統選舉時，他便絕拒爲總統候選人。等到新總統那魯托維支(Gabriel Narutowicz)

Wicz)選出後，畢蘇斯基便掛冠而去，度其平民的生活了。

新政府成立後，因為黨派分歧，時在搖搖欲墜的情勢中，它的施政的困難，更不消說了。不久，那總統被異黨所殺，國會又重選畢蘇斯基的密友華綏召斯基(Symon W. ojcichowski)爲總統。但是因為財政問題，內閣仍時刻發生更迭的風潮。迨華總統命章托斯(Witos)出組內閣時，波蘭的經濟恐慌，達於極點，同時章托斯又發表了裁減軍備政策，於是畢蘇斯基乃起而反對，極力攻擊章內閣。斥其腐敗無能。這時贊成畢蘇斯基的軍隊，都起來作他的後盾，於是他就領兵向京城瓦薩進攻，實行政變。結果政府軍失敗，華總統和內閣總理章托斯都相率逃走，同時向國會提出辭職。這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的事，是新波蘭史上的一個著名的政變。

政變後，五月三十一日，國會公舉畢蘇斯基爲總統。但他詎而不就。六月一日國會另選他的朋友莫錫基(Ignace Moscicki)爲總統。十日莫總統任命畢蘇斯基爲內閣總理，兼陸軍部長。因為總統僅僅擁有虛名，所以全國實際的政權都在畢蘇斯基一人的手裏。

，因此他就成了波蘭的一個實際上的狄克推多了。

畢蘇斯基統治着新興波蘭，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這時他以六十八歲的高齡，與世長別，波蘭全國都在哀痛！

我們綜觀畢蘇斯基一生的志願，完全爲求波蘭民族的自由與獨立，所以在他爲求達此目的而奮鬥的過程中，不惜以任何手段出之。我們看他始而聯德、奧以攻俄國，繼而聯俄國以攻德、奧、中間遭受了幾許的磨難，無非都是爲恢復祖國固有的光榮。那知波蘭的復興，剛剛二十多年，又遭遇了第四次瓜分的厄運，這也是畢蘇斯基在九泉之下，所不甘瞑目的！但是，經他一手訓練出來的柏克（Joseph Beck）上校（即亡國前的波蘭外交部長），和他的好友莫錫基總統，都仍然健在，都在繼承他的遺志，爲再造波蘭而奮鬥於國外。波蘭或許還會有再現於世界的可能吧！

范勒拉

范勒拉 (Eamon de Valera) 是愛爾蘭 (Ireland) 民族革命運動的領袖人物。他領導着愛爾蘭新芬黨 (Irish Sinn Féin Party) —— 後來叫做共和黨，是主張愛爾蘭完全脫離英國的關係而組織完全獨立的共和國的，從事於反抗英帝國主義的運動，已竟有二十年的歷史了。在他奮鬥的過程中，就像其他許多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一樣，也就像命運註定了似的，曾經有數次被捕入獄，但是他却始終沒有因為困難而後退；相反的，他却再接再厲，堅持不移。愛爾蘭到現在雖然沒有達到完全獨立共和國——例如外交、國防、關稅，英國仍須過問——的地步，但是范勒拉在愛爾蘭民族解放史上，實應佔極光輝燦爛的一頁！

范勒拉是在一八八二年生於美國的紐約 (New York) 城。他的父親是西班牙人，因為政治上的關係，亡命到美國。他的母親是愛爾蘭人，從小就移居在新大陸，她生平

極壓惡英吉利人。當范勒拉六歲的時候，他父親死了，於是他母親就帶他回到故國——

愛爾蘭——居住。

范勒拉回到故國以後，就被他母親送到當地的小學裏讀書。小學畢業以後，又進了中學肄業，專攻師範教育。追他在高等學校畢業後，他就在那柏林（Berlin）地方執教鞭。在那個時候，他結識了一位教史學的女教員，後來便和他結了婚。范勒拉對於英國人的仇視，大部分可以說是由於母性的遺傳，但是自從和這位教愛爾蘭七百年獨立運動史的史學教員結合以後，他那仇視別人的態度，更是加深了。

累積了歷史上長久的仇恨，激發於民族獨立的要求，愛爾蘭人時時的奔走奮鬥於反抗英帝國主義和民族獨立的追求裏。但是因為自己力微的脆弱，英帝國主義壓迫的厲害，和沒有得到適時的機會，所以雖經過了長久的奮鬥，終是屈服在英國的鐵蹄之下。好時機到了，第一次歐戰的烽火從巴爾幹半岸的一角燃燒起來了。這時英國亦捲入了大戰的漩渦，幾乎無暇顧及愛爾蘭問題，因此愛爾蘭人便得到了一個極活躍的機會。

一九一六年耶蘇復活節那一天，都柏林的新芬黨乃揭竿起事，統率市民舉動，佔據了都柏林城的各處要隘，宣告獨立，建立愛爾蘭共和國。這時候，范勒拉正供職於愛爾蘭國立大學，風聲傳到，他便投身從戎，營率一部分革命軍；駐防在山街（Mount Street），結果因寡不敵衆，并爲避免英兵屠戮起見，范勒拉祇得投降，作英兵的俘虜。

這次起事失敗後，愛爾蘭重要的革命領袖，都遭了槍決的慘禍。范勒拉因爲生長在美國，佔了國籍上的便宜，乃被判處了無期徒刑。一九一七年，英皇宣佈大赦，范氏才得恢復自由。

這次起事，雖然遭受了挫折，沒有成功，但英首相魯易喬治（Lloyd George），却因此提出了愛爾蘭自治的第四次提案。這個提案在議會通過後，北愛爾蘭允許接受，照章組織議會。而南愛爾蘭始終主張用武力來建設獨立的共和國，并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宣佈愛爾蘭共和國成立，舉范勒拉爲大總統，這事惹起英國人大不滿意，乃下令禁止新芬黨的活動，解散新芬黨所設的愛爾蘭議會，逮捕黨員，查封報紙，新共和國，乃告瓦

解。這時，范勒拉又被控以謀反政府罪，再度被捕入獄。後來他得到黨裏的營救，便從監獄裏逃了出來，喬裝改扮到了美國。他在美國，曾向旅美的愛爾蘭僑民募得巨款，以供給愛爾蘭共和國（這大概是指新芬黨於一九一六年自動組織的南愛爾蘭政府而言的——編者）。

一九二一年，英首相魯易喬治，鑒於愛爾蘭獨立運動的堅決，知道不是單靠武力，所能鎮懾得住的，乃邀請新芬黨代表到倫敦，開和平會議。結果，英政府允許愛爾蘭南部二十六郡成立愛爾蘭自由邦，及其立法，司法的獨立，惟總督須由倫敦派定，愛爾蘭又必須誓志忠於英皇，更給英國海軍以便宜權。一九二二年六月成立愛爾蘭議會，十二月格雷麥斯（Arthur Griffith）正式接受了組織自由邦的協定條約。但是范勒拉對於條約表示不滿，愛爾蘭因此發生了內亂，都柏林城所有著名的建築物，幾乎全部燬於大火。英政府雖然用高壓的手段，來彈壓反自由邦政府者，但是反對的空氣，仍然一絲也不減殺。後來直等到范勒拉不忍再看到他同黨慘遭殺戮，犧牲性命，遂下令取消

和自由邦政府取對敵的行爲，這樣，愛爾蘭南部才獲得了和平的狀態。

一九三二年八月，范勒拉因招集同志，譴議他的政見，被自由邦政府逮捕入獄。

政府方面本想治他以死罪，但又深深的恐怕激起了民衆的反對，乃把他改爲軟禁，直到他的同志都是散了，才敢把他釋放出來。范勒拉出獄之後，就在政治舞台上又活動起來。

一九三二年愛爾蘭自由邦總統競選，范勒拉竟被選爲總統。范勒拉獲得政權之後，就積極的從事於抗英運動，取消愛爾蘭人對英皇效忠宣誓，并且拒絕繳納巨量的地款給英國。他的理由是因爲嚴重的農業蕭條，愛爾蘭人民無力負擔這筆巨款。因此，英政府就對自愛爾蘭輸入商品徵以重稅，作爲對愛爾蘭拒絕地款的報復。但愛爾蘭人不但毫不示弱，他們反更堅決的表示誓不服從英國的意旨，他們在范勒拉領導之下，依據經濟民族主義的原則，竭力企圖把自己的國家改造爲獨立自給的經濟單位。可是，愛爾蘭政府因爲受了和英國經濟戰爭的影響，內部不得不嚴行緊縮政策。這樣一來，却引起了愛

爾蘭議會中與政府黨站在一條線上的工黨的反對，范勒拉爲貫徹他的政策起見，於是決定解散議會，訴諸選民。

范勒拉的政見是主張愛爾蘭完全脫離英國而獨立。但是親英派如前任總統康斯格勒甫（William T. Cosgrave）之流，則不主張與英國分離，所以范勒拉這次當選爲總統，實含有重大的意義，迨一九三三年一月選舉的結果，范氏又完全勝利，可是愛爾蘭民心仍是趨向共和黨——即新芬黨。范氏二次獲選後，對於愛爾蘭的獨立運動，更積極進行。他的政策，是無往而不與英國的利益衝突，因此就不免常引起英人嚴重的反響。

范勒拉對於南北愛爾蘭統一問題，主張南北合併。但北愛爾蘭居民，有許多是移殖來的英國人，他們當然對英國表示好感，不願合併，所以范勒拉要想達到此目的，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於經濟上，愛爾蘭的農產品，大都是對英的輸出品，在另一方面，愛爾蘭所需要的工業品，却也非仰給於英國不可。但英國對愛爾蘭提高關稅，就使愛爾蘭在經濟上受了極大的打擊。因此，從經濟利害上講，范勒拉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

是不利於愛爾蘭的。所以有人說：『范勒拉在實際 已漸成爲過去的領袖人物，他的思想和政策都難於應付現在和平來的愛爾蘭問題；他的腦袋裏所裝的東西還只是民族革命，似乎關於社會革命的影子一點都沒有。』但是范勒拉以多年奮鬥不屈的精神，去爭取祖國的自由獨立，這在愛爾蘭民族解放史上，實有其重大的意義，是值得我們拿『民族英雄』的字樣，來稱頌他的！

柴魯爾

人們一提到非洲東北角上的埃及（Egypt），馬上就會連想到它古代的歷史所放射偉大燦爛的光輝。任憑時代怎樣的變化，而尼羅河（Nile）畔的文化，總不會失掉它應得的價值。不幸，這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早在十六世紀初葉，就被土耳其帝國所吞併，後來又被蹂躪在大英帝國的鐵蹄之下。

埃及的青年和一部分政治家，鑒於祖國的危亡，早在以「埃及人的埃及」和「恢復埃及的文明」相號召，醞釀民族獨立運動。不過這種運動，在第一次歐戰以前，它的範圍僅限於一部分政治家和受過教育的青年。等到歐戰爆發以後，這種民族獨立運動，便掀動了埃及全國廣大的羣衆。這是因為在歐戰當中，英國所加給埃及人的壓迫和剝削，例如英國官吏到鄉間去強索牲口，駐紮埃及的英兵的強暴姿態，以及英艦的私運「海洛英」等，使埃及廣大的羣衆都嘗到無限的痛苦，因而激動了他們的怨恨和反抗。此外

，英國在大戰開始以後，曾言言允許埃及以獨立，迨戰事結束以後，就食前言。因此，民族自決的聲浪遂漸增高，而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運動，遂進入了更多的階層，向前急進，領導這個廣泛解放運動的偉大領袖，就是柴魯爾（Saadallah Pasha）氏。

柴魯爾是埃及的一霸農民之子，曾畢業於愛資爾回教大學。他富有演說的天才，擅長演說的技術，每一講演，輒侃侃動人，因此人多由佩服他而至跟從他。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巴黎和會開幕的時候，柴魯爾就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向英政府要求交還埃及的政權，允許埃及完全獨立。他這麼一來，便引起了埃及人更多的同情，尤其青年學生，更競相擁護他的主張。但是英政府以柴魯爾無合法的代表資格為詞，拒絕了他的要求，於是埃及人的反英運動，又如潮般的掀起，各地不斷的發生暴動。英國駐埃及的司令官，見勢不佳，乃宣佈全國戒嚴，但終久也沒有收到良好的效果。一九一九年三月，英政府下令逮捕柴魯爾等首要分子，解往瓦爾他（Valletta）去了。

英國這種高壓手段。不但沒有收到鎮壓的效果，反而更激起了埃及的憤怒。所以當

柴魯爾被解至開羅（Cairo）車站的時候，有埃及青年學生作廣大的示威運動，搗毀交通機關，更有許多民衆與英國軍隊肉搏，死傷了很多的人，風潮益形擴大，埃及一時幾乎陷於無政府的狀態。英人不得已，乃假託愛倫貝（Allenby）氏的調停，釋放了柴魯爾，柴氏被解放以後，在巴黎住了兩年，對於獨立運動，仍在暗中指導。

這時，英政府鑒於事態的日形擴大，亦知道不是用高壓的手段所可解決的，於是乃採用懷柔政策，派米爾納爵士（Lord Milner）到埃及調查，以圖敷衍。但當時埃及的政治重心，已由政府而轉到柴魯爾的手裏，打算平定埃及的騷亂，又非請柴氏出來不可。於是就請他加入內閣，而又遭了他的拒絕，他遂以國民的代表自居，同時并要求埃及首相亦做代表之一，但未得到英政府的允許。此後，埃及政府派人到倫敦，與英政府共商平定埃及騷亂的辦法，而柴魯爾偏偏在國內專作煽動的工作。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開羅舉行大示威運動，柴魯爾又復被捕入獄，先被押解到蘇彝士運河，後又轉到亞丁（Aden）最後押解到錫蘭（Ceylon），這時埃及國內的革命運動，仍在蓬勃的進行

着。

柴魯爾這次被捕以後，不久就被釋放了。英帝主義者鑒於一味高壓，不能奏功，因此在一九二二年，又同埃及重開交涉，結果，在當年三月，英國發表了撤消埃及保護的命令。第二年英國又承認了埃及的新憲法，宣布埃及爲君主立憲政體，轉以兩院制的議會，實行全民選舉，男女小學教育，一概免費，對於宗教信仰，採取寬大的態度，明定回教爲國教，以阿刺伯文爲國文。在憲法頒布以後，英國就取消了一九一四年以來的戒嚴法，並釋放全體政治犯。這樣一來，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似英國已竟承認了埃及的獨立，但是實際上，埃及人民所得到的獨立，只是獨立的虛名罷了，關於這一點，我們看英國聲明保留下的四項條件，就可以知道了。這四項是：

- 一、英帝國在埃及境內保障其交通上安全的問題；
- 二、對於直接或間接的外國侵略英應給予保護的問題；
- 三、埃及境內外僑與少數民族的保護問題；

四、蘇丹問題。

英政府對於埃及獨立問題，除保留了上列四項條件外，並聲明保留實權。規定埃及政府必須聘請英國人做財政和司法的顧問，以便實行監督。此外還要佔領埃及的領土，駐紮軍隊。所謂埃及的獨立，不過如此而已。

柴魯爾對於新憲法本不滿意，可是他的黨人們都一致參加了一九二四年一月的第一屆國會選舉，結果，柴魯爾派的國民黨（*Nationalist Party*）竟獲得絕大多數的議席，柴氏本人也做了獨立後的埃及的第一任首相。

這位新任首相柴魯爾，仍以為真正的獨立，可用談判或請願的方式取得來，所以他屢次向英政府要求撤回駐埃及的軍隊，和歸還蘇丹。但是他的屢次的要求，都遭了當時英國首相麥克唐納（*Mac Donald*）的嚴峻的拒絕。後來，柴魯爾仍不死心，他親自跑到倫敦，去作「秦庭之哭」，懇求撤退英國軍隊，撤回英國的財政和司法顧問，應除郵政管理上的干涉。共同保衛蘇彝士運河，最重要的。仍主要求英國交還蘇丹的問題。可惜

柴氏在倫敦停留了三個月的工夫，終毫無所得。

埃及所希望解決的重要問題，既然沒有解決的希望，於是埃及人的仇英運動又起，拒絕交付駐埃及的英軍隊的五十萬鎊的軍費和土耳其時代的賠償。這時英國雖對埃及嚴重交涉，但柴魯爾堅持以收回蘇丹爲一切談判的先決條件。英國本着它帝國主義的精神，不肯讓步，終於激成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刺殺英國駐蘇丹總督兼駐軍總司令斯太克（Sir Lee Stack）於開羅的事件。這事觸動了英帝國主義者的憤怒，乃因埃及提出哀的美敦書，要求埃及撤退駐蘇丹的軍隊，并承認英國在蘇丹的水利上有無限擴充的權利，更要求是埃及賠償卹金五十萬金鎊。柴魯爾不忍喪權辱國，乃自動下野去了。

從此以後，柴魯爾所領導的國民黨，雖然屢次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大多數的議席，但是因爲有英國妬忌的關係，也不斷的遭遇了阻撓和壓迫。因此埃及的政權就不得不落到親英派的齊華（Ziwar Pasha）和懦弱無能的薩華特（Sawat Pasha）之流的手裏。以後雖有繼柴魯爾任國民黨領袖的奈哈斯（Nahas Pasha）做了一任首相，打算一反親英派和

懦弱無能的首相之喪權辱國的政策，但究竟遭受了英國武力的壓迫，而終於去職了。可是，柴魯爾所領導的國民黨在野的潛勢力，仍在培養滋長着。

我們看柴魯爾所領導的埃及民族解放運動，雖然沒有完全成功——至少也有一些成就，但是埃及人民之民族意識的喚起，和他們爲爭取獨立而表現出來的反英運動，不得不歸功於爲民族奮鬥的柴魯爾。所以我們稱述柴魯爾，就像稱頌其他許多民族英雄一樣，是在於稱述他爲民族而奮鬥的意志和精神，至於他的完全成功與否，我只好本着『成敗不足以論英雄』的意思，看作是另外的一個問題。

華盛頓

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是北美合眾國的創造者，是美國自由之花的栽培者，他個人的歷史和整個美國的發展史，是不可分開的。換句話說，美國的一部燦爛光輝的獨立史，是由華盛頓開頭寫出來的。美國的自由之花，是華盛頓和英國血戰八年的血所灌溉和培植出來的。因此，華盛頓就成為美國以及全世界人們所欽仰的民族英雄和偉人。但是華盛頓和其他英雄偉人一樣，他的偉大，並不是因為他有一可學而不可及的天生的「超人」的本領，相反的，他也是像我們一樣的「常人」，他的成功和偉大，乃是由於他的謹慎勤懇，由於他的自勵和學習而來。這樣看來，華盛頓的生平，實在是我們青年人進取奮鬥以求民族復興的好榜樣！

華盛頓是一個正直的和見義勇為的人。這由於兩個膾炙人口的故事，足以證明。第一個故事，是他幼年的時候，以斧斫櫻桃樹，而能夠不怕他父親的懲罰，直認不諱；第

二，是他作測量師時，由河裏救出一個四歲小孩子的故事。由於這兩個故事，我們知道華盛頓是一個正直和見義勇爲的人，這些優良的德性，就是華盛頓後來成爲民族英雄和世界偉人的因素。但是，這些優良的德性，也正是每個人在而俱有的，只要我們保存牠，使牠發揚光大，可以說，也不難作一個民族英雄的華盛頓！

華盛頓於一七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生在美國的佛及尼亞（Virginia）洲，他的祖先是英國人，在一六五八年的時候，他的曾祖約翰（John）乃遷到北美的佛及尼亞洲，在那兒購得廣大的土地，享受那幸福的僑民生活。華盛頓的祖父魯連士（Laurence）生平的事蹟，無可稱述。魯連士的次子奧古斯丁（Augustine）就是民族英雄喬治華盛頓的父親。奧古斯丁是一個很有學問的商人，他的夫人白特勒（Jane Butler）生了四個兒子就死了，他又娶了瑪利（Mary），瑪利生了五男一女，華盛頓就是她的長子，所以華盛頓一共有弟兄九人和一個妹妹。

華盛頓十一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奧古斯丁就死了去，他分得了二百八十畝櫻桃園和

十個黑奴的遺產。但是這時他的年紀很小，所以他分得的遺產都歸他的母親瑪利管理。瑪利是一個粗通文字的良好，謹慎而勤勉，華盛頓的一生謹慎勤勉，不消說是受了她的優良家教的影響。

因為當時佛及尼亞州的教育很不發達，所以華盛頓幼年時代所受的學校教育，只是句讀，習字，算術，簿記等的實用功課。待年歲稍長，他便從威廉(Williams)先生研究數理。華盛頓的愛好數理的僻性和精於測量的本領，就是在這時養成的。華盛頓雖精於數理和測量，但是對於別的學問，並沒有什麼研究，在他臨死的時候，他的書齋裏，只不過有九百多卷書，而關於詩文和理論的書，更是非常的少，大部份是如「農民一助」(The Farmers Assistant)，「安迪生農業論」(Anderson On Agriculture)，「木工」(Carpenter)，「波思威爾秣場論」(Boswell On Meadows)，「馬病論」(Diseases of Horses)，「農業實際論」(Practical Treatise on Husbandry)一類的書。由這兒一看，華盛頓並不是一個胸羅萬卷的學者，卻是一個實行家。

華盛頓自幼就嗜好軍事，因此他時常聚集許多的小朋友，作軍事遊戲。但是他對於學課並不疏忽，又能夠注意到自身的修養，在他十幾歲時，就在練習簿裏寫着一百多條的修身原則，現在把有關於青年修養的幾條錄在下面：

第一條 我們在團體中，應當尊敬他人。

第二條 在別人面前，不可喃喃自語，不可以手或足擊物作聲，亦不可手舞足蹈。因為這些都是不敬的舉動。

第五條 不可諂媚，不要與不願意嬉戲的人嬉戲。

第七條 一個人的態度應當和藹可親，但在有重要事情的時候，應當莊嚴。

第八條 不可以幸災樂禍，即使他是你的仇敵，你也不應該如此。

第十二條 在有博識的人面前，不可喋喋於瑣碎的事情。在沒有學問的人面前，也不能以領導者自居，因為這些都要使人厭棄的。

第十七條 你應當虛心接受人家的批評和指導，尤其是長者。

第四十條 你未說話之前，應當打量你要說的話是否妥當，並且應當注意於發言的順序。

第五十七條 你的言行應當時時注意，切不可違背良心。

這些原則，都是我們青年極中肯的教條，華盛頓竟能夠這樣的訓練和修養自己，這不能不說是他後來的成功和偉大的原因。

華盛頓十五歲的時候，他的異母兄魯連士以他喜好軍事，就替他找到一個海軍少尉候補生的位置，但是被他的母親阻撓了，所以他繼續完畢了小學的課業。華盛頓十六歲在小學畢業之後，又重習幾何學，三角法及測量學，并時常在自己住宅的附近，從事測量的實習。在一七四八年三月間，華盛頓應了博學多識和領有廣大土地的菲爾法克斯（Fennell）先生之聘，去測量土地，歷盡了千辛萬苦，賺了不少的錢，他便購置了五百五十畝的荒地，和四百五十六畝的熟地，兩年後，他已有一千五百五十八畝地了，這時他才二十一歲。

一七五二年，他的哥哥魯連士因肺病死去，他又繼承了他哥哥的二千五百畝地的遺產。華盛頓是個會理財的人，現在他已變成了領有四千多畝地的富翁了。

這時候，英法兩國在美國各想擴展其殖民地，所以兩國時常發生戰爭。一七五四年，英法兩國因爭渥海渥（Ohio）這肥美土地的所有權，就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大原（Great Meadows）之役。在這一次戰爭裏，華盛頓被任爲英軍的副指揮，帶了一百五十人的隊伍，進到大原地方，先把土人的酋長和領袖們都說服了。由土人的報告，得知法軍的詳情，乃在晚上，乘法軍不備，偷襲法軍的防守地，法軍指揮官以下死的很多，法人大怒，乃集中兵力，把英軍打敗了，結果，立約停戰二年。

大原之役以後，英法兩國的美洲殖民地的爭執，益趨嚴重。這時華盛頓升了英軍的總指揮，他向英國駐佛及尼亞州的總督郎登（London）提出進攻法軍的兩點計劃：一是擴充軍備，二是整頓軍紀，郎登很贊成這個計劃，決定向法國的領土大舉進攻。節節勝利，於是，美洲北部的法國領土，全入了英軍的掌握。一七六三年巴黎和約成立，英法

在美洲殖民地的戰爭，才告結束。這時，華盛頓因身體衰弱，便解甲歸田，去享受那家庭的幸福，可是十五年以後，劃時代的重大使命又加到他的肩膀上了。

英法殖民地戰爭結束以後，英國在美洲的勢力更爲增大，其領土擴展到十三州之多，同時英本國國內又很太平，英王的地位安如磐石，於是英王便想進一步的支配殖民地，所以在一七六三年頒布了三種法律，以求達到其支配的目的。這三種法律就是「航運法」，「貿易法」和「禁止製造條例」。第一種法律，規定殖民地的生產品祇能用英國輪船運輸；第二種法律，規定殖民地人民的生產品祇能賣給英國商人，使英國商人得廉價獨佔殖民地貨物；第三種法律，禁止殖民地人民自己設廠製造，使英國的製造品得在殖民地中暢銷無阻。但是美洲殖民地的人民本來是爲尋求自由而來的，對於這三種法律，當然的感到十分的難堪，而他們自從經過和法國在北美殖民地戰爭的試驗以後，覺得自己財力兵力，實在不弱，老早就想脫離英母國而獨立，英國這種毫無理性的壓迫，已夠使他們起來反抗，以求得獨立的口實。偏偏在一七六五年，英國因財政困難，又在

北美殖民地徵收印花稅，益使殖民地的人民忍無可忍，於是在北美便掀起了反抗的暴動。

當時殖民地的人民反抗英國壓迫的情形是十分的激昂，他們在費拉德爾菲亞（Philadelphia）城召集各州代表大會，由大會發出宣言，申述殖民地人民的苦痛及權利，殖民地民氣益發洶湧起來。民衆便自動結合起來向波士頓（Boston）的邦刺山（Bunker Hill）進攻，但是無組織的民衆，究竟敵不過有訓練的英兵。當殖民地人民感覺到必須有組織始能有堅強的戰鬥力時，他們便要找出一個領袖來；在再三考慮之下，一般人的視線又集中到在對法國殖民地戰爭建有殊勳之華盛頓的身上了。

華盛頓自從上次解甲歸田到現在，已經有十五年了，這時間，他安靜的過着幸福的家庭生活，他雖然做過非爾法克斯（Pennsylvania）州和佛及尼亞州的代議士，但他在議會中，很少發言，所以有人說華盛頓是沈着寡言的人，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才是勇於實行的人。

華盛頓自從一七七五年辭了民軍大元帥職以後，直到第二年一月，因為民軍本身有缺點，所以始終不敢向英軍進攻。這一點，正是證明華盛頓一生處事的謹慎。但是再過一個月，議會應允華盛頓的要求，派了一萬四千名的常備軍和充分的火藥，於是在三月四日就攻佔了達徹斯特（Dorchester）高地，同月十七日又佔領了波士頓，乘勝直入紐約（New York）。

從此民氣益發旺盛，乃於一七七六年七月二日再集會於費城，通過了殖民地獨立案，於七月四日公佈於全世界。英將霍維（Howe）看到這篇獨立宣言和民衆的舉動以後，非常激怒，便一面請求本國派大批軍隊和強大的艦隊來助戰；一面經長島（Long Island）上陸，進攻紐約，因此，獨立運動的前途就轉入暗淡了。

但這時候，華盛頓仍堅持不屈。不久，由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遊說的結果，和法國締結了軍事聯盟，這給獨立戰爭一個有力的保證。但是華盛頓這時候，一面要領導聯軍作戰，一面還要解決其他許多問題，就像殖民地人民對於法軍的誤會，議會和

民軍內部的權利和地位之爭，以及民軍內部發生漢奸等等，這時的華盛頓，真是日理萬機，憂勞兼担，於此可見做一個民族英雄實在不是偶然的事啊！

在一七八一年的九月，華盛頓統率美法聯軍，向約克頓（Yorktown）猛攻，經過了幾天的猛烈戰爭之後，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英軍終於不得不向華盛頓投降了。

約克頓戰爭之後，英國政府已明白美國的獨立運動已非用武力可以遏止，所以一般頭腦清楚的人，乃主張承認美洲殖民地的獨立。但在事情還沒有十分確定以前，華盛頓仍竭力預備第二次大戰。英美兩國代表在巴黎經過二年的談判，至一七八三年九月，英國纔正式承認北美十三州的獨立，由此世界上又加添了一個獨立的美國。

美國獨立戰爭成功以後，華盛頓便向議會中提出辭呈，要求解除大元帥的職務。在辭呈中，他又特別提出了建國的四大方策，請議會注意，這四大方策都是以後美國得以興盛的主要條件。所以華盛頓的歷史不但是美國的獨立史，而且是美國的興盛史。

經過八年血戰以後（自一七七五至一七八三年），北美合衆國的人民已經由英政府的

壓迫中解放出來，而獲得了他們所應有的權利和自由。現在華盛頓也回到了他的故鄉維山（Mount Vernon），過着他幸福的家庭生活，他並且已有從此終老於林泉的意思。但這時國內的財政非常困難，政治亦十分紊亂，於是又不得不請華盛頓出來。一七八六年，華盛頓在亞那波里召集了一個憲法會議，規定在第二年於費拉得爾菲亞城召集全國會議，討論憲法。這個憲法會議由七八七年五月到九月，才把美國의 正式憲法通過了。同時，又選舉華盛頓為美國的元首，坐了第一任大總統的交椅。

華盛頓一上台之後，就着手組織內閣，派哈密爾敦（Hamilton）為財政部長，哲斐孫（Jefferson）為內政部長，諾克斯（Knox）為軍政部長，藍多爾夫（Edmund Randolph）為檢察長。一七九〇年一月，國會正式成立，華盛頓便宣佈了他的政見：（一）設置常備軍；（二）擴充教育；（三）統一金融；（四）保護版權；（五）規定國際法；（六）提倡郵政；（七）調整外交；（八）解決土人問題；（九）計劃公債。三年的工夫，美國已成了一個組織堅強和國庫富裕的國家。第一任大總統任期屆滿後，華盛頓又被連選做了第二任的大總統。

直到一七九七年三月四日，才離開了總統的職位。他又回到了故鄉，過他的地主生活，那時，他已是六十多歲的白髮老翁，在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便與世長辭了。

華盛頓是合衆國的創造者，至他的生命的最後的一年，他還爲國家而努力，這個印象在現在美國人民的心坎中，還是很深刻的吧！

魏之曼

隨着世界上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發展，而受盡了異國的欺凌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的猶太人（The Jews），遠在二千七百年以前，就因為亡了祖國，而渡其流浪的生活。除了現在的蘇聯以外，他們幾乎到處受人的唾棄，受人的辱罵，甚至如一九三三年在德國納粹的排猶運動之下，受人的殺戮。因此，在五種的猶太人——國際資產階級的猶太人，宗教的猶太人，改了宗教的猶太人，同化了的猶太人，共產主義的猶太人——之中，除了同化了的猶太人之外，其他的，沒有一時一刻忘掉了復國的運動。他們時時刻刻的在說：

「啊，耶路撒冷，假設我忘掉了你，

那就讓我的右手失掉了它的技巧，

啊，西庸，假設我忘掉了你，

『那就讓我的舌頭失掉了它的味覺。』

這是流浪在全世界，到處受迫害的猶太人的一種故國之思的標語，也就是他們復國運動的誓言。他們在結婚喝喜酒的時候，也要說：

『這一杯，是他是日耶路撒冷復歸於吾人之手的祝杯。可是現在，這只是我們民族之淚的苦杯！』

這是猶太人結婚式中的祝酒詞。由前面的幾句誓言和這幾句祝酒詞來看，我們便知道猶太人恢復民族國家的怒火，是怎樣的在高燒着！我們於同情世界弱小民族復興運動之下，就不能不一提猶太民族運動的偉人了。

猶太人正式民族運動，是基於『萬國西庸主義者協會』（International Zionist-Agency。西庸 Zion 是巴勒斯坦 Palestine）首府耶起撒冷（Jerusalem）的一座山名，西庸主義（Zionism），其目就在於恢復耶路撒冷，也就是要恢復猶太的故國巴勒斯坦。在這個正式民族運動中，我所要提的一位猶太民族偉人，就是魏之曼博士（Dr Chaim W

cizman)

魏之曼是猶太人最高機關——猶太人協會 Jewish Agency)——在巴勒斯坦和倫敦代表大會的主席，同時也是世界猶太民族主義者組織(International Jewish Nationalist Organization)的主席。他同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本古龍(David Ben-Gurion)及該會政治部的青年首長薛托克(Shetok)，分別担任猶太人協會裏內政外交的重大責任。再有猶太人民族運動的組織——就是中央黨[Центристская Партия]。這是舊猶太民族主義黨，普通叫猶太民族主義總黨，它的核心是一八八〇年在俄國創行的猶太人還鄉運動(OldHope Zion)。猶太民族主義總黨有兩種形式的存在，一個是魏之曼領導的猶太民族主義總黨第一黨，一個是著名愛國者烏西金(Menahem M. Ussishkin)所領導的猶太民族主義總黨第二黨，許多年來，他是魏之曼的主要政敵。

這個猶太民族領袖魏之曼博士，是現代世界上的偉人之一。他在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於俄國賓斯克(Bialystok)附近的莫大爾村(Village of Motylev)。他在十五個兄弟

之中是第三個，這些個兄弟們至今尚有十一個還生存着，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康的木材商人，也是一個老猶太民族主義者。他的母親是一個極慈祥而勇敢的女人，例如她的家庭並不十分充裕，而當時俄國猶太人又很難以得到受教育的機會，但她却使她的孩子有九個以上進大學。

魏之曼幼時，進了村中的私立教會學校，後來又入賓斯克的高等學校，他在科學和算學上，是個出色的學生，他也是他母親所最喜歡的孫子，他靠他自己做些零工，得進入福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最後在柏林大學獲得了科學博士的學位。他是一個孝順的兒子，他在假日常常回家，省視雙親。他的一門都富有學術興趣。弟兄們或為醫生，或為科學家，在這樣環境下的家庭，遂當為政治和文學的談話所籠罩。

魏之曼曾在日內瓦（Geneva）謀得一個化學講師的位置，在那裏他住有好幾年。他遇見一個少女名叫查斯曼（Vera Chatzman），她是學醫的，後來她得了醫學博士。他知她相戀，最後與她結了婚，她永遠是他的最親愛最尊敬的伴侶。他們有兩個兒子，

一個叫賓雅民(Benjamin)，在倫敦經商，一個叫麥開爾(Michael)，在劍橋大學研習科學。魏之曼在一九〇三年離開了日內瓦，以後他又在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擔任講座。英格蘭——有時在巴勒斯坦——曾住了他三十五年的家鄉。

在曼徹斯特以前好多年，魏之曼就成了一個猶太民族主義者了。當已故的巴爾福爵士(Lord Balfour)爲了競選而到曼徹斯特的時候，魏之曼和他一見相投，於是這位青年的魏博士便滔滔不絕的談起了他的生平主張——猶太民族主義。巴爾福一時深受感動，再加上他自己對於猶太民族主義的計劃又很有興趣，乃有以非洲的烏干達(Uganda)作爲一個猶太人的移居地的諾言。但是這位青年的魏之曼以極美滿的姿態辯論說：『祇有巴勒斯坦能夠成爲最適於猶太民族的祖國。』巴爾福便贊成了他的主張，并且問魏之曼說：『魏之曼博士，請你告訴我，是否有許多像你這樣的猶太民族主義者？』魏之曼笑着答道：『巴爾福先生，在賓斯克的路上，像我這樣的人正是多得呢！』

在這次談話中，魏之曼表示出他對於猶太民族主義與巴勒斯坦爲不可分一節，已具

有堅強不拔的信心。巴爾福還在思索着以烏干達作猶太人的移居地，魏之曼便問他：『你能夠放棄敦倫，去住在沙斯加其萬（Saskatchewan）嗎？』巴爾福說：『我們永遠住在敦倫。』魏之曼說：『是的，可是當我們住在耶路撒冷的時候，敦倫還是一個沼澤呢。』

像許多現代政治家一樣，魏之曼始終括着這一個理想——猶太民族主義，而且他很早就希望英國人的援助。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就寫信給他的一位教師說：『可以挽救猶太人的是巴勒斯坦，並信祇有英國人能幫助他們到那個地方去。』魏之曼一貫信賴英國人，這不但不妨礙他是一個好的熱情的猶太人，而且也是使他成為民族運動領袖之所必須的。請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產生的一篇巴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是『英政深表贊同以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國家』的宣言，可以說是魏之曼站在猶太民族主義立場上，而擁護英國人的一部份的成功。

魏之曼不像其他許多政治家一樣，他有兩重的生活。他白天是一個化學家，夜間是

個猶太民族主義者。因爲他是天才，所以也可以說他一天二十四小時，既是一個化學家，又是一個猶太民族主義者。他堅持並樂於這雙重的活動。有在一八七九年的第一次猶太民族主義大會，他未參加，因爲當時他——賓斯克，窮困得無法籌措旅費。他在運木材的船上工作，才得以到達但澤（Danzig），然後急忙登陸，跑到會場的所在地巴斯爾（Basle），但結果已遲了兩天了。

魏之曼從早年就已顯出了領袖的才能，他以二十七歲的青年就敢反對猶太民族主義的創始人黑之爾（Theodore Herzl）。他以爲黑之爾太近於空幻；他自始就注重實際的方面，提議去訓練猶太人，從事於殖民及農墾的工作。在一九〇三年的猶太民族主義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席上，他發表了處女演詞，提出來在耶路撒冷設立一個希伯萊大學（Hebrew University）的計劃。他當了曼徹斯特區猶太民族主義的領袖有十五年，後來在一九二一年，他成了世界猶太民族主義組織的主席。他在領導猶太民族運動的當中，他遭逢許多的患難，許多的危險，和許多的得意與失意。

一九一六年是魏之曼一生最重要的時期。化學與猶太民族主義混而爲一，雖然這在當時並不知道。

這時魯易喬治（David Loyd George）爲製造炸藥正在尋找技術助理。當時極缺乏製造線狀無煙火藥所需要之「合成酮」——以及其他火藥——需要孔急。魯易喬治召集一個會，並且徵詢曼徹斯特導報編推斯特（W. H. Stott）的意見。斯氏便把正在曼徹斯特大學任化學教授的魏之曼博士介紹給他。魏之曼到倫敦去晉謁魯易喬治後，他遂即被任去負責指導海軍試驗所。

在這星期之內，魏之曼就發明了一種製造「合成酮」的方法。他研究五穀的成分，發現一種隔離有機體的方法，根據這種方法，就拿七葉樹的果實去製造酮，這種方法大規模的應用起來，英國對於酮的供給，大見充足，因而線狀無煙火藥也有了充分的供給。這時魯易喬治召請魏之曼說：『魏之曼博士，你對於國家有了極大的貢獻，我要向皇上保薦你，你要什麼榮譽都可以。』

魏之曼說：『我自己什麼也不要。』

魯易喬治暗示送他一個三等爵的領銜，和一筆鉅款。

魏之曼搖搖他的頭說：『我只要求一件事，那就是給我們猶太民族一個祖國。』

因此，幾個月以後——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就發表了巴爾福宣言，贊成猶太人的民族主義。在理論上，這個宣言已滿足了魏之曼的要求。猶太民族主義當時似乎有利了。自然，促成這個宣言的，還有其他因素。例如依據人道主義的理由，和因為戰爭的危急，但據魯易喬治說，嗣後發覺使贊成猶太民族主義的主張，并且他把魏之曼介紹給他的老友巴爾福，以便開始談判猶太人的祖國問題。當巴爾福見到他的時候，巴爾福說：『我與魏之曼博士不必經人介紹，在十年前他已經使我贊成猶太民族主義了。』

由於這次的成就，我們便知道魏之曼是一個實際的民族主義的領袖了。現在再把魏之曼的爲人和他的性格介紹在下面，以爲本篇的結束。

魏之曼是生活的愛好者，極好交遊，也極會享受。他不像其他許多民族領袖，他的脾氣並不甚倔強，習慣也不節儉。他吃喝，又好笑，他是一個富有同情心和寬宏大量的人。他雖然在生活樂於享受，但是他對於工作非常勤奮。他努力于猶太民族運動，他也努力于化學。在他的故園利霍伏斯（Rehovoth）村中的主要點綴，不是他家中很寶貴的中國明代古瓶，而是葉林對面的精雅的化學實驗室。他的研究員從事各種實驗，大多是和改良巴勒斯坦農業有關的實際工作。魏之曼指導他們工作，并親自研究橘皮的副產品，以便增加巴勒斯坦柑橘的價值。

魏之曼的研究橘皮工作，對於商業發展很關重要。這和他在一九一六年發明酕的程序，又極相彷彿。一九一六年的酕產生了猶太民族主義，今日酕又可以幫助猶太民族主義的存在。許多年來，魏之曼似乎專心在一條路線上，求發展和努力于一種實驗的工作。魏之曼的性格很複雜。最初他是一個科學家，後來是一個政治家，但是他的天性中，也含有很多藝術家的彩色。他的脾氣也有些缺點，他善怒無常，時常面有怒色，且

又相當固執，自千百萬猶太人看來，他就是猶太民族主義，猶太民族主義就是他。他像印度的尼赫魯一樣，也有幾分看不起民衆，雖然他的智慧，他的風雅，他的感動力在私人談話中也是很大，可是他任羣衆中，並不是個十分出色的人物。

魏之曼的優點，也有許多。他有勇氣，他像甘地一樣頗能委屈求全，他是一個很精明能幹的談判家，他也是很有才器的，他精通六種語言，對於讀、講、寫都很流利，但他最喜歡的，還、猶太語，他能用猶太語，玩驚人的把戲。此外，他是一個理性人物，循理守信，特別忠誠。他從不誇大，對於一切事，言可言之不足，不肯言之過分。他雄辯時，聲音很低，他越要加重語氣，越把聲音放低了，他的演說，有些是第一流的政治文章。最後，魏之曼對於猶太民族運動，貢獻很大，以致猶太民族主義和他成了不解之緣，猶太民族主義與猶太民族運動領袖的關係，在目前最合而爲一了。

猶太人既已老早就成爲一個國際的民族，那麼，在猶太民族主義領袖魏之曼博士的竭力奮鬥之下，猶太人問題的解決，將與國際問題一同進展，同情於被壓迫的弱小民族

外國民族英雄史話

的我們，惟有拭目以俟吧！

封底